

普陀史志

PU TUO
SHI ZHI



刘少奇视察普陀纪实
梦断干岛
忆舟山登步岛之战
舟山,最早引种番薯的地方
沈家门水寨考证
张苍水归隐处考

舟山市普陀区史志办主办

3
1998



△蚂蚁岛创业纪念室

舟山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普陀区蚂蚁岛乡创业纪念室是全区设施最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基地占地面积 600 平方米，总投资达 35 万元，设展览厅、休息室、资料室、小广场等。展览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吸引了全市各界前往参观，并被推荐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摄影：丁文宏 曹德兴/文



△1995 年 7 月，市委书记和原舟山地委书记王裕民等有关领导在蚂蚁岛创业纪念室落成典礼上剪彩



△中共定海县工委旧址



△新四军老战士在参观新四军纪念馆

普陀史志

1998 年第 3 期

(总第 3 期)

《普陀史志》编辑部

主 审:傅良国

曹德兴

顾 问:蒋文波

谢永根

主 编:邬永昌

编 辑:傅 曦

胡永久

成定国

特邀编辑:秦永禄

向联谊

陈高兴

倪竹青

封面设计:邬永昌

刊名题词:倪竹青

目录

1998.3

(史料刊物 注意保存)

- (史志论坛)
- 3 十四年编志工作反思 蒋文波
- (伟人风采)
- 7 伟人的足迹
——刘少奇视察普陀纪实 邬永昌
- (史料拾贝)
- 13 普陀区(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简介 谢永根整理
- 24 一位百姓家中的光荣匾 陈雨信 俞品久
- (英烈颂)
- 15 烈火中永生
——追记救火英雄陈建军烈士 陈荷亚 夏国峰
- (征战纪事)
- 6 忆胶河战斗抓俘虏 王维铜口述 严天直整理
- 17 我在淮北战场一日 杜梅口述 王兰生整理
- (抗日烽火)
- 18 关于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情况 陈育民
- (名人轶事)
- 20 金庸戏说桃花岛 张奔 欧阳晓明
- 21 三毛与倪竹青的书画情结 童信扬
- 22 我与段云的一次交往 詹正茂
- 23 展茅翁氏教授之家 谢永根
- (史海纵横)
- 25 陈荣生朱家尖脱险记 忻元寅
- 26 梦断千岛
——蒋介石的六次舟山之行 包江雁

总第3期 目录

- 36 灾民闹乾高 血流大展庄 庄智秀
〔军事史博采〕
- 38 一次成功撤退的战例
——忆舟山登步岛之战 吴新华
〔史海探秘〕
- 42 普陀山扬名之始 何雷书
- 44 展茅“六桂堂”的由来 凌金祚
- 45 定海县奉宪清交鱼鳞图册考 凌金祚 陈雨信
- 47 舟山,最早引种番薯的地方 王建富
〔争鸣考释〕
- 50 沈家门水寨考证 留正铨
- 52 张苍水归隐处考 何雷书
- 54 明代多国贸易港——葡占双屿港 毛德传
〔地方史话〕
- 56 乌石塘小志 王建富
- 57 安期生醉墨洒桃花 王建富
〔史迹漫步〕
- 58 在登步岛烈士陵园上 郑朝
- 59 漫步半边街 缪友忠
- 60 漫话神功池 缪友忠
〔简 讯〕
- 60 《普陀大事记》出版
·四 封·
- 封面:柴松岳省长视察普陀 丁文宏摄影
封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曹德兴/文 丁文宏摄影
封三:海上桃源
封底:普陀电信大楼 丁文宏摄影



普陀史志

PU TUO SHI ZHI

1998.3

主 办

舟山市普陀区史志办

编 辑

《普陀史志》编辑部

地 址

舟山市普陀区北安路

255号(区府大院内)

电 话

(0580)3012607 3013423

邮政编码

316100

照排、印刷

定海同润图文印刷中心

电 话

(0580)2035334

本期出刊日期

1998年12月25日

十四年编志工作反思

□蒋文波/文

普陀 1953 年建县,历史上县、区(1987 年县改置区,下同)未曾编过志。这次普陀编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全国普遍掀起编志的良好氛围下进行的。至 1998 年经过十四年的努力,取得丰硕成果。先后编撰各类方志 10 部,其中《普陀县志》、《普陀区志》、《普陀县地名志》、《普陀企业志》、《舟山海域海洋生物志》、《沈家门镇志》、《六横志》、《展茅镇志》等 9 部为区地方志办公室直接主持编撰;参与编辑、撰写《中国海域地名志》、《中国风光物产大典》、《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浙江城区概览》、《浙江名村志》、《普陀山志》等 15 部全国、省、市志书典籍有关普陀内容文;还撰写、编辑出版《普陀县志文集》、《朱家尖风光》、桃花、朱家尖《旅游手册》等一批书籍,《普陀》、《今日普陀》、《普陀风貌》、《普陀县地图册》等一批画册图册;《当主编的感受》、《新编普陀山志刍议》、《新编续志的探索》等一批在全国和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总计撰写文字 600 余万,绘制使用各类地图 140 余幅,摄入使用各类照片 800 余张,印数 5 万册,主要作品均精装本,出版社正式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所有作品都按高标准严要求编撰,质量上乘,几部主要著作被许多著名专家、学者誉为“佳志”,倍受赞赏,深受社会各界欢迎。1985 年编的普陀第一部方志《普陀县地名志》一举获得成功,被专家们誉为当时全省最好的地名志,获舟山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既使编志人员深受鼓舞,又使编志者通过实际操作,提高修志水平。1990 年 6 月编成 115.7 万字的《普陀县志》,是普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作,在京和省内外 10 余位有影响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赞场,先后被评为地方志优秀成果全省一等奖、全国二等奖;1992 年编的《普陀》大型精美画册获全

省对外宣传品二等奖;迄今规模最大,列为全省第一部续志、140 余万字的《普陀区志》将于 1998 年底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志以地传,地以志传”,这批作品问世,清晰地展现普陀的历史全貌和现状,极大地丰富普陀人民和精神文明生活,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普陀,认识普陀,从而激起热爱普陀和为振兴普陀献身的精神力量;为各级领导更好地了解普陀的过去和现在,为未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大批作品发行到全国各地,部分发行到国外,对宣传普陀、扩大普陀在国内外影响,促进普陀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史料,填补普陀历史文字记载的空白。

地方志是一种有特殊体例的著述。按照地方志基本原理,科学地编纂成志,尤要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要集时代精华于一书。在政治上必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文字撰写要精炼、优美,成为一部资治当代,垂鉴后世严谨的地方科学文献。故编撰地方志:要求高、范围广、难度大、涉及方方面面,要牵扯各级各单位领导很大精力,投入相当多的人力、财力,经历相当长时间才能编成。他是一项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任务十分艰巨。普陀的编志事业十四年间能不间断地持续进行,经回味思考,主要有三条:一、有一支素质较好的编志队伍;二、取得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三、有一个周密的切实可行的编志计划。

关于编志队伍问题

编撰地方志与办任何事情一样,决定性因素是人。普陀在十四年编志中形成了一支基本能适应编志事业需要的较过硬的编志队伍。这支队伍有以下特点:

1、编志队伍基本保持稳定。十四年中,根据编志任务的轻重,编辑人员多少虽时有变

化,但基本队伍尤其担任主编、副主编等人员相对稳定。这些同志既熟悉普陀的历史情况和各方面人员状况,又有行政方面的工作经验和一定的文字撰写能力,经一段时间实践,也较熟悉编志业务,这对持续开展编志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2、有一个以主编为主的坚强领导核心。主编在这个核心中起主导作用,主编具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打开局面,驾驭整个编志工作进程,除担任全志设计、工作部署安排、笔削统稿等主编应担负的工作外,凡志中较重要,撰写编辑难度较大篇章均由主编亲自动手进行,并能因人善用,充分发挥每个编辑人员的聪明才智,善于团结和调动全体编辑人员积极性,共同完成任务。副主编及编辑人员尊重支持主编工作,对分配任务从无讨价还价,工作积极主动,互相通力协作,热烈工作的良好氛围,这是编志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3、热爱编志事业。

参加这次编志人员,均未经专业培训,专业知识和方志理论水平较差,编县志时,组织编志人员赴萧山、建德等已出版县志的县学习,几次组织编志人员赴省学习编志理论,1988年县志办和各单位曾组织30名编志人员赴省第三期方志研讨班学习。平时边学习,边实践不断提高修志水平。编辑人员的文化素质:编县地名志时5名人员,2名大专,3名原学历初中水平;编县志11名人员,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3名,中级4名。从文化角度考虑,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很快能基本适应编志工作需要。这个编辑班子最可贵之处,是有很高的事业心和很强的责任感,具有无私奉

献精神,20世纪是迄今为止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最快时期,能有幸参加这次编志,记录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因此编志人员从心底里热爱编志工作。编志工作并不一帆风顺,编志人员可以说甜酸苦辣都尝遍,尤其在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编志工作相对来说比较清苦的,编志人员不怕苦不怕难,甘愿坐冷板凳,做无名英雄,不计名不图利,默默无闻,日以继夜,一心扑在编志事业上,伏案十几年,把编志工作看成是一生最有意义的事情,编志人员对编志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热爱是编好方志的重要思想基础。

关于领导的支持重视问题

关于领导的支持重视问题

我们深深体会到编撰地方志是项庞大系统工程,必须取得领导的支持和重视才能展开。十四年来,县、区领导先后换届三次,但每届主要领导对地方志工作都是十分重视支持的,对区方志办提出的编志计划、工作安排、所需人员、经费、办公用房和其他有关要求领导解决的问题,均由书记、区长亲自拍板,得到及时落实和解决。自编志以来我们从未感到经费紧张、人员不足等难题,因此在工作时就感到心中踏实,能大胆顺畅地进行。区党政主要领导所以支持和重视地方志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和地方志本身的重要性决定的,领导在抓物质文明建设同时,也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编撰地方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但现在的经济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领导的工作千头万绪,要县(区)主要领导主动来考虑安排地



图为全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魏桥(前排右二)在参加《普陀洛迦山志》稿评审会时与部分与会同志合影

方志工作是不客观也不现实的,应由职能部门积极主动去争取。我们在争取领导重视方面一些做法是:

1、坚持每年年终向区(县)长汇报一次编志工作,主要内容:①当年编志工作和其他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②下年编志工作的安排、需要的经费;③编志人员安排;④需要县、区领导帮助解决的其他问题。由于事前准备充分,考虑周密,汇报内容简明扼要,切合实际,汇报时间一般在一个小时左右。因此,区领导对方志办汇报工作十分重视,工作再忙,只要方志办提出,无特殊情况,一般当天就能听取汇报。十四年中对区方志办提出的编志计划、每年的经费预算、人员安排等都能得到圆满解决,这对编志工作者是很大鼓舞。考虑到领导工作繁忙,日常的实施工作,组织协调工作,编撰业务工作由方志办本身自行承担解决,确有困难时一般请区委办、区府办协调解决,没有特殊情况不找区领导。这种方法上下融洽,解决问题快捷,由于是区主要领导亲自决定的事,实施中阻力较小,非常利于开展工作。

2、区领导熟悉方志,才能重视方志。要区领导重视方志工作,应当使区领导了解方志、熟悉方志,这是职能部门责无旁贷的职责。我们经常将中央、国务院和省有关方志工作文件,江泽民、李鹏、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对方志工作的重要讲话,《中国方志》登载重要文章加以复印络续分送区委、区府领导阅读,上级方志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及时向区领导汇报。

3、以地方志实际成果引起领导对编志工作的重视。编志工作必须出成果,当领导看到出版的志书有益于社会,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领导了解熟悉全区情况,有实用存史价值时就会重视编志工作。1991年《普陀县志》出版发行,由于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存史价值,是全省最好的县志之一,区委书记在全区三级干部大会上动员各单位要迅速购买,认真阅读应用。会后各单位立即掀起购买县志热潮。1992年区志办编的《普陀》大型精美画册,为当时全省除杭州(唯一的一等奖)外最好的画册。由于屡出精品,以后凡方志办提出的编志计划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书记、区长都给予赞同支持。如编撰《普陀县志》

的第一部续志《普陀区志》,区志办1995年6月15日报告,区委常委7月就讨论决定,8月9日以区人民政府名义发出“关于组织编撰《普陀区志》的通知”,从报告到决定、组织实施,相隔不到二个月。因此要持续进行编志工作,首先自己要有作为,才能有可为,拿出实际成果,领导必然会重视此项工作。

关于编志计划问题

编撰地方志与干任何事情一样,要有一个切合实际,切实可行,比较严密的计划,才会有前进的方向,努力的目标。普陀自开展编志以来既有长远规划如“十年编志规划”又有每部志的具体实施计划和年度进展要求。在确定编志计划时,主要掌握以下3条:

1、安排编志计划,应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编志应根据国务院、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有关规定,从当地实际出发,按实用和需要原则,确定编志计划和编志重点,普陀1985~2000年十六年间计划编12部志,其中综合性县、区志各一部,渔业、海洋生物、企业、土地、地名等专业志5部,沈家门、六横、展茅等乡镇志、部门志5部,至1998年已完成10部。编志重点放在县、区级综合性方志,1988~1990年集中精力完成《普陀县志》的编撰工作,1996~1998年集中精力完成《县志》第一部续志《普陀区志》的编撰工作,专业志、乡镇志、部门志穿插进行。普陀是海洋大区,为开发海洋,发展经济,确定编撰《海洋生物志》、《普陀渔业志》,普陀又是旅游资源较集中区域,在国家级风景区编撰《朱家尖镇志》,积极参与编撰《普陀山志》、《普陀洛迦山志》。现尚有存《普陀渔业志》、《朱家尖镇志》两部志,如无特殊情况,1999~2000年可完成。

2、每部志必须有具体实施计划。编一部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工程,要计划周密,部署定当,任务明确。一部志在编撰过程中一般应有以下要求:①总体要求:整部志的总体框架,完成的时间,总体质量要求,以明确奋斗目标。②具体的实施部署,一般应划分组织发动、搜集资料、单位编写、总纂、审核定稿等阶段,每个阶段主要任务,完成的时间和具体质量要求必须明确,编地名志、县志、区志时还安排试写阶段,用典型引路。③将全志的编写任务;分散落实到单位和人。区志办编辑人

忆胶河战斗抓俘虏

□王维铜口述 严天直整理

胶河战役距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场激战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总是不能平静。那是 1947 年 8 月，由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 6 个整编师 20 个旅，组成胶东兵团，企图首先攻取平度、莱阳，然后再攻烟台，妄图逐步歼灭胶东我军。

9 月，敌胶东兵团由潍县、青岛等地北犯。我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即内线兵团，又称西线兵团）第 13 纵队一部奉命配合胶东地区地方武装，沿途实施正面阻击，并以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在敌后方袭扰。10 月初的一天，我内线兵团在胶河以西山阳庄地区包围了由潍县来援的整编第 45 师第 211 旅。战斗从早晨打到中午，被我军包围的敌人开始往外突围。在这紧急关头，我所在的 63 师 188 团 1 营在营长梁邦志的率领下随大部队出击去了，只剩下我们一个班（当时我任班长）留守阵地。突然，后面有一股敌人正向我阵地冲来，离我阵地已不到五六十米，我就下令：“打”！哒、哒、哒……重机枪一打，敌人马上全部卧倒。我跟王玉米同志乘机向敌人扔手榴弹，只听轰隆、轰隆几声巨响，敌人伏在地上就不动了。趁着爆炸后的烟雾未散，我一个箭步冲上去夺过敌人一挺轻机枪，猛地向敌人扫射。这一来，把敌人打得哇哇直叫。

我马上高喊：“放下武器投降，缴枪不杀！”

随即有三个敌人放下了枪，举起手向我军投降。我们也停止了射击。没多久，敌人见我们停止了射击，都陆续举手投降了。我把他们集中到梨树底下，命令他们一个挨一个坐好接受审查。我们一检点共有 86 个俘虏，他们都是敌 64 师的士兵，连长被打死了。这些士兵都是些被抓来的穷兄弟们。我们当即向他们宣传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他们都表示老老实实不再抵抗。后来这些穷兄弟们被补充到我们的部队中去了，这是后话。当时我派三个战士到阵地把枪支弹药收集起来，并且把枪机都卸下来。

到下午 4 点左右，出击的大部队还没有回到我们留守的阵地，我们不但带着 86 个俘虏，还有这么多的枪支弹药，怎么办？我决定去找大部队。于是我们把俘虏兵分成二组，一组扛枪，另一组扛子弹，前后中间都由我们的战士押着。走到天快黑时，我们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大部队就在李家村驻扎”，我就带着人马急速往李家村赶去。到了李家村，营长看见我们抓来了这么多的俘虏，还缴了这么多的枪支弹药，高兴地笑了。○

责任编辑：邬永昌

员应建立一竿子到底的责任制，从编志一开始，就要明确职责，落实负责编辑的篇、章及联系单位。总纂时在主编的指导下，按分工编好自己负责篇章，直至修改校对印刷出版，责任编辑要负责到底，使整部志稿质量有较可靠保障机制。

3、在总体要求明确，分阶段部署定当后，就要全力实施之。在编志人员中，在各个阶段采取召开全体编志人员会议，对每个阶段的工作，包括任务、质量、时间要求作出明确部署，进行深入动员，形成共识，使编志任务成为每

个编志人员的自觉行动和努力目标。我们在编县、区志时，一般计划三年左右时间编成，实践结果，《普陀县志》二年半就编成；《普陀区志》不到二年就编成。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一般计划二年左右时间编成，实践结果，多数只一年多不到二年就编成了。

期望普陀持续不断编出质量更高更好的志书来，为普陀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邬永昌

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00 周年暨视察舟山 40 周年

刘少奇
登岛
设防
摩鼻岭

伟人的足迹

——刘少奇视察普陀纪实



□ 邬永昌/文

舟山,40年前迎来了一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同志。虽然如此重大的新闻在当时地方性的报纸上都没有作过报道,但是,历史毕竟留下了这值得回味的一幕。在40年后的今天,当年随刘少奇同志视察的一些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动人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少奇同志那朴素无华而又熠熠照人的风采,至今仍被传为美谈。

巍巍黄杨山,象征着翁洲人的顽强挺拔。刘少奇伫立在摩鼻岭上重吟:“建设舟山群岛,巩固国防前线”。

深秋的舟山,生机盎然。1958年11月4日,明媚和煦的阳光射满舟山青山绿水。四辆小车穿过古老的定海城区徐徐行进在并不平坦的山间公路上,朝着舟山岛的腹地驶去。车上一位上了年纪而体魄健壮的老人面向窗口,凝望着窗外掠过的山山水水。他,就是前几天刚刚在视察了安徽、上海等地后昨天下午才到达舟山的刘少奇同志。他在今天早晨

接见了舟山近千名军地干部并和他们合影留念后,就匆匆坐车开始视察舟山的战备和生产情况。半个多小时后,车队进入一片山谷地带,到了定海和普陀两县交界的摩鼻岭山麓。少奇同志走下车,迈着稳健的步履登上了山巅。陪同的舟山驻军负责同志打开地图说,此山此岛,背依沪宁杭平畴,南通台湾海峡,大有锁东疆而控南溟之势。早在明洪武年间信国公汤和督事沿海防守军务时,这里就成为监视倭寇进出舟山海域的重要场所。至今在摩鼻岭的山腰上还矗立着当年信国公派员监造的烽火台遗迹。少奇同志站在山岗上,海风阵阵地吹来,一边听着陪同人员的介绍,一边接过随从人员递过来的望远镜,一次又一次深情地凝望四周的青山和碧海,时而又俯身看看平摊在岩石上的地图,询问着主要岛屿的地形和主要设防阵地的情况,并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

少奇同志虽然是第一次来舟山,但是他对舟山并不陌生。当陪同人员指着地图介绍到登步岛的时候,少奇同志湿润的眼睛又一次向前搜索。他在搜寻当年亲自关注过的战

斗，他在缅怀昔日从鄂豫皖走来的老红军团在这里跨海作战中流血牺牲的烈士……这时的少奇同志仿佛扑进波谲云诡的历史大门，他的思绪无须梳理就沿着曲折的历史长河，飞向九年前的烟云之中。

1949年，这里曾经是世界军事的热点地区之一，国民党八十七军、七十五军等10余万军队溃退到舟山，蒋介石一年间三度亲临舟山，曾在岛上做过“反共复国”的“美梦”。疯狂叫嚣“要把舟山变成第二台湾”，同时以海军军舰封锁长江口，轮番袭扰、轰炸我沪杭甬等城市。为了消除敌人对我华东地区的海空威胁，巩固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保障沿海各大城市人民在和平环境中加强战后经济建设，拯救舟山人民，党中央发出了“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解放舟山群岛的指示。当年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少奇同志，他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曾多次研究过舟山战役的战略部署，关注过登步岛战斗的点滴进展情况。

不知是历史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就是在九年前的今天，后来被国民党称为“南有金门、北有登步”的登步鏖战进入最激烈的一天。从11月4日的凌晨开始，国民党调动了刚由广东汕头抵达舟山的重建12兵团75师的一个团和67师的3个团及67军军部警卫营等快速增援登步岛，在海、空军助战下登陆反扑。67军军长刘廉一及87军新任军长朱致一都抵登步岛督战。在这弹丸之地的小岛上，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61师，在缺少粮草、弹药极其困难条件下，又与5倍多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血战了两天两夜，流水岩、张网湾山、炮台山等战略要地几次易手，双方伤亡都极为惨重。

回顾这些令人心悸的历史，少奇同志的心情能不沉重？时值九年后的今天，在大陆遭受严重困难的时刻，不甘心偏安一隅的蒋介石以为有了机会可乘，开始掀起一股妄图“反攻大陆”的恶浪，他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实施其“反共复国”的梦想。瞬时间，在东海前线

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大批美蒋特务向舟山群岛和浙江沿海等地偷渡，蒋军军舰和军用飞机一再偷袭祖国沿海各地，9月24日，国民党空军在美国的指使下，窜入浙江温州地区上空的蒋机竟以“响尾蛇”导弹进攻我空军飞机，这一严重的军事挑衅事件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如何给蒋介石当头一棒，警告台湾当局不要再做“反共复国”的美梦！伫立在摩鼻岭上的刘少奇向历史作出了坚定而洪亮的回答，他再一次重吟了今天早晨为舟山驻军挥毫写下的题词：

“建设舟山群岛，巩固国防前线。”

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当年刘少奇同志伫立在摩鼻岭上发自肺腑的铿锵誓言，早已穿越历史的空间，回响在千岛上空，成为激励舟山军民保卫海防、建设家乡的巨大动力。

将军洞天，变幻莫测。工地里的隆隆炮声，撩拨着这位人民领袖的心弦。少奇同志说：“依靠人民，共同守岛。”

车队从摩鼻岭下来，9时30分左右，少奇同志来到了许昌连的连部。一下汽车，他连一口开水也来不及喝就走进连部俱乐部视察。他仔细认真地参观了《战士园地》墙报。约15分钟后，少奇同志又沿着室内的通道走进了战士住的寝室，在战士的床上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在定海守备区副司令员张明的引导下向许昌连的施工现场走去。他踏着崎岖的山道，翻过一个小山岗，沿着海边的山路走进一个小山岙时，只见前面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工地上，烟尘纷飞，战士们有的推着小车在奔走，有的正挥舞着大锤。正在该连当兵的周志坚中将和方中铎大校已经在工地的出口处迎接着，这时他们也已经认出了少奇同志，忙迎上前去向少奇同志行了一个军礼。少奇同志也健步上前紧握住了他们的手，无限深情地说：“我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你们的。”随即，少奇同志又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和工作等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身体很好！请委员长放心。”并代表

连队简要地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施工进度和战士们的训练情况。

稍停了停，少奇同志又对他俩说：“你们要注意劳逸结合，年纪大些，不能象小青年那样干。”

少奇同志来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工地。“刘副主席好，刘副主席辛苦了！”看到刘少奇同志风尘仆仆来到面前，正在坑道口外施工的战士们和协助部队施工的民兵班的同志们都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激动地高喊。满脸笑容的少奇同志频频向战士们招手：“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战士们响亮地回答。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少奇同志和战士们作了和蔼可亲的攀谈。这时，随从的王光美同志也迎上前去，与民兵班的女同志亲热地握了握手，也作了亲切的交谈。

周志坚众人簇拥着少奇同志边走边谈，当走到坑道口时，少奇同志不顾劝阻，戴上安全帽，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了正在施工的坑道。他很感兴趣地观看了方中锋大校和战士们的“手拉滑锤”等作业操作。当少奇同志从坑道里出来，将要离开工地时，他对正在进行的国防施工作了充分肯定后，又对如何抓好国防建设和军民共守海岛等方面作了重要指示：“部队不但要把自己的工事修好，而且也要把人民群众战时需要的工事修好，一旦打起仗来，要使全岛人民都能得到安全。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依靠人民，共同守岛。”他还嘱咐驻军领导，既要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也要帮助官兵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还要抓一下文体活动，把岛上部队的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使战士能安居乐业，生活不枯燥。确保连队官兵安心长期守岛，以岛为家。

少奇同志要大家吃得好，睡得好，守好边防的一席话，使同志们感到温暖和兴奋。这一夜，许昌连营房里灯火通明，全体指战员长时间沉浸在见到刘副主席的喜悦之中。

告别了许昌连的指战员，车队往沈家门方向驶去。汽车行驶在舟山岛东部洁净的砂

石路上，山间盆地里快要收割的晚稻一片金黄，公路附近时有三四米到十来米不等的小高炉烟囱从窗外掠过。少奇同志凝望着车窗外村庄里热气腾腾的景象，他的眼前又重现近半年来在河北、安徽、江苏等地视察时目睹的一切。使他又一次陷入了对“大跃进”的沉思。

车到沈家门，中共舟山地委代书记王裕民一边指点着，一边认真地向少奇同志介绍着大办钢铁和大办农业的情景时，少奇同志默默地听着，有时轻轻地点点头，从他的默许中可看出，少奇同志是肯定了舟山人民在工农业生产中取得的成就。当讲到渔业生产时，少奇同志接过话题说，“把现有的木帆船都要变成机帆船，将来还要造钢质渔轮。”接着，他又用询问的口气说，能否围些海涂，搞些养殖场？后来普陀、岱山等地大规模地围涂兴办对虾、罗非鱼等养殖场，就是与少奇同志“围涂搞养殖”的指示有关。11时左右，少奇同志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在舟山水产食品厂码头等候的海军舰艇。随着汽笛的响起，舰艇徐徐地离开了人声喧嚷的沈家门渔港。

千古三圣，南海圣境。委员长巨手一挥，领袖与战士留下了难忘的瞬间。

金色的艳阳，将东海海面上的波涛融入粼粼的银光之中。缓缓驶出马峙门水道的舰艇开始逐渐加速向莲花洋驶去，军舰破浪前进着。少奇同志走进了舰艇的会议室，非常认



刘少奇登上摩鼻岭仔细察看舟山本岛设防

真的听取了舰队领导同志关于军舰的使用质量等情况汇报。简要汇报结束后,少奇和王光美等同志来到甲板上,对莲花洋周围的岛屿和海域进行了详细的观察。时而他也把目光投向振翅跃起、冲向蓝天的海鸥。

舰艇在普陀山洋面停泊。少奇同志又转乘登陆艇到短姑道头上岸。顺着条石铺成的石码头前行,陪同人员指着道头上方高高耸立的海岸牌坊向少奇同志作了介绍。来到牌坊前,少奇同志停住了脚步,观看了牌坊上的“南海圣境”、“同登彼岸”、“宝筏迷津”等题额和浮雕。接着他把目光移到了牌坊的门柱上,轻声地念完楹联后,便沿着依山循坡、逶迤而上的妙庄严路走去。当走到“金绳开觉路,宝筏渡迷津”的碑刻旁,他稍作停留,反复看了几遍,最后轻声地说:“这是董其昌的手迹”。在场的同志对少奇同志广博的知识都敬佩不已。

到了正趣亭,舟山驻军政委张秀龙问少奇同志是否休息一下,他摇摇头说:“目的地还有多远?”当张秀龙告知三圣堂就在下面时,少奇同志随即应道:“那我们走吧。”一会儿,他和大家边说边笑走进了三圣堂那古朴寂静的庭院。一进门,张秀龙就带点歉意地说:“刘副主席,我们本来想安排您在文昌阁休息,但那里正好在装修,所以就安排您在这里休息了。”少奇同志随即应道:“这里也很好嘛!”

太阳高挂,这时从驻军招待所做的饭菜已经担到三圣堂。少奇同志中午就和驻三圣堂的指战员及随行人员围坐在一起用餐,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战争年代的战友中间。桌上摆的四只炒菜加一碗蛋花汤,有二只菜还是当地驻军战士种植生产的东西做成的。少奇同志一边吃一边兴致很高地与战士们聊天,大家无不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之中。

在三圣堂简单地吃完中饭,中午有了一点机动的的时间。这时在少奇同志身边朝夕相处的随从人员和已经相处了几天的省、地陪同人员都感到无比的幸福,非常想和刘副主

席、王光美同志照张相留念。这时的少奇同志好象看出了同志们的心思,对陪同的同志说,这里风景很好,我们到门口去走走,顺便在这里合个影。大家一听要和少奇同志合影,个个都喜出望外,很快走到门口在少奇同志身边站成一排。正当摄影记者举起相机要拍摄时,少奇同志突然看见了什么,举起手向摄影的记者摆了摆手说:“等一等,还有一位同志。”然后又向站在墙角旁的一位警卫战士招呼着说,“小同志,你怎么不过来合影?”

这位警卫战士见刘副主席喊他,一时间,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起,他感动地急忙跑过来,高兴地和少奇同志站在一起,留下了难忘的瞬间。这就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风格,少奇同志与普通的随从人员都亲如手足的情景,使当时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等人都十分感动。

普济禅寺,“佛国”古刹。少奇同志在此视察,不但善解民意,而且还指示要解决点灯用油。

重檐歇山顶的御碑亭里面,有汉白玉石制成的御碑,铭文记载着兴修普济禅寺的情况及本山的历史,碑首上的蟠龙雕刻精细。知识渊博的少奇同志看得很仔细。大家看着他沉默不语的神情,好象都已心神领会:这些碑刻都是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

看罢御碑亭,当少奇同志一行走到海印池的平桥上时,眼明手快的摄影记者看到少奇同志雄纠纠、气昂昂的情景,连忙按下了快门,将这珍贵的瞬间永远留给了后人。

虽然,少奇同志来到普陀山的喜讯是保密的,但还是有不少得到消息后自发而来的群众和僧众恭候在普济寺的山门外,夹道欢迎刘少奇副主席的到来。敬爱的少奇同志面向欢迎的群众,不断挥手致意。有的群众踮起脚一睹这位风云领袖的风采。走进山门,绕过天王殿,少奇同志在普济寺当家真裕法师陪同下来到了“圆通宝殿”。“宝殿”为全寺主殿,初建于宋嘉定七年(1214),重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百人共入不觉宽,千人齐登

不觉挤”，故有“活大殿”之称。少奇同志边听当家师的介绍，边浏览大殿里供奉的毗卢观音圣像和三十二观音应身诸像，时而为巧夺天工的雕塑技艺发出默默的赞许。

这时候，正在大殿里值班的了空法师发现这个由当家师陪着的气度非凡的客人非常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他是谁。因为今天早上他只听说有中央领导要来寺院参观视察，而没有人告知他是刘少奇副主席要来，所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想起了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像上经常见到的刘少奇副主席！“是刘副主席！”他脱口而出。接着，上前几步，激动地说：

“刘副主席您好，今天能见到您真是有缘啊！”然后，少奇同志也与了空法师攀谈起来，问起了他的姓名、籍贯、生活，几句话很快解除了空法师的紧张感和顾虑。谈话间，了空法师还提出请刘副主席留言的要求，少奇同志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至今，少奇同志的亲民作风还在当地群众中传为美谈。

一会儿，当家师把当时藏在普济寺的清朝皇帝的圣旨、题词、御赐龙袍等捧出来给少奇同志观赏。他反复看了几遍，此后沉思良久，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陪同的省、地领导在说，普陀山这些珍贵的文物古迹，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

当少奇同志驻足仰面向上看时，看到琉璃灯没有亮着，便关切地问：“这灯为什么不亮？”当真裕法师如实告知因为缺少菜油而不点灯时，他当即就关照陪同的王裕民同志“给予照顾安排”。此时，大家都深深地感到少奇同志那种关心宗教事业的良言是多么难得的

真知灼见，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能够作出这类指示的人，又是具有何等的远见卓识，何等的大无畏气概！

少奇同志这几句发自肺腑的话，在他离开舟山以后，引起了地委领导的高度重视。王



刘少奇同志在许昌连观看《战士园地》墙报

（前排右起：一.张秀龙、五.王裕民、六.刘少奇、七.张明、八.齐安昌）

裕民代书记回到定海后马上找到粮食局有关领导，落实了少奇同志的指示，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的菜油给普陀山的三大寺作为点灯用油。从此琉璃灯又亮了。即使是在八年后“文革”之初扫“四旧”时期，地、县领导还都是竭力主张保护普陀山的文物古迹，同时也采取了一定措施反对“红卫兵”的“抢砸”行为。在关键时刻，普陀山的驻军及时地进驻普济、慧济、法雨三大寺及杨枝、悦岭等庵堂，有效地保护了这座佛教名山的数千间殿屋和大部分馆藏文物。1979年以后，普陀山全面开发建设，使普陀山的旅游资源得到了开发利用。

千步金沙，浪潮嬉滩。舒卷的紫气中，印下了时代的伟人。少奇同志说，这里可以把它建成“海上乐园”。

离开普济寺，引少奇同志去走千步金沙。路过玉堂街那段上山的香道时，少奇同志深情地朝香道旁的“梅鼎金沙”摩崖石刻看了看，然后转身朝千步金沙走去。“黄金如屑软如苔，曾步空王宝筏来。九品池中铺作地，只

疑赤脚踏莲台。”这里少奇同志对此处兴趣很浓,在这纯净松软、犹如铺茵设席的沙滩上缓缓地走着,陷入了久久的思索。虽然秋天的海岛特别凉爽宜人,但是,忧国忧民的少奇同志心里却象揣着一团火,难以平静。今天,当他饱览了这座佛教名山的“佛国”景致,不禁触景生情。于是,他向走在身边的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地负责同志谈起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题。当讲到佛教在民间影响时,他说,对佛教的信仰,不但在中国国内影响很深,在东南亚一带影响也很大,东南亚有的国家就是把佛教奉为国教。所以,我们要十分关注佛教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去有人提出消灭佛教,现在看来是件很难的事。你们到杭州灵隐寺去看看,一些老太太背着黄袋子,手拉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去烧香拜佛,就这样一代一代影响下去,能消灭吗?我们要正确地宣传佛



刘少奇同志(前排右二)在普陀山

教政策,认真做好佛教工作。讲到这里,少奇同志望了望无垠的大海,接着说:“在这里搞建设要尊重佛教界的意见,要保护佛教特色。”少奇同志对宗教问题的论述,是颇有史家见地的,无不体现了伟人风趣中的智慧与胸怀。

走过了大半沙滩,来到锦屏山下。此时虽是烈日当空,但法雨寺前面一片枝繁叶茂的古树林下却是清凉天地,令人心旷神怡。少奇同志极为惊奇和欣赏,高兴地说:“这里绿化得多好啊!”接着,又深情地对走在身边的同志说:“这片树林长得真好!如果整个普陀山、舟

山山头都能像这样绿化起来,不但对美化环境、保持水土有很大好处,而且对国防建设也有重要意义。”那声音虽然不是很大,但很凝重,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时间虽然过去了40年,但我们只要联想起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以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去体验伟人的情思。

走在法雨寺前面的公路上,少奇同志对舟山一些军政负责同志说,舟山是个好地方,要好好建设,把它建成海上乐园。少奇同志视察舟山40年后的今天,“海上乐园”已初步建成。少奇同志美好的愿望,如同一根历史的接力棒,它已经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实现。

普陀山佛教协会的一位法师回忆说:“当年少奇同志的这番话,使得普陀山人如沐春风,全山的僧尼和机关干部及农民、解放军战士都热烈响应,以后每年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植树。现在前山到中山去的大路两旁及附近山头,象热水瓶大的树都是少奇同志来过以后种的。”

从梵音洞乘车回来,太阳已经西斜。少奇同志又一次深情地朝法雨寺方向看了看,随后回到了短姑道头。人们列队热烈鼓掌欢送,少奇同志一一握手告别后仍然乘登陆艇登上了“南昌”舰。

当舰艇驶过蚂蚁岛附近海域时,王裕民等同志站在甲板上向少奇同志介绍了蚂蚁岛渔民的近洋张网作业情况。在“南昌”舰的会议室里,少奇同志接见了蚂蚁岛公社书记陈阿毛、社长陆渭川等人,听取了他们关于蚂蚁岛公社渔业生产等情况的汇报。黄昏时分回到了镇海穿山码头,当晚驱车抵达宁波视察。

自那以后,舟山人民都期待着刘副主席再来舟山。岁月如流,遗憾的是刘少奇同志在离开舟山11年后便遭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而死,在这11年中他再也没有来过舟山。舟山人民这热切的心愿竟变成了无尽的遗憾,永恒的怀念。○

责任编辑:秦永禄

本文摄影/程富年 童本骅

普陀区(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简

介

□谢永根整理

普陀 1953 年 4 月建县,8 月 10 日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123 名,商议和决定渔农业生产、渔区民主改革、肃清反革命、巩固国防等事项。

1954 年 7 月起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至 1987 年 3 月共召开九届县人民代表大会。

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两次会议。1954 年 7 月 13~17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代表名额 159 人,出席 151 名。会议作出加强互助合作、巩固国防、封山育林等决议。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新宪法还未正式颁布,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未作变动。1955 年 10 月 25~30 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代表 135 名。选举孙在洲为县长,罗延祥、金岳盛为副县长。

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两次会议。1956 年 12 月 8~12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正式代表 145 名。会议在肯定工作成绩基础上,批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部署增产节约运动。选举孙在洲为县长,罗延祥、韩云程、金岳盛、孙玉亮、林德助为副县长。1957 年 6 月 22~27 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代表 125 名,提出整顿巩固渔、农、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充实基层,下放干部,在群众中进行法制教育,特别是《婚姻法》教育。

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1958 年 6 月 1~5 日召开,出席代表 181 名。会议本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作出关于大办地方工业、关于文教卫生工作等决议,罢免两名所谓“右派分子”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选举孙在洲为县长,韩云程、金岳盛为副县长。

1958 年 12 月普陀县人舟山县,1962 年

6 月普陀县恢复。

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1962 年 7 月 22~24 日召开,出席代表 220 名。会议部署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选举艾衍笃为县长,韩云程、陈守安、金岳盛为副县长。

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两次会议。1963 年 12 月 3~6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 194 名。韩云程副县长作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部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运动,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选举艾衍笃为县长,韩云程、金岳盛、陈守安为副县长。1964 年 7 月 16~18 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代表 215 名。号召全县人民为实现全年渔业、粮食、棉花及生猪等生产任务。

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1966 年 5 月 5~8 日召开,出席代表 215 名。会议贯彻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确定全年各项生产任务。选举彭富贵为县长,韩云程、林德助、金岳盛、陈兆根、周教成为副县长。

1967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陀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实行军事管制。

县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 因“文化大革命”未开,后以 1971 年 11 月 3 日召开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替代。会上宣读舟山地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普陀县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公布县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三次会议。1980 年 12 月 13~19 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 340 名。确定 1981~1985 年全县国民经济建设规划指标。选举田华为县人大常

委员会主任(兼),王奕庆、李雪仙(女)、妙善、黄志钧为副主任;周源丰为县长,张才德、胡秀生、李文隆、王世和为副县长。1982年2月19~21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代表339名。号召全县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抓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争取国民经济更大发展。1983年3月3~5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出席代表332名。通过《积极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决议》。号召全县人民立志改革,不断创新,开拓前进。

县第九次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三次会议。1984年6月10~14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292名,周源丰县长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充分发挥渔业优势,重点发展工交旅游,全面搞活城乡经济,三年实现翻一番目标”和1984年各项任务。选举周源丰为人大常委会主任,邵琪珠、黄志钧、李安德、开仁(女)为副主任;阮有根为县长,黄法义、吕启发、赵宝珍为副县长。1985年4月8~11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代表240名,增选贺斯福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6年4月20~23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出席代表235名,同意辞去1名县长、2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补选马其忠为县长,姜复月、张才德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7年3月普陀县改区,区人民代表大会沿县人民代表大会届次。

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三次会议。1987年4月7~11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233名。会议确定今后三年继续贯彻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要求到1989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66亿元,年递增9%;国民收入4.95亿元,年递增8.8%。会议选举姜复月为区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贺斯福、张才德、黄志钧、向联谊为副主任;马其忠为区长,张家盟、唐孟龙、吕启发、赵宝珍为副区长。1988年4月12~15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确定“完善、稳定、开发、调整、提高”为1988年工作指导方针。1989年4月12~15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出席代表240名,确定以坚持改革开放,落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方针。

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三次

会议。1990年3月26~3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274名。会议确定“以渔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基础设施为重点,市场为导向,科教为依托,全面发展普陀经济”方针。会议选举于辉达为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贺斯福、吕启发、周教成、向联谊为副主任;马其忠为区长,吕建生、楼启兴、吴滋信、唐孟龙、李安德为副区长。1991年3月27~31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代表274名。会议同意于辉达辞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补选贺斯福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意马其忠辞去区长职务,补选吕建生为区长。1992年4月21~24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出席代表272名。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五次次会议。1993年3月26~3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275名。会议提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4%。选举吕启发为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虞和德、曹昭清、李安德、蔡友仙(女)为副主任,选举吕建生为区长,周利华、楼启兴、方忠信、庄迎昌、麻广灵为副区长。1994年3月20~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代表274名。确定1994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任务、目标。1995年3月15~19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出席代表271名。提出加快经济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1996年3月18~21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出席代表264名。会议作出关于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决议。1997年3月24~28日举行第五次会议,出席代表260名。审议政府等工作报告,作出相应决议。

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1998年3月15~2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182名。会议确定今后五年奋斗目标,到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亿元,年均增长10%。部署1998年各项工作任务。选举赵宝珍为区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虞和德、蔡友仙(女)、楼启兴、留卫男为副主任;选举周克非为区长,乐玉龙、庄迎昌、张忠华、张友华为副区长。○

责任编辑:胡永久



烈火中永生

——追记救火英雄陈建军烈士

□陈荷亚 夏国锋/文

在消防武警这支英雄的队伍里，又涌现了一位烈火金刚式的英勇战士，他，就是生前被称为“雷锋式的好班长”，在渔轮大火中英勇献身的陈建军烈士。

(一)

初夏的沈家门渔港，白帆点点，一片繁忙。1998年5月15日中午1点13分，普陀消防中队接报警：停靠在鲁家峙修船厂码头的一艘渔轮起火。上级命令中队立即出动。战斗一班班长陈建军带领全班率先行动，登船渡海，直奔火场。

起火的渔轮“久远820”是舟山远洋渔业公司从日本进口的300吨级远洋鱿钓船。船体十分复杂，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被分割成若干小舱。火从底部机舱开始燃烧，员工们自救无效才向消防部队报警。由于最佳灭火战机已经贻误，此刻渔轮上火势凶猛，滚滚浓烟从舱内向外翻涌。现场指挥员决定兵分两路，先扑灭外围的火，然后攻击内部的火。然而，由于温度过高，毒雾弥漫，能见度低，扑救行动一再受阻，到1点35分时，船体外围火势才基本得到控制，但是舱内烟雾却越来越浓，辐射热越来越强。消防官兵们分析：中舱以下的部位肯定有更大的起火点，必须尽快找到并且扑灭！如果船舱内油箱爆炸，这价值270万元的国家财产将毁于一旦，在场人员的生命也会受到严重威胁，整个渔港也将遭到严重的影响。

情况万分危急！

为了遏制爆炸发生，现场指挥员决定立即组成突击队，实施强攻！陈建军挺身而出，“我上！”此时的内舱，毒烟已经足以使人窒

息，长时间燃烧产生的高温更令人望而却步。进一步生死莫测！退一步安享太平。陈建军当然明白“我上”的含义。深知陈建军性格的中队领导为陈建军整了整空气呼吸器，又为他整理了一下钢盔，叮嘱他说：建军，小心点，实在进不去，就出来。只见他携带着灭火和防护装备，在战友们的配合下毅然冲进内舱。

20分钟后，与陈建军同去的何王玥波等人被猛烈的火势逼了出来，但陈建军没有出来，现场指挥员马上料到可能出事。

“陈班长”、“建军”，他们喊，他们叫。他们不顾一切地进行了4次强攻援救战友，但都被热浪和毒烟逼了回来。

2点50分，战友们再次组织强攻，终于在底舱接近着火点的机器旁发现了昏迷的陈建军。当战友们把不省人事的他救出舱的时候，发现他全身已多处被烧伤，紧握水枪的左手掌也被烧焦，战友们以最快的速度把陈建军送到了普陀区人民医院。此时的陈建军已经停止了呼吸。但战友们不愿这么想，“医生，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活他呀！一定要救活他！”光着膀子守在旁边的战友楼建纲哭着跪在了大夫的面前；但医生们更不愿这样想，他们投入最好的设备，请来最好的医生，在全力抢救这位优秀的战士。

但是，经过医院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急救，终因伤势过重，下午4点50分，陈建军不幸献出了他年仅22岁的生命。

(二)

陈建军，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人，1994年12月入伍，1997年6月入党。他入伍4年来，曾先后10余次受到部队嘉奖，1996年被

省消防总队评为全省消防部队优秀共青团员,1997年被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陈建军在他短暂的生命中,把青春奉献给了消防事业,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威胁,在熊熊烈火中,人们常能目睹他矫健的身影。

去年3月22日上午,红山路9号的一栋老式木结构民宅起火。当时屋里只有一位80高龄的老太太,陈建军和战友们刚将这位老太太抢救出来,又得知老人平时攒下的钱还放在褥子里,陈建军立即返身冲进火海,把老人的那点积蓄抢了出来。去年7月2日上午8时,舟山兴业有限公司码头上的一艘运输船船舱起火。经一段时间扑救后,未能有效遏制火势。又是陈建军冲入浓烟滚滚的底舱,边用水枪扑火,边将舱内还未着火的纸箱转移给上面的战友。当他在舱底奋战1个多小时后爬到舱口上时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将他送到医院急救后,才脱险。

这样的事实在太多。96年12月25日,沈家门港内一艘渔船因船底破漏,面临沉没危险。消防中队闻讯前去抢救。当时正值寒冬季节,陈建军毫不犹豫地第一个跳入了渗满海水的船舱内。冰冷刺骨的海水浸透肌肤,冻得他浑身发抖。时间久了,几名战士要求下去替他,都被他拒绝。在偌大的舱内,他整整摸索了二个小时,硬是找到了漏水处,堵上了漏洞,此时他的双腿也已被冻得麻木僵硬。

今年5月4日,也就是陈建军牺牲前十一天,他临危受命,参与处置了一起装运煤气瓶船只被撞的严重事件。那天晚上10点左右从宁波满载煤气瓶的岱渔运11号船行驶到朱家尖大桥施工区附近海域,被一渔船迎头撞击。船头被撞出一个大窟窿,海水涌入,船体颠簸,486只煤气钢瓶猛烈碰撞,只要一只发生泄露,引起爆炸,就会船毁人亡,还将危及到大桥工程的安危。

同往常一样,陈建军始终战斗在抢险行动的最前沿。在浸满海水的前舱,他扛起一只只处于飘浮状态的钢瓶,送到救护的船上。在现场负责指挥抢险的普陀区委副书记王东方,特别注意到这个年轻的战士。他那样勇敢顽强,又那样灵活善战。他问一位消防警

官,那位战士叫什么?警官告诉他,叫陈建军。王东方连连说,名不虚传。原来,陈建军入伍以后不仅苦练出过硬的消防本领,还在部队内外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被誉为雷锋式的好班长。《舟山日报》曾经以显著的位置对他的事迹作过报道。王副书记看过报道,没想到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把陈建军对上了号,从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15日那天,王副书记正在开会,听说一位消防战士在灭火战斗中英勇牺牲,凭直觉他感到可能就是陈建军。赶到现场一看,自己的判断得到证实。他心中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

陈建军,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消防战士,更是新时期一个有理想,有丰富感情的青年。在他牺牲以后,人们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抽屉里有三块漂亮的小石子,上面分别刻有“陈”、“建”、“军”三个字。每颗石子的背面都铭刻着“一生平安”四个字。

陈建军何尝不知道火场的险难,和平常人一样,他也渴望自己一生平安。千里之外的桐庐乡下,他那劳作一生的父母和11岁的弟弟也盼望着他平安归来。但是只要警铃一响,当人民的平安受到威胁时,陈建军就会热血沸腾,把自己的平安忘在了脑后,义无反顾地冲向火海、冲向险区。

陈建军在他那短暂的消防军旅生涯中,处处闪耀着人格的魅力。用雷锋式的好班长来形容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建军1994年12月入伍到普陀消防中队。他训练极为刻苦,一次登高训练,陈建军的左臂被挂钩梯齿钩扎伤,鲜血直流,送医院缝了7针,未待痊愈,他又投入训练。平时,他严以律己,不怕吃苦,很快,在向人的体能极限发起挑战的训练场上,体质并不超众的他脱颖而出,凭着苦练成为强者。入伍第一年,他就被破格提拔为战斗班代理班长,不久被任命为正式班长。

英雄的成长不是瞬间而形成的,陈建军壮烈牺牲了,他那奋不顾身冲进熊熊火场,可歌可泣的事迹,海岛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中。



我在淮北战场一日

□杜梅口述 王兰生整理

1944年夏，我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在东至运河、西至津浦铁路横宽百余公里的战场上，对日军第65师团及守备伪军展开攻势作战。我所在的淮北军区第1军分区（又称淮北军区路东军分区，1944年11月改编为华中军区第7军分区）骑兵大队接到命令，负责配合兄弟部队掩护我军主力攻打泗县城。

淮北路东，又称皖东北，西起津浦铁路，东临大运河洪泽湖，南靠淮河，北抵陇海铁路，包括安徽东北部、江苏西北部各一部分，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余万。这里地形复杂，湖荡兼有。秦汉以来，淮北向为重要古战场，隔淮相望的盱眙与古泗州，是大军南来北往的必经渡口。据《史记》载，楚汉该下之战（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就发生在灵璧、泗县交界处，至今泗县尚存虞姬墓。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向西可连接豫皖边，向东直达苏北，南下可通淮南根据地，是新四军发展苏北和华中解放区的必争之地。

记得那天是在1944年初夏，部队正在进行紧张训练，突然接到军事行动命令，我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开始进行粮草准备，根据大队长冯宝宪、教导员张尚古的指示，干粮、马料各带三天的量。部队开出驻地后，在野外进行了简短动员，我们的任务是，发挥骑兵行动快捷、机动性强的优势，参与打援行动，保障攻城部队今晚解放泗县城。夕阳西下，夜幕降临，部队迅速向指定地点开进。这时我的心中也是既紧张又高兴，紧张的是，打援阻击任务，贵在高度隐蔽，才能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大队骑兵部队要做到此点，并非易事；高兴的是，上级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骑兵大队，感到非常光荣，责任重大。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有些多余。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军马又何尝不是如

此呢？都说军马通人性，懂人语，根据我的实践经验，要做到这样，一靠严格训练，二靠关心爱护。在平时，我们根据战时可能遇到的情况，首先训练夜行军，第二训练听枪炮响，第三训练听口令，第四训练熟悉主人示意的动作内容。使军马做到夜行军如同白昼，爬坡崖像走平地，枪炮响不惊不叫，手势动作一到，立即作出正确反应。这些动作和训练内容这次执行打援阻击任务都用上了。说到爱护军马，凡当过骑兵的同志都有亲身体会，首先是提高认识：军马也是重要的战斗力诸要素之一，也是“战友”，骑兵离了马就像鸟无翅、虎无足；二是吃饭喝水，先马后己，说来也许有点可笑，骑兵准备的干粮有时难分什么食品、马料，因为关键时刻，人可动员坚持，军马不能不喂；三是体贴照顾，胜过自己，如军马生病要及时养、治，暴雨严寒，注意遮盖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久而久之，战士与军马就建立起深厚感情，军马也就通了“人性”，对主人的意图能够正确领会，对主人的决心也能尽力实现。

到达预定地点后，我们把战马拉往庄稼地，天色已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将手轻轻一拍马背，军马当即卧倒。时近午夜，我军总攻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枪炮声响成一片，不久自北而南鬼子的增援部队在探照灯搜索下开来，上级交待我们骑兵的任务是：敌人未发现我们，我们不首先开火；我军步兵未出击，我们不首先行动，以免过早暴露目标。当敌人的探照灯光照来时，我的坐骑头部轻轻动了一下，马蹄也稍稍挪动，我当即抖抖缰绳，拍拍它的嘴巴，它就立即不动了，部队潜伏四个来小时，一百余匹军马甚至连个响鼻也没打，要做到如此确实不易。

午夜时分，随着我攻城部队行动的展开，敌增援部队几次向我守备地域左右靠近，均遭我军英勇阻击而未能靠近城下。我们骑兵大队每人一支马枪、一把军（下转第20页）



□陈育民/文

情 况

1922年,我出生于浙江省定海县蒲岙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我4岁时父亲去世。8岁给地主家放牛,12岁就到大沙湾跟章夏生师傅当学徒(蔑竹匠)。在这里经常有些教书先生(张、王、姚)给我们学徒工讲革命的道理,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等等。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共产党的主张,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公开合法的革命活动。这些教书先生还让我们学徒工成立手工业工会(泥水匠、木匠、竹匠等)、农会等,当时我都积极参加了工会、农会的组织和活动。

1939年夏,国民党军队在未作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定海城和沈家门镇就被日寇占领了。日军对当地群众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整个定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0年,在地下党员徐长海等同志领导下,我成了工会、农会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

根据对敌斗争发展的需要,按照徐长海同志的指示,于1940年在蒲岙乡组建了抗日游击武装,当时定名为“抗日游击小组”,上级要求我们进行长期的隐蔽活动,不要和公开的抗日武装发生横的关系,游击小组的主要任务有三条:

一、收集敌情;

二、组织带领群众反清乡、反扫荡的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阻止给日本人送粮食等;

三、保证我政工人员的安全,惩办地方上

的坏蛋、汉奸,消灭小股武装敌人骚乱。

1940年至1945年,我抗日游击小组的建立和发展的具体情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0夏秋到1941年底,是我抗日游击小组的初建阶段。开始有五人组成,即陈兴德、陈阿仁即马明仁(放牛的雇工,是我的两个哥哥),金明善(小学教师)、陈友定(泥水匠)和我(陈阿有,竹匠)。成立抗日游击小组后,为了抗日活动方便,我不做竹匠了(因竹匠职业固定,不便活动),我就利用大哥留在家中的旧铜匠担子改做铜匠了。我挑着担子到处流动,作为职业掩护,进行抗日斗争,一直坚持到1945年3月为止。1941年年底,游击小组又扩大了成员,即:金明树、杜有根、周阿昌、周宝根,全组共九人。这时的主要活动情况是:除做好经常性的工会、农会工作外,重点还是武装活动,如在1941年夏天,我们在板桥头埋下地雷,炸毁日寇的军用车辆,这次活动成功了。但事后,遭到日寇对当地群众的报复,烧了民房数间,这是由于我们考虑不周给群众带来的损失。为此,我们根据徐长海同志的意见,对这次斗争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将腿有残疾、目标明显的金明善同志安排到别处开展活动即教书(但仍为我组成员)。

(二)1942年初至1943年底,为抗日游击小组的巩固阶段。在游击小组集中活动时,曾一度集中吃饭,形成了半公开抗日武装,经徐长海等同志指示后,仍改为隐蔽斗争。这两年当中,尽管日、伪经常联合下乡扫荡、清乡,袭击我们,曾打死送粮的群众数人,但我游击小

组仍然坚持斗争。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小组骨干和两个政工队员在蒲岙庙内举行了集体宣誓,誓词内容大致是:“同生死、共患难、不投敌、不叛变、不出卖同志,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并重新明确了我小组的三项斗争任务。从此,我游击小组的活动就更加活跃了。活动范围也从蒲岙本乡扩大到邻乡,甚至有时到其它岛屿或到敌人据点附近活动。如1942年的夏天,在鱞鱼山尖,我游击小组再次炸毁日寇军车。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我们对敌斗争的策略是:“只打击,不报名,打完就走”,所以敌人不知道是谁打的。有时我们在敌人的据点附近或日寇要通过的道路,扔下几枚手榴弹,或埋上几颗地雷,达到了骚乱敌人军心、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目的。在对敌斗争中,由于我们得到群众的多方支持,我们的游击斗争坚持5年之久。

在农会工作方面,我们主要进行了“二五”减租,并警告坏人不许破坏等。

1942年下半年,按照徐长海同志“长期隐蔽,不与公开的抗日武装发生横的联系,继续壮大游击力量”的指示,我们决定让陈兴德、周阿昌、张二姐(陈兴德的妻子)三同志去白泉后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成立游击小组,属我游击队领导。他们曾通过蒲岙张阿登的关系,与鲁定海部有过联系,不久鲁部撤走,他们仍留下坚持隐蔽斗争。

这时的形势发展到后期,对我不利,特别是公开的抗日武装和我们的领导一一撤走后,我们游击队的压力就更大了。国民党和日伪到处寻捕我们。徐长海同志牺牲了,别的领导同志也不见了。这时我们游击队多为分散活动,主要是收集敌情和武器弹药,以等待时机。

(三)1943年年底至1945年3月,是我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壮大阶段。在这两年的对敌斗争中,情况是既复杂又残酷的。1943年秋以前,在定海有我公开的抗日武装活动,游击队每打一次日伪军,敌人都向我公开抗日武装进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敌人不大注意我们这支隐蔽游击武装。在我公开抗日武装撤离后,敌人的目标就集中于我们了。所以,就使我游击队的活动处于不利的地位了。幸有王博平同志在1944年冬撤离时指示我:“万一有问题或特殊情况,到三北庵东去找工商

管理局的吕炳奎或其他人都行”,并反复告诉我,如实在不行,你就去庵东。根据当时斗争的复杂情况,一九四四年初,我亲自到了三北根据地庵东,到了工商管理局长吕炳奎处,他当夜带我通过两道敌人的封锁线(一是杭余公路;一是曹娥江)到达纵队司令部驻地,我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定海地区的敌情,以及我游击队坚持斗争的情况,并请示我们是坚持还是撤离,经领导研究决定:让我们继续在定海进行隐蔽的抗日游击武装斗争,仍坚持单线秘密联系,在条件许可时,还要发展武装,壮大抗日游击力量,但不要集中活动,以免暴露目标。当我返回定海时,领导上发给我香瓜式手榴弹12枚。与我同时回到定海坚持隐蔽斗争的还有赵祥、楼培元二同志,此时我抗日游击队员,已发展到19人了。我们的活动方式,仍以分散隐蔽为主,集中为辅,根据敌情,随机应变,为了打击敌人,遇有特殊情况时,我曾冒充国民党方面“自卫中队”分队长,“除奸组长”等等名义进行抗日斗争。由于我们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人晕头转向。因此,国民党的“独立中队”顾仁夫和“除奸组”黄华牛狼狈为奸,勾结日寇、汉奸联合对我进行疯狂的捕杀(包括“五大”留下来的人员)。敌妄图将我们一网打尽、斩尽杀绝。在形势严重恶化的情况下,我们这支抗日武装再隐蔽下去是不可能了。所以根据王博平同志离开定海时的指示精神,即实在不能隐蔽斗争时,就到根据地去。1945年3月,我从三方面得到情报,敌人要对我下毒手了——杀绝我们。于是我们决定:我和林尚和、蒋行水、赵祥、楼培元5个人先撤离,其他人都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听候行动。但我已晚了一步,当夜敌人将我和林尚和、蒋行水三人包围了,我和蒋行水同志突围,林尚和同志不幸被捕,第二天在金鸡山头被残杀。我到了三北抗日根据地后,被分配到浙东东海大队担任侦察班长。同年9月奉命北撤,我和吕炳奎同志一起分配到“苏北海防纵队”,吕任副政委,我任司令部侦察通讯班长。不久王博平也到达,王任组织科长。1946年六、七月间,国民党准备向我解放区进攻时,我和吕、王(我的领导)分手了,我被调到苏北军区的第七纵队司令部担任侦察排长。

○

责任编辑:邬永昌



金庸先生为桃花岛题词(中为金庸先生)

金庸戏说

桃花岛

□张奔 欧阳晓明/文

金庸先生是香港武侠小说大家，他创作的大量武侠小说中，当推《射雕英雄传》最为出名。

在《射雕英雄传》和姐妹篇《神雕侠侣》中，金庸先生用如椽之笔描绘了一个美丽而神奇的桃花岛，人物的许多活动在此展开。这个令人向往的桃花岛在哪里，金庸与这个地方究竟有怎样的渊源，人们一直关注着。

据说，《射》书“东海桃花岛”的原型就在舟山市普陀区境内。近年来，桃花岛被列入省级风景名胜区，海内外来岛寻访者日众，因金庸先生的著作而名声鹊起。

1994年4月6日至8日，金庸先生和夫人林乐怡女士抵达普陀作为期3天的访问，更是在当地引起轰动。

金庸先生说，桃花岛在他的书中、心中占有很大的位置。在游览佛教胜地普陀山时，他登上佛顶山，站在山顶向海天深处遥望，问“桃花岛在哪个方向？”当得知隔海不远处的岛屿就是桃花岛时，他就以桃花岛为背景接连拍了9张照片，并说：“这次因时间的关系不能访问桃花岛了，这是一个遗憾。有机会我很有兴趣访问桃花岛。”

听说随同采访的笔者是桃花岛人，金庸高兴地说：“我是第一次到普陀。《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年至1959年，那时并没有到过桃花岛。我是从地理书看到东海有那么一个岛。因为我是浙江人，写《射》书时需要一个海上的岛，有一点浪漫情调的，不能离大陆太近，也不能太远，桃花岛的位置很适当。它离南宋时的首都杭州不太远，从地理书看到岛的面积不小，南宋时期罕有人迹，十分适合给书中黄药师啦、黄蓉啦、周伯通啦一个活动的天地。不过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想象得多。书中宋朝时有桃花岛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如果人们要证实《射》书中东海桃花岛的原型是不是舟山群岛中的桃花岛，我说是的。”

金庸先生还说：“将来旅游发展了，桃花岛上可布置一些武侠小说里遐想的场景，比如黄药师在哪里居住练武，周伯通隐在哪个山洞，还有桃花阵、悬石滩等等，肯定会给旅客增加诸多兴趣。”听说桃花岛旅游开发已经规划到这一点，金庸先生不住点头称好。在游览普济寺时，金庸先生又摊开宣纸，挥毫写下“碧海金沙桃花岛”七个苍劲大字，转赠桃花岛。○

责任编辑：成定国

(上接第17页)刀，鬼子远了用枪打，敌人近了用刀砍，给了敌人以很大威胁和杀伤，经一夜阻击打援，保证了我主力部队在次日拂晓前解放了泗县城。

后来才知道这次攻打泗县城，不过是1944年3至5月我新四军发动的淮北攻势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攻势作战我军攻克

了泗县、灵璧县城及睢宁的大店、张庙等日伪据点50余处，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虏伪军副支队长以下1200余人，缴获大批轻重武器，不仅给日伪军以重创，而且锻炼了部队，鼓舞了士气和解放区军民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责任编辑：陈高兴

三毛与倪竹青的 书画情结

□童信扬/文

十年前的春天,台湾著名女作家——“小沙女”三毛第一次与舟山书法家倪竹青先生通了信,信中说:“故乡的亲人就算倪叔叔您了。”原来,三毛幼年时,倪先生曾在南京与三毛父亲共事相处过三年。他俩的深情厚谊早广为人知。此后,彼此鸿雁频传,言必倾心,倪先生被三毛视为“至高无上的人。叔叔的书画艺术使我看得发痴。”

我佩服女作家的慧眼识真,一语中的,在近期举行的倪竹青八十华诞庆典暨书画展上,书画界的行家高手一致认为倪先生的艺术人生集中体现了“德艺双馨”,与三毛对倪老的高度评价异曲同工。

在展出的 70 余幅作品中,楷篆草行,大中小微,山水花鸟,国画水彩,中堂、条幅、横匾、扇面,恰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此千姿百态的书画作品,很难叫人相信出于同一人之手!

看那一帧帧书法,笔画坚而浑,体势奇而稳,章法变而贯,通篇气宇融合,精神洒落。凝读他的字虽无色却具图画之灿烂,虽无声却有音乐之和谐,使人心旷神怡。而他的小楷之精妙更令人叹服,是极具收藏价值的珍品,正是印了“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的说法。

人们知道倪先生的书作曾多次获国内外大奖,硬笔书法还得过国际二等奖。但知道他同时擅于绘画(篆刻也很精通)的人恐不多。他的画骨苍神腴,泼墨淋漓,豪气横溢,韵味无穷。

其实,书画本同工。以书法透于画,画无不妙;以画法透于书,书无不神。三毛熟谙此理。她不仅是出书 20 余本,被译成 15 种语言的名作家,而且懂书艺,更长于绘画,曾得过油画金牌奖,举办过 10 次画展。她还是个执著的收藏家,倪先生曾应求一日一画,集而寄赠三毛,三毛爱不释手。她尤爱倪先生的竹

画,曾推荐在台湾刊物上发表。她曾说:叔叔取名竹青、守中,寓情寄意,是爱竹之中虚而质坚,坚守节操,淡泊明志,不慕荣利,体现了“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高贵品格,也是书画大家郑板桥《竹石》诗中精神风骨的写照。

正是由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胸怀坦荡,心无杂念,于字于画(处世处事亦然),一气呵成,不事雕饰,官民老少,有求必应,立等可取。人家是先书画而后托裱,倪先生常是面对空白裱轴一挥而就。这既是“德”的体现,也反映倪老书画的雄厚功底。

八十高龄,应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萎靡不振了,而倪老却仍思维敏捷,耳聪目明,精神抖擞。一管在握,或龙飞凤舞,兔走鹤翔,或堂正端庄,浑厚遒劲,龙马精神跃然纸上!何以为此?坚持“武备”是也。

须知笔力乃全身之力,若无足够之体力精力,欲掌好这管笔,左右前后旋转飞动使之濡墨纸上,并显其美观劲健之外形和丰满的精神内涵是无法达到的,故历有“有文事者必



有武备”的说法。70 余年来,倪老坚持练书与健身相辅而行。既苦随前贤之足迹,不甘光阴惰寸功,又大球小球成好友,以步当车健若飞。1985 年浙江省举办老年人乒乓赛,当时 55 岁够格,而倪老以“吃亏”十余岁的高龄参赛。别看他平时文静寡言,谦虚谨慎,运动场上面对强敌却当仁不让,生龙活虎,勇谋兼备,刚柔相济,格杀无论。灿灿金牌属谁手?得主竟是倪竹青。于是乎,人们在“德艺双馨”之外又给了个“全才”的美名。

三毛是个爱燃烧的刚毅女杰,而不是小心翼翼守住一个平淡人生的人。7 年多前她

我与段云的一次交往

□詹正茂/文

在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布置国民党八十七军在天津守防。塘沽一仗，数十门大炮一古脑儿丢掉，军长段云带着部队撤到宁波，未几辗转而退到六横岛。在六横岛约驻扎 4 个月光景，1949 年 9 月底，又退到沈家门。

我与段云接触在 1949 年浙江水产学校学潮以后，学校被国民党省教育厅宣布停办，我回到六横老家开办儿童暑期补习班，义务讲课。星期天走亲戚去看舅妈，表哥刘圣汶自小在上海经商，家中房子空着，被八十七军看中作为军部公馆。段云就住在他家。这一天巧逢大表哥刘圣沂(商人)作东，请段云吃饭，把我也拉入酒席。除段云以外，都是八十七军的头头，如参谋长、作战处长、谍报处长……大圆桌满满的一桌。表哥要我斟酒，自己搬菜，我可不愿给这些人倒酒，副官接去酒壶。我喝了一杯，思想又气又闷，谁愿意和这些人一起进餐，可却不能辜负表哥的好意，捞起第二杯刚到唇边，一个军官就发问：

“詹先生何处工作？”

“读书”我答。

“哪里读？”

“定海水产学校。”

“下学期怎么打算？”

“学校停办，还没有什么打算”。

“学校为啥停办？”

“校长贪污，无理开除学生……”，我正要说下去，冷不防另一个军官插话问：

“学校停办究竟是校长不好，还是学生不好”？

竟毅然“燃烧”了自己，告别红尘，远离了她的亲人倪竹青。三毛更是个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的人，她咳言自我，曾请倪叔叔题写“侠骨柔情”四字，倪叔叔却用嵌字诗加以形象发挥。诗曰：“侠义襟怀堪自怡，骨奇气灏意难羁；柔肠导尽千江水，情系文坛志不移。”

唉！人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雹碎春红，霜

我已受够了国民党的气，这铁证的事实还怀疑是学生不好！我把酒杯向桌上一登，说：“国民党大腹便便，贪官污吏专利独裁，谁不知道”！站起身我是豁出去了。

正在此时表哥刘圣沂搬了一碗鸡丝羹进房，一看段云离席，盘问：“人呢？”“人呢？”，从寝室请出段云，又向那些军官解释，“这是我姑丈儿子，他是学生，快吃，快吃”。他们坐了下来，我才坐下来，这一顿吃了受气饭，半肚饭半肚子气，饭后到了舅母房里，姓罗的副官跟了进去问：

“詹先生下学期到台湾读书去好不好？”

“家有老母，不能让她饿死，我不去！”我一口回绝了他。

国民党八十七军，原是由青年军二〇八师改编而成。为此又称“青年军”、“长江部队”。蒋介石视这批“知青”如宝贝，美式装备、卡兵枪、加拿大手枪、汤姆逊冲锋枪，又有远距离射程的大炮。军长段云，身材魁梧，足有一米七八十体高，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生。这个蒋介石亲手培养起来的军长，却在 1949 年 10 月前在沈家门神秘地“失踪”了，直至今今天还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后来，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段云在沈家门驻防期间，召开了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会后被人告密，不久就“失踪”了。”“斯人已逝，音貌宛在”。随着时光的流逝，反而日益增添我对他的怀念。○

责任编辑：邬永昌

凋夏绿！上苍何其吝啬！三毛与倪竹青的书画情结就此画上休止符了吗？不会的吧。举目望去，三毛祖居陈列室正在定海小沙镇紧张地布展，三毛定会看到她亲爱的倪叔叔正为之泼墨挥毫。惜乎！此文此书却成了泪透纸背的永恒悼念。○

责任编辑：邬永昌

教授之家 硕果累累

展茅翁氏教授之家

□ 谢永根文

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世居普陀区展茅镇横街村娄家井潭的一户翁姓人家,父亲是教授,七个子女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六个是教授、高级知识分子,被乡亲们誉为“教授之家”。

父亲翁斯鉴,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1919年宁波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4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1925年回国,抱着实业报国理想,先后在宁波商校、白马湖春晖中学、定海省立水产学校、上海吴淞水产学校任教。1929年在上海永新冷藏公司任工程师时,曾发明冷库隔热半碳化板、无胶结剂软板等技术。新中国成立后,斯鉴积极投身于祖国高等水产教育和科学研究,1951年秋起,担任上海水产学院兼职教授,

1954年2月专任水产学院加工系教授,并担任冷冻教研室主任。翁斯鉴的实业报国理想,不仅自己终身为之奋斗,还寄希望于子女一代。解放前后,他靠着有限的薪水收入,送七个子女上学,先后培育成教育、科技、卫生专业人才。

长子虎年,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精通俄、英、日、德四国语言,曾在上海徐汇区业余大学任日语教员,在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任兼职教授,讲授专业技术日语。六七十年代,他翻译了大量俄、英、德外文科技资料。后长期从事高等学校的外语教

育工作。

次子龙年,1951年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被分配在邮电部编译室工作,1955年调北京邮电学院任教,1979年评为副教授,1988年晋升教授。数十年来,发表有关论文20余篇,几次获得国家邮电部、中国通信学会、邮电高校的奖励,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传略被录入《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

长女善年,1955年上海华东化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在国家化工部设计院,1958年调武汉化工部第四设计院,1987年评为高级工程师。八十年代,善年参加国家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的编制,获劳动部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子未年,1957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后分配在学院附属的新华医院。1987年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第二医学院改名)副教授兼附属新华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1991年晋升为教授、主任。先后撰写了《慢性支气管哮喘54例临床疗效总结》等医学术论文20余篇。

次女侯年,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被分配到武汉市湖北医院(后改名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1987年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六十年代中期起发表了《无固定器牙立即再植术》等数十篇论文。

四子彪年,1961年北京矿业学院机电系毕业,先后在浙江长广煤矿公司、杭州矿灯厂搞工程技术工作,1978年调入浙江机械工业学校,从事专业技术教育,1990年评定为高级讲师。他先后在教育刊物上发表了《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构思与设想》等论文数十篇。

三女亦年,1956年毕业于上海速成师范学校,长期从事小学基础教育工作。

翁氏一家七位教授,实属海岛少有。

在今年八月翁斯鉴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翁氏家族30多人从国内外会聚到展茅

老家寻根祭祖，邀请乡亲好友举行纪念会。“昔日翁公斯鉴东渡扶桑矢志工业救国，今朝惠仁后人秉承遗业为国再创辉煌”，这是翁斯鉴教授诞辰百年家庭纪念会的一副对联，也正反映了其一家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不平凡业绩。

崇尚知识 重视读书

翁斯鉴的父亲翁世香，生于清同治年间，年青时随父耕作，有地田二十亩，家业殷实。世香自父去世弃农经商，在展茅横街、螺门一带致力商贸，后又在沈家门创办钱庄，遂成富户。世香生性开拓，在对独子斯鉴的培养上显示他的远见，为当地富户所不可比拟。他全力支持儿子去异国求学。传说当年有人为他算了一笔经济帐：从出国读书到毕业回归，需化费约 70 亩耕田的价款，若能买同样耕田作遗

产，则儿辈依靠田产收入终生吃穿可保无忧。世香则认为，地产败则可卖，用 70 亩土地费用“灌输于腹中”，成可创家立业，败则欲卖也难。人们无不为之所敬叹。

斯鉴继承父辈崇尚知识传统，重视子女培养，常说“积百亩田产，不如供子女读书，财产易失，知识永存”。他为人严谨，热爱祖国，青年时代目睹列强侵华，丧权辱国，怀抱实业救国理想，东渡日本学技求知。回国后矢志不渝，辗转在实业科技教育战线上，为国效力，贡献了毕生精力。子女们勤奋读书，刻苦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个个成为有用之材。翁斯鉴老先生的第三代也继承祖辈、父母崇尚学习、发奋读书的传统，有的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有的出国留学，服务祖国建设事业，风华正茂，开创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向联谊

一位百姓家中的

光荣匾

□陈雨信 俞品久/文

1951年2月1日，应秋(原名应信全)烈士的家乡——六横区蛟头村来了一班从定海县政府和六横区政府来的干部，他们中有定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家恒、六横区区长赵成恩、六横区教育界代表俞品久，以及县民政科的二位干部。他们是专程给烈士家属送光荣匾来的。光荣匾长 115 厘米，宽 45 厘米，红底金粉漆字，匾右边直书二行仿宋字：浙江省定海县人民政府赠给应秋烈士家属，匾中心四个雕出轮廓的隶体大字是：烈属光荣，上方是一大四小用黄漆喷涂的五角星，象征烈士为新中国建立光荣捐躯。匾左边落款是：县长王裕民(附加印章)、副县长王家恒(附加印章)，公元一九五一年二月□日。当时应秋的父母均已不在世，由其在家的弟弟应信义接受了此匾，并悬挂于堂前。据档案记载，舟

山解放初，定海县人民政府和所属县民政科，积极开展拥军抚烈活动，全县共向烈军属赠送光荣红匾 8 块，应秋烈士家的光荣匾即是其中一块。

应秋烈士，1925年后于六横蛟头。曾在家乡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3年从家乡来到浙东四明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参加抗日队伍，1944年任浙东新军某区中队指导员。1945年5月在宁波慈城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日军逮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应秋坚强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不久即遭敌人枪杀。后来，应秋所在的部队报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批准，于1950年5月18日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责任编辑：傅曦

舟山沦陷后,在六横嵩山道一战,日本鬼子兵倒了锐气。以后调兵遣将,发动定沈所有兵力,对我区各岛进行所谓扫荡清剿,残杀我无数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1940年4月27日,日军150多人,乘两艘军舰,对朱家尖岛发动围剿。定海自卫四大队一分队立即应战,后因弹尽而突围。队长刘光辉、稽查组长陈荣生、列兵赵阿桃三人不幸被俘,被解往西海边枪杀。敌人还把岙中居民全部驱赶到杀人的地方。日寇小队长站在沙丘上狂叫:“你们的知道中国兵的快说出来,不然和他们三个人一样的死拉死拉的!”

话声刚落,两个鬼子命陈荣生跪下,可是他依然是气宇轩昂,面不改色,挺立不动。一个带军刀的日军走到他的身边说:“你的要想活命吗?快快的把同你一个样的抗日分子统统的说出来,立刻把你放掉,我保证!快说,快说!”陈荣生藐视地扫了他一眼。鬼子兵再命他跪下!但他反而站得更直。鬼子对准他背部一枪。只见他身体一晃,依然站立着。后面的一个鬼子兵火了,又射出一枪,子弹从其肩胛骨旁进去,胸前锁骨下缘穿出,打了个窟窿。陈荣生仍然屹立不倒。又一个日寇举起步枪向他背部骨盆上缘直刺,刺刀尖锋穿透前腰,露出了刀尖,血液直喷出来,溅了鬼子满脸。可是陈荣生仍然巍然兀立。鬼子小队长恼怒地举起日式驳壳枪对准他的后脑开枪,子弹从鼻子边穿出,陈荣生摇晃了一下,轰然倒下了。

日寇占领舟山杀人无数,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唯恐陈荣生不死,日军医又将一瓶毒药水灌入他胸前的伤口中。

鬼子兵集队下舰走了。沙滩上剩下血淋

淋的三具“尸体”。傍晚凉风一吹,荣生慢慢地苏醒过来。他站起身来向海面上一瞧,两艘敌舰已远去了。他踉踉跄跄地往村子里走,到了小屋旁边,已支撑不住。一个老大娘在纺棉纱,看见这个鲜血淋淋,面目全非的人,非常害怕:“啊!这是啥人呀?”“大娘,我是荣生”。“我家住糯米村,请您给我去通知一声。”他艰难地说。她立即拿一条棉被给他裹好,把他推入桌子底下藏好。

那天晚上大洞岙关 殿中灯火通明。突围的士兵又集合在一起了,大家在商讨陈荣生的事情。按照他外甥余阿毛的意见,认为舅舅被鬼子兵打了三枪插了一刺刀,伤势非常严重,此处又没好的医院治疗,为解治舅舅的痛苦,再给他补上一枪罢了。说着一面流泪一面拿起手枪。陈荣生的妻子哭喊道:“阿毛!,这使不得呀!”卧在地上呈现休克状态的陈荣生,突然朝墙壁上击了拳。这一举动使大家看到他生命的顽强。大家立即动员几名老大,驾一只小舢板,星夜用两支橹和两支桨摇到大陆方门埠头,将荣生送华美医院求治。当时宁波还未沦陷。

中秋之夜,为庆祝陈荣生伤愈出院,我们大家在镇海康阳四大队医务所里畅叙,荣生说:“日寇的子弹和刺刀没有使我屈服,幸未被刺中要害,因此手术也很顺利。据医生说日寇灭绝人性地将毒液灌进我伤口,医治的困难也在这里。医师们还说这么多年来,没有医过像

我这样的重伤。今天治好了,确是一奇迹。”荣生遍说遍撩起胸前的衣服。大家见他右边肋骨已截除了三根。

众人问他今后是否仍住在部队里,他很自然地回答:“如果敌人还强占我们的家乡,我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责任编辑:傅曦

陈荣生朱家尖

脱

险

记

□忻元寅/文

梦断千岛

——蒋介石的六次舟山之行

□包江雁/文

1950年4月30日早上，从定海县城通往定海机场的2公里长的公路上，布满了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荷枪实弹的军警。机场内，2架飞机的引擎早已轰鸣多时，一些高级将领在飞机上也已静候多时，但他们还在等，等候着一个老人。机场内，一位63岁的老人，手拄拐杖，一会儿低头沉思，一会儿抬头向机场四周的低丘、大海及对岸的小岛眺望着。他叫同行者早早地登上飞机，把送行人也劝离了机场。他想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再呆一会儿。他知道，他这一走，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更不可能回到家乡了。他抬起头，最后看了看在他直接关心下修建起来的机场，怀着无限悲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走上了美龄号飞机。他，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走了。他离开了舟山，直飞台湾。以后，他再也没有到过舟山，也没有到过浙江。舟山，美丽的海山，适宜的气候，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这一生，曾经6次来舟山。在这里，他陪同母亲朝拜过观音，希冀祖国统一，国泰民安；也是在这里，他派出飞机，轰炸宁波、上海、南京；还派出兵舰，布放水雷，封锁长江口；在这里，他派出反共突击队，到大陆解放区进行“游击”。他把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也放在这里，准备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一)

1920年，33岁的蒋介石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当时的粤军受到孙中山的特别关怀，因为这是隶属国民党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但蒋介石因粤军派系斗争及身体原因，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6月，他陪同母亲王采玉到普陀山朝拜观音，住三圣堂，游历了普陀山的

各胜景。1923年3月，蒋介石再次陪同母亲上普陀山还愿，“施千僧斋，参观受戒仪式。”这一次，他住天福庵。

(二)

弹指一挥间，二三十年过去了。1949年5月至1950年4月，蒋介石又4次来到舟山。这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30年前雄心未展、官场不得志的青年了。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失意。从1927年北伐成功，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他一直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直至1949年前，他既是国民党的总裁，又是国民政府总统。但是，国共双方经过决定胜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从优势变为绝对劣势。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仅保留总裁职务，退居溪口幕后指挥。岂料解放军自4月21日横渡长江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捷地向江南挺进。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4月23日，解放军解放南京；25日，蒋介石从奉化经象山至上海。在象山半岛，他对驻守在那里的八十七军军长段云布置了死守象山、确保舟山的任务。他对段云说：“象山乃是国军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汝等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舟山群岛侧翼安全，死守象山半岛。”然后，蒋介石乘太康号兵舰经舟山群岛北上直抵上海。

5月7日，蒋介石离开上海，前来舟山，以后又奔台湾。蒋介石认为，只要国民党军队能在东南沿海保住最后一点地盘，坚持一年半载，美国仍然会全力支持他向共产党发起反攻。所以，在此后近1年时间里，他又3次来往与台湾、舟山，稳定军心，视察军务，部署防务。

1949年5月7日,刚刚部署好上海防守及物资撤离的蒋介石乘江静轮离开上海,前往舟山群岛。

此时的舟山县城定海,一片乱糟糟的情形。由于解放军已于5月3日解放杭州,国民党军政民机关纷纷撤退来舟山。各机关、各部队、各军种、各团体占满了定海城及城郊地区,有省级机关的,也有县级机关的;有浙江省的,还有外省市的。但浙江省政府、省绥靖总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等还在宁波。定海只有一个省政府办事处,没有一个统辖的机关。谁的权力大,谁的背景硬,谁占的地盘就大、房屋就好。省立水产学校、舟山中学等学校或停课关门,或搬迁;定海县政府、定海参议会等机构也纷纷让位。

杂乱的情形使蒋介石的侍卫人员处在日夜高度警惕之中。根据蒋经国与俞济时的安排,蒋介石不敢上岸休息,只能把招商局的江静轮作为“座舰”,乘舰巡视各岛。

5月9日晨7时半,江静轮驶抵离浙东大陆最近的岛屿——大榭岛附近(时属定海县金榭区管辖,应是舟山群岛的一部分),乘汽艇至南渡西岸上岛,然后又渡海至对岸的穿山半岛。“……未入街市,即登艇还江静轮启碇。”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后一次踏上浙东大陆的土地,虽然时间不长,但也能聊慰思乡之苦。也就是蒋介石在穿山视察的地区,103天后,解放军二十二军六十四师及六十六师一部在此发起“渡海第一仗”,解放了大榭岛,全歼国民党守军七十五军十六师1448人。

当日中午,蒋介石一行复乘轮至金塘。“一时至沥港,乘艇至南码头,三时登岸。经街中,到天后宫视察,旋至北码头登艇还船。稍驶至岑册,即岑港。时已六时,未复航行。”一直陪同蒋介石的蒋经国在5月9日的日记中较详细地勾勒出蒋介石的行踪。

得知蒋氏一行在沥港登岸,刚刚从大陆败退到金塘的国民党军七十五军一〇一师师长朱式勤与副师长李湘萍等从大丰苏家店跟师部匆匆赶到沥港,陪同蒋介石视察。他们向蒋介石介绍了金塘的情况,也向他汇报了准备在金塘死守的措施。蒋介石免不了对他们鼓励一番。但他们都辜负了校长的期望,不到

5个月,少将副师长李湘萍在解放军的枪口底下做了俘虏;少将师长朱式勤临阵脱逃,以后被其严处。蒋介石在街中心的平倭港碑前“驻足良久”,并仔细阅读了刻于明天启年间,记载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抗倭名将卢镗等擒获倭酋辛五郎、改沥港为平倭港的史实。

5月10日7时半,在舰队护航下,江静轮从岑港出发,“沿途眺望金塘背山之形势及风景,更觉可爱”。“船经金塘山北端尽头,海平如镜,心神怡逸”。蒋介石吩咐同站在船首的蒋经国再安排一次金塘之行,拜谒雪窦寺下院普济寺。

金塘为何有奉化雪窦寺的下院?蒋经国幼时曾隐约听祖母说起过,但不甚明了。在船上,蒋介石为蒋经国详细地讲解了这个出处。原来,在清咸丰年间,金塘普济寺收了一个小沙弥,俗姓薛,柳行南石弄人,法名为果如。住持和尚见他聪明伶俐,颇为欢喜。每晚诵经以后,教他读书练字;又攻国画,长进很快。果如擅长书法,所画梅桩活灵活现;办事机灵,深得住持信任,不久即任知客僧。1875年,20岁的果如出外云游,访全国名山大寺,向高僧求教佛理和书画,造诣更深,在佛教界渐有名气。果如在30余岁回浙后,任奉化雪窦寺方丈;1906年奉召至北京谒慈禧太后,封为国僧,赐袈裟、龙钵、玉印、玉佛各1件,宫藏经书数百函。回雪窦寺任大方丈,建藏经楼及法华殿各1幢。雪窦寺众僧尊崇果如出身,奉普济寺为下院。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笃信佛教,拜果如为师。蒋介石少年时,常随母亲前往雪窦寺礼佛。现在虽事隔40年,果如大和尚也已圆寂30多年,但蒋介石对果如及由果如多次提及的金塘普济寺印象尤深。所以,蒋介石决定这次无论如何要去普济寺,拜谒一下这位当年慈祥的大和尚塑像。

江静轮于当日11时前到达岱山东沙角。蒋氏父子没有上岸,只在江静轮上远远地看了看这个全国闻名的渔港。但是,由于大量军队齐集,交通封锁,昔日繁华的渔港早已萎缩了,江静轮调转船头向衢山岛开去。在岛斗岙等地,蒋介石“参观近洋渔船张网捕鱼实况”。下午5时,江静轮抵普陀山,泊莲花洋。次日上午9时45分,蒋介石转乘小轮登岸,漫步

登山,在菩萨顶天灯台摄影留念,至慧济寺进中餐后,走小路东行下山,游古佛洞、梵音洞、经龕提庵、净土堂,因天下毛毛雨,在净土堂憩足片刻,未进法雨寺,即抵天福庵,参观后即去南天门,下午4时半回轮船休息。

次日,载着蒋介石父子的江静轮从普陀山起碇,经洛伽山、朱家尖、登步、六横及大小双山,于下午3时许抵达定海码头。此后连续数天,蒋介石都在江静轮上接见定海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部署定海防务。为了尽快结束这无序的局面,12日,他决定在定海成立舟嵎防卫司令部,由万用霖任司令。

在江静轮上,蒋介石有时把一团糟的战报干脆抛在一边,与蒋经国探讨起国民党在大陆上彻底失败的教训。说到国民党的改造,年轻气盛,早年留学苏联,参加苏共的蒋经国本来就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象痛恨至极。以前,由于蒋介石喜欢听报喜不报忧的话,蒋经国总是没有机会。现在蒋介石主动说起这方面的问题,蒋经国一口气历述了20多年来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种种弊端:政治上腐败无能,民怨过重,民变四起,社会治理毫无成绩可言;经济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没有一点建设成就,实到崩溃边缘;军事上连吃败仗,内部矛盾重重,中上级军官大都腐化堕落,士气低沉,指挥紊乱;党务更是糟透了,党员毫无带头作用,无组织力量……

蒋介石一边看着残阳如血即将沉入海中的红日,一边听着蒋经国发自肺腑的诉说。这次,他终于有点听进去了。蒋经国的日记说:“船中无事,父亲专心考虑党政问题,不但对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及人选有所准备,同时对于干部组训,亦有所策划及安排。”晚上,蒋介石躺在轮船上,又在思索着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会得到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支持。他的结论是:共产党靠的是搞土地革命才赢得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而这一点本来就是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早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中心内容。只是共产党把这一政治纲领的落实抢在了国民党的前头。所以,蒋经国的日记继续记载着:父亲决定“编组民众,计口授粮,积极开垦,对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实行二五减租,保障

佃户……推广合作事业,节制资本……”以后,蒋介石在台湾部分实施了这些在舟山洋面所考虑、酝酿的改革方案。但在当前,蒋介石决定首先从组训干部着手:“必须选训大批新干部,加以组织,并使之深入社会各阶层……”,并预定“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不久,蒋介石首先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由他自己亲任校长;在舟山,创办舟山革命学院,轮训基层干部。

蒋介石准备于17日离开舟山赴台湾。于是决定16日再游金塘、访普济寺,拜果如。16日,“父亲下午在金塘岛南岸大浦口道头登陆,经安澜亭、大象地至柳巷,入普济寺后门”。在果如塑像前,蒋介石行三鞠躬礼,默致敬意。蒋介石又向果如弟子、主持僧性梵询问果如生平及雪窦寺往事,索阅果如生前照片及所画梅桩遗墨,嘱性梵好好保藏。

以往,蒋介石每到一地,由当地军政机关布置的欢迎队伍,总要站立道路两旁,手持鲜花或标语向蒋介石致意。此时,坐在轿子里的蒋介石,扫视着道路两旁闻讯赶来看“大好佬”的金塘百姓,虽然他们的手中没有鲜花,也没有标语,队伍也前挤后拥。即使这样,“落难时期”的蒋介石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他禁不住向路旁的人群招呼致意,甚至鼓起掌来。他对旁边行走的蒋经国说道:“这就是民心啊。”根据蒋经国日记所载,“半小时后离寺,附近民众皆已闻讯来迎,途为之塞……,下午由柳巷经老碇头、大浦口”。当晚,蒋介石离开金塘,乘江静轮返回定海。

5月17日午后,蒋介石一行在定海道头上岸后,直接赴定海机场。

定海机场位于定海道头东偏北约2公里的青垒头至东港浦一带。原为侵华日海军第三方面舰队于1944年初为应付太平洋战争而建。日军投降后,由国民党海军接收,不久即废弃。蒋介石“引退”到奉化时,嘱托蒋经国的头件大事就是抓紧修复定海机场,在舟山建立空军基地。为此,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经常坐镇定海,指挥空军各部抢修机场。为了强迫定海民众赶修,在工程最紧张的3月,根据王叔铭的要求,曾任空军地勤大队长的葛正道由蒋经国推荐,被省政府任命为定海县长,直

到6月机场工程基本完工，才由省政府主席周岳安排其嵊县同乡吴树霖继任定海县长。

蒋经国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速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很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机场的工程已进行到何种程度了？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机场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当然，定海机场的作用远不至这些。机场建成后，国民党空军的1个大队、14架飞机立即进驻，至1950年5月，国民党空军轰炸宁波、上海等地的飞机大都是从该机场起飞的，仅宁波市就被炸毁房屋5800余间，炸死居民152人，炸伤295人。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对上海的轰炸达26次，尤其是2月6日，从定海出动的17架次飞机，分4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一次就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人，使上海电力丧失90%，绝大多数工厂被迫停产。

今天，蒋氏父子在还未完全竣工的定海机场匆匆起飞。飞机上，蒋介石已失去了往日的骄狂。由于连日的各岛奔波，又因为在轮船上未能休息好，蒋介石的脸色显得十分憔悴苍老，透过窗口，他失神地俯视着飞机底下的碧波大海。点点片帆、棋布星岛渐逐淡去，蒋介石感到了人的渺小和无奈。“沿途俯瞰三门湾、海门、乐清、雁荡山、永嘉、平阳等地，四时五十分飞抵马公降落。”

不知是上苍的有意安排，还是历史的巧合，刚过1年，解放军10万大军于1950年5月17日直捣舟山，粉碎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一年半的定海基地。

(三)

2个多月后，蒋介石又于8月3日至6日再次来舟山。“下午，父亲动身飞赴定海，三时抵达”。这次来舟山，蒋介石对定海情况还是不放心的。一下飞机，他顾不上到定海城转一圈，就直接到定海码头，登上太康号兵舰直赴

普陀山。

早在7月中旬，当蒋介石决定近期有舟山之行时，就选择了佛教圣地普陀山作为他的临时行宫。但他对驻守在那里的由江苏人为主组成的暂一军及江苏省绥靖总司令部不放心，即令他们立即迁出，由侍卫长俞济时的弟弟俞济民任主任的浙东行署接替普陀山防务。7月24日，接到调防任务的俞济民不顾台风迫近，决定立即率部冒着风浪向普陀山进发。不久即任行署军务处少将处长兼普陀山防务指挥官袁建勋事后回忆说：“7月24日上午8时……除特务团稍后外，均齐集朱家尖埠头，分乘三船，同时向普陀行进。孰料航程及半，狂风骤起，巨浪翻腾，前后二船，均力撑到达，独当中一船，因风浪过猛，突然抛锚。及起锚更难前进，该船只得转向沈家门行驶，又复被驻军阻回。及航至认母涂附近海面，时值午夜，不幸被飓风摧覆，全船官兵四十余人，悉数淹殆，计溺毙重要人员，有行署副主任傅伯龙、机要室上校秘书主任张锡武、总务处上校人事科长林则民，会计室主任等人。”

蒋氏父子到普陀山的当夜就住宿在浙东行署为他精心布置、严加防范的行署驻所文昌阁内。翌日，蒋介石执意要住到前次陪母亲来普陀山礼佛时住过的天福庵。蒋经国及俞济时兄弟无法，只得急匆匆派人赶去布置，又从特务团中挑选宁波的一营子弟兵担任天福庵正面及后山一带警卫。当日，蒋介石游紫竹林、白华庵、普济寺、悦岭庵、常乐庵、法雨寺等处。

在普陀山最早的观音道场不肯去观音院大门口，蒋介石久久凝望着这个匾额，口中喃喃自语：“不肯去？不肯去！”不知是说观音不肯去日本？还是自己不肯离开大陆去台湾？当时曾陪同蒋介石游览的江苏省政府主席丁治磐事后在《普陀侍游》、《佛顶山留题》等词中写道：“海山尽在烽烟里，谁识闲云一片心”，“回首疾风波，识得清贞趣；极苦乃极乐，我亦不肯去。”但丁治磐、蒋介石知道，自己不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观世音不肯去日本，有普陀山张氏献房供奉；他们被赶出大陆，虽不肯远去，但在舟山，没人肯“供奉”，只

得去远离大陆的台湾,待国际形势变化,再图反攻复国之梦了。

在紫竹林,蒋介石在随从的极力纵容下,在一老僧处竟求得一“奇签”：“直上草上去学仙,岂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忠(中)正声名四海传。”这个“灵签”着实使蒋介石高兴了一阵子。

但是,蒋介石的好心情没有维持多久,就被美国打来的一阵乱棒击得晕头转向。晚上,当蒋经国将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小心翼翼地呈给蒋介石时,蒋介石气得直蹬脚。

所谓白皮书,即是政府或议会使用白色封皮作为封面的重要文件,西方各国有着不同种类的以颜色为名的蓝皮书或红皮书、黄皮书,通俗地讲,就是官方文书。

美国的这个白皮书,实际上是一篇美帝国主义侵华的自供状。全文分为8章,内容说的是1844年美国强迫与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7月间的中美关系。其中特别详叙了近年来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经过,但将其失败原因完全归咎于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

蒋介石打内战,依靠的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援助。多年来,蒋介石凭着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曾令马歇尔将军七上庐山,把大量的美援用于消灭共产党。但蒋介石的军队却把这些美制武器拱手送给了战场上的对手。当杜鲁门发现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时,便心灰意冷,转而持不信任态度。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杜鲁门政府要对近几年援助蒋介石政权反共内战的数亿计的美元付之东流有个交待。于是就有了这本对蒋介石来说近乎落井下石的白皮书。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一项题为《美国对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的声明。白皮书连同艾奇逊声明的发表,目的就是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作全面的辩护。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裴的话说:“在中国这场内战中,国务院没有失败,美国没有失败;失败的是别的什么人,我们无能为力,是我们之外的,非我们所能及的一种事物作出的裁决。”白皮书的结论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不是因为美援不足而造成的,而是咎

由自取。蒋经国来后对这份白皮书的评价是:“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

蒋介石草草地看了看蒋经国重点划出部分。他看了还不到一半,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深怨美国“自断其臂”。他总是以美国的左臂右膀自居,甘愿为美国效力,怎奈美国已嫌他无用,把他一脚踢开。他对着蒋经国哀叹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

白皮书的发表,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强烈要求蒋介石批判白皮书。蒋介石深知现在守卫东南沿海还要依靠美国,因而他只好采取打落门牙吞下肚的办法,回答说:“不必了”。同一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耶苏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其实,蒋介石对美国的白皮书一直耿耿于怀。8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指责马歇尔和艾奇逊的对华政策。他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之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天福庵脚下沙滩上发出的波涛声,把蒋介石的思绪拉回到足下这片土地。在回到天福庵的路上,他用拐杖把用鹅卵石砌成的小路撞得“咚咚”响。虽是冤怒难平,但对明天即将出访的南朝鲜一事则充满了希冀。

8月6日晨,蒋介石从普陀山乘太康号兵舰到定海,与来时一样,他还是未进定海城,直接上了飞机场。于11时乘飞机飞往南朝鲜,与李承晚会晤,期能实现“东亚反共同盟计划”,以求“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但行事总要看美国脸色的李承晚无法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到此时,蒋介石才知道一切外交上乞求于人的努力都已是白费劲

了。外交上的困局,使蒋介石只有横下一条心来靠自己,以现有的军队固守东南沿海的最后“反攻复国”基地。

但蒋介石一想到舟山的情势更不安了。解放军已于上月解放了浙东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象山半岛。舟山群岛完全暴露在解放军枪炮之下。舟山国民党军队虽有6万之众,但分辖于八十七军、七十五军、暂一军,另有海军第一舰队、第一军区、空军等部,都各由上级主管着。岱山、嵎泗的部队大部由江苏省政府统辖着,周岳对其鞭长莫及;南线的八十七军是青年军出身,周岳往往也指挥不了;能够动的,也就只有守卫在西线的七十五军。

舟山应派一个主要军事干部去!蒋介石想到了不久前刚从上海撤逃到台湾的石觉。号称“黄埔怪杰”的石觉,系黄埔三期生,曾担任蒋介石嫡系第十三军军长。平津战役时,石觉是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平津被解放军包围时,其所属部队负责防守北平城内的东直门至朝阳门一带。在傅作义将军宣布和共产党和平谈判之际,石觉和傅作义达成“君子之约”,带着1个警卫连乘专机离开北平,飞往南京;不久即任淞沪防守司令部司令,原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的主力第三十七军、七十五军、五十二军、交警第二纵队和三五三师均由石觉指挥、调度。上海战役后期,他率七十五军、五十二军等主力经舟山撤往台湾。经过2个多月的休整,蒋介石相信他可以统辖起驻舟山的全部军队。8月15日蒋介石在台湾召见石觉,委以“舟山防卫司令部”司令重任。

(四)

10月3日至5日,解放军二十二军以4个团的兵力解放了定海县城的门户金塘岛。7日,驻守六横的国民党军八十七军得知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即将攻击六横,闻风而逃。当日,六十一师解放六横岛,接着又于次日解放虾峙岛。

11日,在台北的蒋介石接获六横、虾峙等岛接连失守、解放军直逼定海县城,定海危在旦夕的报告,心急如焚。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接获报告称:舟山六横、虾峙(峙)各岛业已放弃,金塘亦因之失陷。”“共军

已占金塘,定海大门敞开,形势益见危急矣。”“父亲不得不亲自前往该地视察。下午一时四十五分飞往定海,我亦随行”。同机到达定海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还有: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上将、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上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上将、联勤总部司令郭忏中将及俞飞鹏、谷正纲等人。周岳、丁治磐、石觉等浙江、江苏两省政府及舟山防卫司令部的主要首脑,列队于停机坪上向走下舷梯的蒋介石鼓掌致意。但是,人们注意到今天机场的气氛有点冷峻。站在舷梯高处挤出几丝笑意的蒋介石,见此情此景,胸中难免泛起几分悲怆。

蒋介石一下飞机,总要发表几句高论。今日也不例外,尽管他情绪不佳,但一想起此行的使命,还是鼓足气来足足讲了10分钟。他特别强调舟山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反共复国”中的重要作用,掩饰日益逼近的共军攻势。他最后说“今日舟山将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担负起支持东南作战艰苦无比的使命。所望我舟山军民,振起精神,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而努力。”

一阵零落的掌声响过后,蒋介石离开机场向定海城区驶去。

当晚,蒋介石在定海防卫司令部召集诸将领,听取连掉三岛的经过,检讨得失。对金塘岛战斗时临阵脱逃的一〇二师师长朱式勤,蒋介石十分气愤,手谕“交军法严办”。

朱式勤由蒋介石手谕严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即被在舟山的众将领当作了议论的中心。惋惜者有之,嘲笑者有之,哀叹者有之,但大家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那就是此时的国军无论是何家军马,由谁指挥,都难以与排山倒海的解放军抗衡。

12日,按照蒋介石的吩咐,蒋经国乘B-25型飞机沿着5月9日陪同蒋介石视察的线路,从空中经“金塘、大榭、梅山等岛,穿山半岛,镇海与宁波上空观察”。俯视碧波万顷的峙头洋、金塘水道,及多次到过的金塘、大榭、镇海、宁波,映入蒋经国眼帘的是他熟悉的一草一木。现在,那些地方满是鲜艳的红色旗帜及滚滚的支前民工和解放军的大练兵。他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一种有家不能归

的凄然之情油然而生。他痛苦地对飞行员说道：“飞回去吧！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只要守住了舟山，我们反攻大陆才会方便许多。”

同日，蒋介石则召集陈诚、桂永清、周至柔及周岳、石觉等将领“研究防卫定海，收复金塘、六横之计划。”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舟山指挥所，由郭忏任主任，统一指挥舟山的军政，协调舟山防卫司令部与浙江省政府、江苏省政府间的矛盾；为增强舟山守军力量，命在广东潮汕一带的第十二兵团即刻驰赴定海。

以胡璉为司令的第十二兵团是1949年春天重建的。原十二兵团是蒋介石在中原的主力部队，其核心部队第十八军原是“五大主力”之一，也是陈诚在内战中的起家部队。1948年12月，包括第十八军在内的整个第十二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于双堆集。该兵团覆没前夕，兵团正副司令黄维、胡璉集中起还堪用的十几辆坦克，并宣布已随身携带了安眠药，然后又施放毒气掩护突围。结果黄维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等均被俘，只有胡璉只身逃出。胡璉逃回后，奉蒋介石之命在江西重建第十二兵团，下辖第十八、六十七军。由于胡璉在国民党军中素以战将著称，得到多方面的支持，重建工作比较顺利。该兵团召集起从战场上零星逃回和被俘后回归的五六千官兵，以此为骨干，又征集到4万多新兵，很快重新成军。人民解放军渡江后，该兵团一直设法避战，专心在江西进行了近半年的训练，随后又进攻在闽赣区起义的吴奇伟部，使新兵经受了一些战斗锻炼。这时该兵团内部已重新进行了整编，下辖第十八、十九和六十七3个军，共4万多人。10月上旬，因广州、厦门即将解放，该兵团感到在潮汕一带处境危险，急切要求撤离。当时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要求该兵团守卫广东。但胡璉系陈诚的旧部，又一向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因而胡璉对广州方面的要求于不顾，命六十七军为第一船团，第十九军为第二船团，于10月18日从汕头地区出发驶向舟山。

10月17日，解放军第十兵团解放福建厦门，金门形势危急。20日，鉴于情况紧迫，根据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指令，胡璉命令正

在台湾海峡中航行的第一船团赶紧赴舟山，第二船团改变航向，与先期到达的第十八军一起接替金门防务。10月23日，第十二兵团兵团部和十九军抵达金门附近。其时，离解放军第十兵团向金门发起攻击仅止1天。由于这一变化，最终导致解放军二十八军兵败金门的结果。而10月27日前全部抵达舟山的六十七军，即作为舟山防卫司令部的总预备队，置于舟山岛。11月3日至5日的登步岛战斗，石觉就是以他们为主，增援登步，是国民党军队取得登步“胜利”的主力。

为了鼓舞守军士气，13日，蒋介石在陈诚、石觉等将领陪同下，乘车出西门，经岑港、紫微一带。“复步行二三里，至天童山麓。沿途视察驻军阵地，一连一排的走至墩头”。蒋介石身穿藏青色丝绸长衫，脚穿黑布鞋，他强颜欢笑地与阵地前的官兵一一握手，对这些“忠诚”的部属在危难之际坚守最后的阵地表示感谢和慰问。

岑港，这个舟山岛西部最主要的集镇和军事重镇，明朝时，曾是倭寇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嘉靖三十七年(1557)，在浙江总制胡宗宪的直接指挥下，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率部在此地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苦战，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役后，浙江倭患才基本平息。5月9日，蒋介石曾乘江静轮在岑港口外停泊一夜，但没有上岸。这次他在这个古战场，站在前沿炮兵阵地上，手拄拐杖向着大海彼岸了望着。站立良久，他的腿感到有点累了，就坐在凳子上，从炮位的高倍望远镜里继续观望对面的金塘岛。仅5个多月时间，对面的金塘岛已换了主人。

眼睛看花了，看累了，他终于从望远镜前抬起头来，闭上双眼；想起往事，鼻子有些发酸。“独自莫凭栏，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他感到眼里湿润起来。为了不让下属看到，他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向左右随从说：“这里海风太大了，我们走吧！”次日，蒋介石就结束了第五次舟山之行，于12时20分乘飞机到达台北。

在这次定海活动期间，蒋介石还专门接见了舟山防卫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兼浙江省绥靖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庄心田关于破获“岳

树猷、宋豪士投共案”的汇报。

岳树猷虽是温州人,但长期在定海、镇海工作,1947年在宁波区当选全国立法委员。宋豪士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长期在舟山基层工作,1948年当选为国大代表,当时仍担任县参议会议长、定海银行总经理、《定海民报》发行人。1949年9月19日深夜,国民党定海防卫司令部稽查处及绥靖总司令部情报处突然派大批军警包围他们的住宅,以“通共”罪嫌拘捕并抄家。一同被捕的还有国民党定海县党部书记长赵昌渭,岳树猷的弟弟、县党部常务监察委员岳树德,名律师杨梅等13人。他们被拘押在定海集中营东管庙内。与岳树猷关系密切的立法委员、原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毛翼虎因为是蒋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的侄子而幸免,但他也受到当局的警告,行动受到监视。

岳树猷,宋豪士被捕后,国民党特务人员虽对他们严刑拷打逼供,但除了岳、宋等人无法忍受“拷打而逼认通共”外,找不到任何“通共”证据。以“不去谈论岳树猷的事情”等为保证,毛翼虎得到当局批准赴台。到台湾后,毛翼虎立即联合20多名立法委员在台湾报纸上以“快邮代电”给浙江省绥靖司令部,抗议军政当局擅自逮捕非现行犯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要求他们将岳、宋等人立刻释放,或转解台湾作公开审判。定海当局对这个烫手的山芋无法处理,1个月后,以送“台湾处置”为名送上“专轮”,又以“途中沉船”为借口一推百了。

由于立法委员及国大代表的神秘失踪,引起台北国民代表大会及立法院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蒋介石出面干预。

蒋介石在听取庄心田的汇报,又亲自审阅了按有岳树猷、宋豪士手印的审讯记录后,认为在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临阵倒戈投共的非常时期,岳、宋“投共”案宁信其有,按其一贯的“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的政策,对稽查处的工作大为称赞。蒋经国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道:“父亲此次定海之行,对于情报人员多能奋斗不懈,空军亦能尽职作战,甚觉欣慰。”从此,岳宋“投共”案成为一桩无头公案。后据从沉没的汽艇中逃回的士

兵证实,那天他们的小艇驶往竹山门外后,特务用绳索把5人一一束缚住,用棉絮把嘴巴塞住,另一头绳索缚以巨石抛于海洋之中。1984年11月,美国华文报纸《北美日报》刊登《从谈未揭露的政治暗杀——与江南命案的关系》一文,较详细地记载了原参与岳、宋案的国民党反谍人员的文章,披露了岳、宋案的经过。《台湾与海外文摘》1985年第十期把此案与刺杀廖仲恺、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案一道,列为国民党历史上的14个大案。幸免于难的毛翼虎在1950年通过解放军宁波军分区的联络,在其定海县政府工作的侄子毛晰本的帮助下,终于偷渡国民党海军封锁线,到达穿山半岛解放区,以后担任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浙江省委副主委。

(五)

1949年11月初,解放军六十一师进攻登步岛受挫。经过2天3夜的血战,六十一师未能完全攻克登步岛,在歼灭国民党军队3396人,自己伤亡1488人,在短时期内难以继续组织部队登陆作战的情况下,撤回桃花岛。

在台湾的蒋介石收到“登步大捷”的消息后,自然十分高兴。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特别是1948年后,很少有让他高兴的事情。这次虽是小胜,但总算是“胜利”了。欣喜之下,蒋介石一面命令各大报纸头版刊登“胜利”消息,鼓舞士气,一面派蒋经国携《致舟山前线将士慰问信》到登步岛劳军,并亲自提议将原驻守登步的二二一师命名为“登步师”。

此后,由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贯彻毛泽东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并逐步增加进攻舟山的兵力。1950年4月,第三野战军决定于6月发起对舟山群岛总攻,兵力从最初的4个师逐步增加到6个军,并从原来的陆军单一兵种作战发展到海陆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

面对日益加重的军事压力,对舟山是守还是退的问题,蒋介石直至1950年4月中旬还是主张坚守的。从理论上说,舟山群岛是他设计的封锁大陆的五大锁链中最关键的一链。舟山,进可攻,退可守。进,舟山是反攻大陆、威胁沪杭宁的最佳地区。舟山群岛有成百上千个岛屿,解放军虽然占领了几个,但绝大

部分还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中。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复职”演说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凭海据险,可长期固守。将海南与万山、金门、舟山诸岛形成犄角,进作为反攻大陆跳板,退可构成防卫台湾的海上屏障。”况且,随着冬天的临近,解放军渡海作战越趋困难。只要再守上半年,他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终将爆发。这样,“国军”就能在美国的直接帮助下,打回大陆去。想到这里,蒋介石不禁发出了笑声。

从1949年11月后,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向舟山增兵,并把台湾、金门等到地中最有战斗力的2个军调往舟山。10月下旬,由于十九军另时改调金门,舟山形势益发危急。11月1日,蒋介石命令将在辽沈战役中唯一逃脱保全的、在上海战役中也未伤元气就撤退到台湾、经过半年休整的五十二军调驻舟山(该军于12月中旬抵舟山)。1950年4月13日,本拟调往舟山,在金门战斗中立下大功的十九军调驻岱山。在这前后,四十五师、九十二师等也从台湾调往舟山,使舟山的总兵力达到12.5万。鉴于金门战斗中坦克在“封堵共军突破滩头阵地中的重要作用”,蒋介石又命令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蒋伟国将2个装甲大队及2个中队也调往舟山,将最先进的坦克布置在舟山;同时将刚刚重新组建的第二舰队也调驻岱山长涂港,并修建比定海机场规模更大的岱山机场。蒋介石决定在舟山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1950年4月16日,有备而来的四野第十五兵团10万“东北虎”横渡琼州海峡,突破“伯陵防线”,与先头已4次成功偷渡的先头部队会合,将10万国民党军队冲得七零八落。苦苦支撑了1个星期的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下达总撤退令,并要求台湾速派军舰到海南岛接残部。

蒋介石在批准海南岛弃守报告后,知道共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舟山了。他不放心舟山,决定立即再赴舟山。28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舟山,这是他一年时间内第四次来舟山。这次同行的,除了前几次一同来的几个高级将领外,还多了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他们是美国军事顾问团成员,为首的是美国

海军柯克上将,还有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和空军武官。

4月29日早上,蒋介石在定海县城东北角由成仁祠改建成的“舟山革命学院”“舟山厅”内接见了以石觉为首的国民党驻舟山部队营以上军官。下午,蒋介石在石觉等陪同下,参观了三军联合演习。结束后,他向参加演习的官兵训话:“你们要加强训练,演习作战时要研究登陆作战,要使士兵有登陆前利用船舶的知识,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巩固复兴基地。”

蒋介石对舟山的官兵是这样讲的,但他自己心中对是否能守住舟山已越来越没有底了。回到行宫,他支走了所有人员,沉入了苦思之中。舟山,已苦苦支撑了一年,但他所期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却还没有打起来。他有上千条理由再在舟山守下去!但是与大陆隔着琼州海峡的海南岛在10万解放军的进攻面前,10万国民党军队也只守了一个星期就瓦解了。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当然,守舟山的兵力要比海南多,石觉也比薛岳强,士兵也更能打。但是,在舟山对面正负责进攻舟山的粟裕的厉害他已不止一次地领教过了。粟裕已将“三野”最有战斗力的,原准备进攻台湾的九兵团都派到了浙东、浙东北沿海。加上原来的七兵团,加起来的兵力超过20万。在其第二线,还有10万部队可随时参加战斗,其志在必夺舟山。况且,解放军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东南沿海建设的大部分机场已竣工,并得到大批新式高性能飞机。据空军侦察,斯大林已派了一个空军师帮助粟裕。仅4月份1个月时间,制空权在江浙一带的局部地区已被共军占据。此外,守岛的国民党军队占去了整个陆军的三分之一强,由于舟山离台湾太远,要保持这十几万人的给养,对台湾的负担也太艰巨。

如果共军绕过舟山而先直取台湾呢?这并非不可能。台湾本土的军队不足30万,但面积和海岸线却比舟山大几十倍。坚守舟山看来还得从台湾调兵,这会造成台湾防守兵力的严重不足。没有舟山可以躲到台湾,而没有了台湾呢?台湾是赖以立足的最后一块基地了。如果丢了台湾,那自己就真的成了亡国

之君了,不要说“反攻复国”了,连死后也无葬身之地了。

想到这里,蒋介石再也不愿意想下去了。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要在这冥冥之中寻求一点心灵的安慰。

如果说在与中共作战的几十年里,蒋介石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而低觑了对手力量的话,那么这一回,他在定海行宫,总算摆正了与中共力量对比的位置。

虽然,这个放弃舟山的决策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如何把这十多万军队在虎视眈眈的解放军眼皮底下撤走,这又是件头痛的事情。特别是想到刚刚破获的吴石、朱枫案,蒋介石就呆呆地又怔上很长一段时间。

吴石是中共在国民党军中最具要害的部门、军衔最高的一位情报人员。他原是国民党军政部办公厅主任,后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1948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一位国民党元老指引下,决然参加反蒋行列,在中共上海局张执一、沙文汉领导下,从事秘密斗争。渡江战役前,吴石为解放军提供了“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签”,“京沪杭军事部署”等重要核心军事秘密。1949年8月赴台后,吴石利用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按照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迅速开展活动,其秘密活动遍及国防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等首脑机关,已形成情报网,并获取了国民党军台湾防卫总司令部机关及部队主管官员名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所辖驻军番号及飞机、大炮、坦克的数量,部队的装备及设防情况等核心机密。

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朱枫(镇海城关人)经香港赴台湾,配合吴石搜集情报。正待朱枫完成任务,准备返回时,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书记蔡萧乾等被捕叛变。在这危急时刻,朱枫在吴石夫人王璧奎帮助下,办妥特别通行证,携带吴石搜集的情报,于1950年2月4日搭乘军用飞机抵定海,摆脱了台湾全岛军警宪特对她的搜捕。

在定海,面对早已解放、近在咫尺而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镇海,朱枫插翅难飞。她得不到沈家门“称病住院”,欲寻找大陆渔船(其

父曾任镇海县渔业公所主任)或搭乘沈家门至上海的商船脱险,但终未能如愿。2月18日,从台湾追寻而来的特务在舟山防卫司令部稽查处的协助下,在沈家门宫墩医院将朱枫逮捕,并立即押解至台北。3月1日,吴石将军夫妇、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苍中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夏曦等7人先后被捕。

蒋介石来舟山前,已指示组成以蒋鼎文上将为首的“特别军事法庭”审查此案,并特别交待:要在“生活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情感去征服”,但据报告,这些人软硬都不吃,深挖“间谍网”的工作毫无收效。蒋介石担心,在台北可能还有一批随军“撤退来台”的共军情报人员。这些人员不除,他蒋介石就不得安宁。他决定回台后亲自处理这件事情。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等7人被枪决。同案被株连的还有台湾籍著名爱国将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李友邦中将夫妇。李友邦将军于1952年遭杀害,夫人严秀峰女士在台湾被关押15年。

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来个“金蝉脱壳”,让全世界都知道蒋介石的“东方敦刻尔克”,蒋介石又沉思起来。首先,这个行动只能让极少数人知道,否则台北搞出方案不久,粟裕也马上会得到它的副本。另外,对舟山军民也需严格保密,否则,军心要乱,也会出大乱子。当然他还要征询美军顾问的意见,到台湾后再正式把这件大事确定下来。

(六)

5月10日,台湾台北“国防部”根据蒋介石命令召开作战会议,以“空中优势不能确保”,“补给线长、运输困难”为理由,决定立即将舟山驻军悉数撤到台湾,以“美援及日本赔偿物资运输计划”为撤军代号。石觉于参加会议后当日返定海。次日,蒋介石又派副参谋总长郭寄峤、海军代副总司令马纪壮、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舟山,持其手谕,协助石觉实施撤离。一下飞机,郭寄峤就把蒋介石的亲笔函交给前来迎接的石觉,只见上面写着:“此时防备匪机突然来定轰炸我运输舰船,比防范其陆军渡海来攻本岛更为重要,故应从速筹备,以防万一。关于运舰遇有各种情况发生

时,必须有一海军高级将领具有充分权力,在当地及以至即应处置紧急事故,以免重大损失。故余意到定海之军舰、商船必须指定马副总司令统一指挥,而马副总司令则须受石司令官之指挥。必须建立如此指挥之系统方不致临时仓惶,以免纷乱,务望想定各种不测之情况,以期减少损失至最少限度,是为至要。中意舰只停泊不可太密挤,总以疏散为宜。故部队开始登舰亦以络绎行之为宜,不可太迟,明(十二)晚间自应开始登艇,并期于本月十五日,至迟十六日上午必须完成全部工作。是为至盼。”蒋介石还不放心,次日又派蒋经国来舟山,共同督查撤军。

5月13日黄昏,舟山守军各部开始分批行动。为保守秘密,各种军民无线通讯全部停止,全区实行戒严,军、师长待部队集结上船后才被告知航海路线和目的地。与此同时,又派出81架次的飞机对大陆前沿阵地进行轰炸扫射,予以干扰。装甲兵和75毫米以上的炮兵部队首先上船,然后为舟山岛的守备部队,前沿岛屿及岱山、普陀、长白、秀山诸岛的部队于第二天登船,到16日,舟山群岛的部队全部秘密撤走。在撤退军队的同时,蒋介石

还命令把岛上的近2万名青年强拉上船撤至台湾。

蒋介石终于赶在解放军进攻舟山之前,安排守军悄悄撤离。自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指挥得最好、进行得最顺利的军事行动就是舟山撤退。

海南、舟山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引起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人士的不安。为了对撤军有所交待,5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他说,当时衡量客观现实的情势,估计我们政府所有的实力,若非集中一切兵力与“共匪”作战,我们就无最后胜利的把握,反将要被“共匪”各个消灭。

撤退本是迫不得已之事,蒋介石却解释成是他复职后第一个计划的“完成实现”。但是,无论是反攻也好,“胜利”也好,蒋介石及蒋经国的“反攻复国”之梦都不可能实行了。5月16日晚,解放军10万大军在东起虾峙、桃花,西到金塘、穿山,在近30公里的海面上,万舟齐发,发起全线追击。

17日晨,五星红旗在舟山岛各地高高升起。○

责任编辑:邬永昌

灾民闹乾高 血流大展庄

□庄智秀文



威望。

清光绪十七年(1891),大展庄遭受旱灾,粮食歉收,佃户交了田租,留下来的口粮就很少了。到了年关,很多人家已断粮,只好向大户人家买米度日。

大展庄“张乾高”房名下有大尊、小尊两个儿子,是大展庄最大的一户财主,占有良田三千六百余亩,还开设染坊、钱庄、米行。平时这两兄弟倚仗自己的财势,横行乡里,现在见大展庄百姓受灾荒,有些老百姓吃草根树皮

清代末期,大展有个石匠,名叫张文亨。道光三十年(1850)出生于大展庄张家村。少年时跟父学石匠手艺,到了十七八岁手艺学得蛮好了,20岁左右已能单独出门兜生意做作头。因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故称他为“石匠三”。他性格刚强、豪爽、侠义,遇乡邻受冤屈,爱打抱不平,所以在民众中树立了一定的

度日,他就利用灾荒发大财,抬高米价,本来一块大洋有五斗米(计67.5斤)可买,年关相近,他提高到一块大洋买三斗。更可恶的是到了农历十二月二十那天就关仓不卖米了。因手工业等缺粮灾民赚来几块钱回家,想买米过年,可是乾高房关仓不卖,灾民着急,都来找石匠三商量,要他出面去找乾高房评理。

因石匠三曾在宁波医好章状元儿子疑难之症,受到皇帝的钦封。他回转家里,当地有些青年人要求他教练武术,他就带一班人每日习武。日子久了,一些志气相投的青年就结拜为十兄弟。这班十兄弟,对乾高房所作所为,都非常气愤,有的拳头拎拎,要找乾高房评理。石匠三听到灾民的哭诉,也是忿忿不平,就带着这班灾民来找乾高老板,问张小尊:“今年阿啦受灾缺粮,又近年关,乡民无米下锅,不得安心过年,依为啥要提早关仓勿肯卖米?”张小尊气势汹汹地答道:“米是我的,卖不卖由我,依管勿着!”石匠三一听就火了,指着张小尊的鼻子说:“依敢胆勿卖,三天内见分晓。依要是‘逼上梁山’,我就带头到你家来吃荒饭。”过了三天,乾高房仍不肯卖米,石匠三就带领七、八十个灾民冲进乾高房大院,打开谷仓,砻谷的砻谷,蒸饭的蒸饭,象三月半会吃斋饭一样,让灾民来吃荒饭。

张小尊看到灾民真的来吃荒饭,就连忙逃到定海,向定海厅知事告状,一面派媳妇去告诉她的父亲沈xx。沈xx是当时“省府师爷”,他听了女儿诉述,就向巡抚衙门告状,后由巡抚衙门指令定海厅知事到大展庄惩治“暴徒”(指灾民)。

定海厅知事感到为难。要是来,石匠三是“同知衙”,官衔与自己差不多大,要是勿来,巡抚衙门要责怪。他忖来忖去还是来,带了一百多个清兵来到双岗岭墩,叫人马站好队,旗帜飘扬,号角吹响,炮放放,大张旗鼓造声势,他以为声势造得大,下面灾民知道就会吓退,再来大展庄走走看看,“暴徒”没有了,回去好向巡抚衙门交帐,要是一个钟头不走再作计较。

此时,在乾高房的大院内聚集了许多灾民,其中身强力壮的也有一百多个。石匠三叫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幼妇撤走躲避起来,留下来都是年轻后生。当时议论:是撤退?还是同官兵斗?有人主张“拼一拼”,有人主张先避一

避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石匠三听听大家都有道理,就叫大家暂时撤走,让自己出面找官兵谈话。可是大家都不同意,众人提出要走大家一起走,要留大家都留下拼个你死我活。争来争去,还是石匠三老婆出来讲话:“撤走也不是办法,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以后官兵还是要来抓阿啦‘进笼鸡’的。倒不如跟他们拼一拼,让他们知道我们灾民的威力,下次勿敢再来欺侮阿啦”。最后决定还是坚守大院“吃荒饭”,把大墙门关上,用石凳拄牢,要是官兵破门进来,来一个打一个。

官兵见灾民坚守,不肯撤退,便从溪坑西岸冲过来团团围住大院,并想撞门爬墙,进入院子内抓人。

眼见官兵撞门爬墙要进大院,灾民中有个叫张烂帮的,绰号“赛牛皋”,人生得魁梧、性格急躁。他带一班人上屋顶,一边大骂清兵,一边揭起瓦片飞掷,清兵被掷得头破血流,伤者不计其数。结果张烂帮被清兵洋枪击中,当即牺牲。这时大墙门也被撞破,清兵冲进来见人就杀,灾民拼命抵抗,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死伤甚多。但终因寡不敌众,石匠三与灾民退入三间大房子内,想依托门槛再抵挡一阵,他叫灾民往后院撤退,自己手持廿八斤重的大刀断后守住门槛,官兵蜂涌冲来,石匠三挥刀抵挡,由于用力过猛,大刀砍入屋柱难拔,误了战机。有一个清兵“都头”冲上来想抓石匠三,却被石匠三抓起辫子拎至悬空,他脚不能落地难以使劲,就拔出腰刀将自己辫子割掉,后面十几个清兵赶上来用洋枪将石匠三打倒。当时石匠三还未死,被清兵抓到大展庙绑在旗杆里活活杀害。那天是光绪十八年正月廿三日。终年42岁。

这次暴动,“十兄弟”中除一个人不在场外,其余都战死在乾高房院内。还有部分灾民从后屋阴沟洞偷偷撤逃时,不料被当地“地保”张xx发现,告密于官兵,官兵守住两头阴沟洞口,又有21个灾民兄弟被活活杀害,其中2个没有死实,后在殡葬处理时用漏底棺材抬出野外得救脱险。这次暴动灾民兄弟包括石匠三共牺牲三十多名,“血流大展庄”的故事因此也代代相传。当地老百姓为怀念石匠三,特地在大展庙设灵位纪念,过年过节当地庙还会“另立一桌羹饭”敬崇他。○

责任编辑:秦永禄

一次成功撤退的战例

——忆舟山登步岛之战

□吴新华/文

在我省舟山市普陀区的北山上，耸立着一座白色的纪念碑，它的造型像一张疾驶中的风帆，从外海进港的船只，远远就可以看见它的身影，实际上它已经成了渔船归程的航标。这就是登步岛烈士纪念碑，每年清明节，当地政府和人民都要来祭奠，把苍松翠柏和鲜花放在碑前“登步岛战斗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的碑文下。

登步岛是舟山本岛东南的一座小岛，面积仅 15 平方公里。49 年前，在解放舟山战役的过程中，在这儿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61 师的部分部队。于 1949 年 11 月 3 日开始，对该岛发起了渡海登陆作战。由于在三天的战斗过程中，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对我极不利的变化，我方指挥员冷静地分析了敌我态势，在歼敌 4000 人后，果断地主动撤离该岛。

本来，像这样一个师团级的战斗，在解放战争中是不足为奇的。更由于战斗是以我军撤出而结束，事后人们也很少再谈及它。但后来世界战史研究者却发现：世界上有过许多登陆和撤离的战斗，有过不少背水一战取得登陆作战胜利的战例。我国古代的淝水之战，解放战争中的渡江战役，二战中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等都是；在战史上，也有在战局不利而从水上撤离，但这似乎更为困难，1940 年在欧洲大陆的英军在德军的重压面临被歼的处境下：有组织地从邓刻尔克撤回英伦三岛，被誉为奇迹。可以上例子，都发生在陆地上，而从海上对海岛登陆作战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全军覆没；登了陆，战而不利，又能成功地撤出的例子，只有发生在舟山战役中的登步岛战斗中。

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

1949 年夏，随着宁(海)象(山)战役的胜利

结束，整个浙江大陆全部解放。在解放浙江大陆的过程中，歼灭敌正规军并不多。这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在大陆上无法与我军抗衡，故在战略上把主力收缩到以舟山为主的海岛，妄图凭借其海空优势，进行顽抗，同时以舟山为基地，封锁长江口和杭州湾，袭扰上海、杭州等重要城市。

根据三野的部署，组织了舟山战役。以 22 军为主，配以 21 军的 61 师。从 1949 年 8 月开始，22 军主力由穿山半岛向北，先后攻占了大榭岛和金塘岛；61 师由穿山半岛南侧先后攻占六横岛、虾峙岛，并于 10 月 17 日一举解放桃花岛。当时我军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全凭经过短期训练的北方“旱鸭子”和少数船老大，驾着动员来的木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与敌人的飞机军舰搏斗，并取得解放舟山外围岛屿和歼灭大量敌人的胜利，这本身就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但也应承认，随着战线的延长，船只保障、后勤供应方面存在困难和暴露的问题也日益增多。这点，单独负责一个方向、占领岛屿较多的 61 师感受颇深。因此该师曾数次提出进行一个时期修整和准备船只的意见。但最后还是根据上级精神，于 11 月 3 日，发起对登步岛的攻击。

桃花岛解放后，舟山本岛，特别是主要港口沈家门受到极大威胁，守敌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把登步岛当作最后屏障，不仅



在这弹丸小岛上驻守了221师师部、661团全部和662团二个营，构筑了大量的工事和障碍。并在沈家门、朱家尖集结了具有海空机动能力的强大预备队。

11月3日，年轻的共和国成立才一个月。我61师以182团全部和183团1营为第一梯队；183团3营及2营一个连为师预备队。计划在登陆后，迅速攻战炮台山、张网湾山等制高点后，猛插鸡冠礁，控制码头，切断敌海上逃跑的退路，阻敌海上增援。根据以往逐岛作战的经验，必须在天亮前结束战斗，使敌之海空优势难以发挥。

原定11月3日20时登陆，因调动船只延误了两个小时。22时，182团3营、2营一个半连和183团1营在桃花岛炮火支援下，驾着小船，在大雨中，渡过二千米宽的海峡，冒着敌人滩头阵地的猛烈火力，冲上了登步岛，并迅速插向纵深。可是，22时30分，突起逆风，潮水旺退，船开不出去，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渡海投入战斗。因此，当晚参加战斗的实际上只有七个半连。已登陆的部队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攻占了制高点，将敌主力打乱，俘敌600余人，控制了该岛四分之三的地区，并将残敌压缩到鸡冠礁村及沿海一隅。但由于兵力过于薄弱，加上天色已明。未能达成占领码头的战斗任务。

4日6时30分，敌75师224团与67师202团，在飞机的掩护下，由沈家门乘军舰驰援登步岛。敌援军在鸡冠礁登陆后，即在空中、海上火力支援下，向流水岩等我军阵地发动猛烈进攻。至此，空前激烈、空前残酷的争夺战开始。我在岛上的部队，在无水喝、无饭吃、无工事依托、无援军的情况下，不断打退敌人的轮番攻击，每一座山头都反复争夺，子弹打完了，就拚刺刀、抢托、洋锹、石头，在我183团1营的阵地前，敌人就遗尸800多具，可三营也只剩下30多人了。

敌人一方面用飞机、军舰封锁桃花岛与登步岛之间的海峡，阻止我的增援和后勤支援；同时继续向登步岛增派了224团、200团及67师之201团、199团和军警卫营。并向我军阵地连续猛攻。由于力量过于悬殊，我伤亡很大，中午12时，守卫炮台山的182团7连，在连续打退敌一个团五次进攻后，遭到较大伤亡

，撤出了制高点炮台山。态势对我十分不利。

4日晚9时，我61师师长胡炜亲率183团3营和2营的一个连，182团1营和第5、6连，师侦察连、警卫连和92炮连，相继投入登步岛。他们登陆后，仍向原定的目标鸡冠礁攻击前进，意图控制港口，扭转不利形势。但敌兵力过多，又有海空支援，攻击未能奏效，战事呈现胶着状态。

5日，敌机敌舰的火力更为猛烈，增援部队源源登陆。8时后，又以优势兵力向我发动进攻，我军在竹山、野猪塘山、流水岩等阵地击退敌人10多次进攻，给敌大量杀伤，并俘虏了一些敌人。

5日12时。师指挥员分析了战场形势，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方不仅无兵可增，且无法补充消耗，以现有力量已无法歼灭当前之敌和控制全岛。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撤退从5日傍晚开始施行，6日凌晨1时30分撤退完毕，撤退过程中，我军无伤亡。登步岛战斗结束。

置之死地而后生

海岛不同于大陆，无法发挥我军擅长迂回机动的特长，双方的战术意图较难隐蔽，如撤退意图被敌发觉，后果不堪设想；两岛间横隔近2000米潮大流急敌人严密封锁的海峡；后方前来接应的船只十分有限，航行没有可靠的保证，如在渡运过程中遭敌攻击，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岛上部队经过连日血战十分疲乏，几近粮尽弹绝；敌兵力数倍于我，有海空优势，敌67军军长刘廉一、87军军长朱军一均登岛督战，气焰十分嚣张。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撤退的决定，不仅需要极大胆略，而且撤退的组织和战术上也需有极周密部署。

直接指挥这场战斗的61师师长胡炜，历来有“军政全优”美称，他有文化、肯动脑筋、作战勇敢，28岁就当上了师长。此刻，他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但他完全抛开了个人的得失，冷静地、全面地分析了情况。主动撤退的责任重大，撤退要冒风险，撤退失败，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撤退成功也仅是个“败将”。按照原方案打下去，他相信这支从大别山走下来、千锤百炼的红军部队会与阵地共存亡打到最后一个人。但这不是对部队、对人民、对革命事业负责的态度。他果断地下了撤退的决心。他的措施是：

一、召集部分团以上干部,统一了思想,对撤退作了周密部署;

二、电告留守桃花岛的师副政委李清泉,要求迅速收集船只接应;

三、部署了各种佯动迷惑敌人,隐蔽我方的意图和掩护撤退的作战方案交得力干部执行;

四、严密策划部队集结、起渡的顺序,制定多种应变方案。

撤退的决心,于5日12时左右形成,并立即转达组织,于傍晚开始执行。

根据敌人不善夜战的特点,几天来形成了白天敌攻我守,夜间我攻夺回失地的规律。由182团团长杜绍三和182团参谋长刘正昌各率一个营(经三天苦战,实际人数有限)对敌实行佯攻,掩护部队由海上撤退。当时估计渡海用的船只很少,整个撤退时间至少需5、6个小时。在此期间,绝不能让敌觉察我方的意图;万一敌人察觉,这两个营就必须把敌人坚决顶住。

9连连长战斗英雄夏少卿,带领由7、8、9连和机炮连收集起来的人员组成的7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5至7人组成由排长或老班长带队,各小分队配轻机枪一挺,多带炸药包和手榴弹,入夜后,摸到敌火力点下面,然后突然开火,步枪、机枪、手榴弹、炸药包、冲锋号响成一片,团迫击炮也向敌开火。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只是龟缩在掩体里乱放枪炮。隔了半小时,小分队又干一次。到第三次后,听不到迫击炮的声音。夏少卿知道,团部已经撤走,岛上只剩下三营了。他给分队作了动员,要求第四次要打得更猛烈。这就使敌人无法摸清我军的真实意图。直到午夜,营部通信员来通知他们撤。他们到了渡口,见营部和7、9连的船已开走,他带9连2、3排登了船,但9连的7班还没有来,大家都在船上静悄悄地等着。敌人的炮弹在船周围溅起股股水柱,但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要死大家死在一起,绝不能留下一个战友。十多分钟后,9连7班来了,船才缓缓向桃花岛驶去。

在最后撤离的人中,还有182团参谋长刘正昌,这位多年与胡炜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被胡炜选中作为“殿后”,当他奉命来到师指挥所时,看到参谋们正在销毁文件,他立即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给他的任务很简单:你

一定要掩护到走完最后一个人;如果敌人发现我们意图,一定会拼命攻上来。那你们就要坚决顶住,最后能不能回来……。刘正昌回答:师长放心,我是共产党员。二话没说就去执行任务。刘正昌指挥部队轮番掩护,一批批有序地撤回渡口,最后他手中只有一个班了。他和战士们一样,把手榴弹、炸药包放在身边,严密监视着敌人。战士们催他先走,他不同意,而是让大家先走,自己带一个战斗小组,又把阵地搜索一遍,确信没有漏人,才乘最后一条小船返回。

部队在撤退中,还看到了动人的一幕。师长胡炜、副参谋长王超,在渡口指挥,让武器、伤员、俘虏先登船,看到首长沉着冷静、撤退在后的态度,都十分感动。当他们最后登船时,又把仅有的救生衣留下来给后面的同志。

正是这种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保证不丢下一个战友,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全局的革命精神,使部队的全体官兵(包括不少不久前刚解放的战士)万众一心,遵守纪律,服从指挥,严守秘密,集结、登船秩序井然。

6日凌晨1时30分,部队全部撤回桃花岛。一个多小时后敌人才弄清情况,但已只能朝海峡盲目射击一通,以发泄他们的懊丧。

登步岛战斗,我以5个营的兵力,连续恶战50多个小时,抗击了有海空支援的近7个团30余次进攻,歼敌近4000人,还带回俘虏数百名,我军伤亡千人,但没有丢弃一个伤



员。一个在战斗中失去联系的战士傅祥明,在发现部队已经撤退后,宁死也不愿当俘虏,抱着一根竹竿跳进大海,飘到一个礁石上,靠吃小蟹和小葱度过10个昼夜,最后被救归队。

历史功过

登步岛战斗后,各方对这次战斗,有不同的评价。

台湾国民党当局把它当作“辉煌胜利”大肆宣传,说北有登步、南有金门,阻止了我解放台湾的计划。但实际上,登步岛战斗,虽然没有一举解放该岛,但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敌的守岛决心有极大的震撼,这对后来顺利解放舟山全部岛屿有很大影响。

在我们内部,对登步岛战斗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登步岛战斗是舟山战役中的一次重大失利。有人认为:登步岛战斗,在登陆、歼敌方面,以少胜多,应予肯定,但未实现作战的企图,就整个战斗而言是失败。

在49年后的今天,我们来研究这一战斗时,应该从更大的视野来衡量它。

一、从战役指挥上看,由于开始阶段比较顺利,产生了轻敌思想,在桃花岛战斗之后,未进行必要的修整和充分的准备,对敌人的战役意图和情况缺乏足够了解的情况下,仓促发起攻击。这是此次战斗未能达成预期目的的根本原因。事实上,10月4日,中央军委在批准三野关于总攻的作战方案时,已经明确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战前作好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可惜未能在登步岛战斗决策中贯彻。登步岛战后,华东和7、9、兵团认真检查船只等准备情况,根据敌情,一再推迟了对舟山本岛的总攻时间。1950年5月,在我周密准备和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亲飞定海,决定逃离舟山。登步岛战斗的经验,对整个舟山战役的正确实施,避免更大损失,有着极其宝贵的意义。

二、登步岛战斗,在敌强我弱,加上不可抗拒的因素——由于风向潮水的变化,致使未能把原计划使用的部队及时投入战斗,当晚未能全歼守战,次日起敌大量增援,战局出现逆转的情况下,虽4日晚师长亲率部队增援,但未能扭转战局。随着时间的推移,敌我力量优劣对比将进一步扩大。敌人为了保住舟山本岛的一道屏障,显示其不惜一切代价企图一举歼灭我登岛部队的决心。此时,战场指挥员果断下决心主动撤出战斗,的确是十分必要和有胆识之举。

三、打运动战,本是我军的特长,但在弹丸小岛上作战,特别是敌优势兵力已经控制岛上主要阵地,又有绝对海空优势,双方阵地交错;我仅有一个可以漕渡的渡口,运输船只却为区区几条小船。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渡海

撤退的风险极大。师长胡炜在与几位团干部商讨此事时,他们都对此颇为担忧。但师长胡炜认为:从常规的军事眼光来看,在这种情况下由海上撤退,等于自杀。敌人的指挥官,一定也是这样看法。这反而成了我们出其不意的条件。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战术措施,严格保守秘密,组织实施得当,撤退是可以成功的。团干们被胡炜的辩证法说服了,全心全意地去贯彻这一战斗意图。这不能不说是战术指挥上的杰作。

四、再好的指挥意图,必须有得力的行动去执行和实施。渡海撤退,必须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每个指战员都必须有牺牲自己或局部保证全局的精神。这一点,在全体指战员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登步岛战斗证明,这支部队不愧为英雄的部队。从奋不顾身登陆穿插歼灭大量敌人,到在敌军舰、飞机猖狂施虐,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敌战斗到底,出现了许多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在撤退中出现的刘正昌、夏少卿式的干部,是撤退取得胜利的保证。

永垂不朽

前进和撤退,是战斗中互相依存并可相互转化的一对矛盾。一个战术行动的成功与失败,绝不能孤立的看是进还是退。进不一定是胜利,退不一定是失败。如解放战争中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和我军的主动撤出延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这个观点出发,登步岛的撤退是一着胜棋。

登步岛战斗是在决策不当的情况下发起的。全体指战员发扬了我军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歼敌近4000,还带回数百俘虏,首先在精神上压倒了敌人,为尔后的出奇不意创造了前提;当战斗过程中出现了极其险恶的局势,指挥员审时度势,以大无畏的精神,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果断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广大指战员严守纪律,先人后己,是指挥意图实现的保证。以上三种合力,创造了这人间奇迹,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孤例,这应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登步岛的战例是辩证唯物主义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体现,应该成为军事科学的一笔财富。○

责任编辑:邬永昌

普

陀

山

扬名之始

□何雷书/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陆地总面积只有 12.5 平方千米的普陀山，以佛教名山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而名扬中外。

普陀山之扬名，是它成为观音菩萨道场开始的。普陀山原名梅岑山，因西汉末年梅福在此修道而名。唐咸通四年(863)，日本高僧慧锇从五台山请得观音神像回国，途经莲花洋遇风涛，以为观音不肯去日本，留下神像，称“不肯去观音”。五代梁贞明二年(916)建“不肯去观音院”。宋元丰三年(1080)朝廷赐银，把“不肯去观音院”改建成宝陀观音寺，一度称宝陀山。其时，香火兴盛，宋嘉定七年(1214)，钦定为观音菩萨道场，并根据佛经梵语“补怛洛迦”，更名为普陀洛迦山，亦称补陀洛迦山。明代，把莲花洋南的一个小岛称为洛迦山。

从此，就有普陀山、洛迦山这两个山名。

观音是三国魏嘉平五年(253)传入的，为什么时隔 960 年才确定普陀山为道场呢？

一、时机问题，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建佛教道场，是要根据佛教发展情况决定的。中国从东汉到宋代，儒、佛、道三教虽然基本上是平行的，但三教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有时斗争还很激烈。因此，不可能过早建立观音道场。再说，在宋代之前，古天竺（今印度）的观音道场补怛洛迦香火正旺，在这种情况下，另设观音道场是不妥当的。到南宋时期，形势已起了根本变化，佛教创始国印度，在十三世纪初佛教已趋消失（十

九世纪后稍有复兴），连补怛洛迦亦无觅处（见《文化学辞典》），而中国在唐代佛教已进入了鼎盛时期，南宋孝宗时期，又实行了“三教合一”的政策，儒、佛、道三教矛盾调和，为建观音场创造了良好的时机。

二、观音形象改变后的必需。观音原来是男性印度斯坦族人的形象：裸露上身、蓄髭须、留长眉，是个“勇猛丈夫”，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佛门认为，佛菩萨可以根据需要示现各种形象，而观音有三十三应身和三十三化身，故从民族感情和实际需要考虑，从南北开始就为观音改形，并宣称：观音是中国春秋时期楚庄王的第三个女儿妙善修成的。到唐开元年间，中国的女性观音已基本定型：脸盘丰润、秀眉、挺鼻、樱桃口、戴凤冠、挂璎珞、项饰、发垂肩、披天衣、袒胸露臂，着锦绣罗裙，称“观音娘娘”。这大慈大悲的形象，自然可敬可亲。中国的女观音很快传到东亚各国，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佛教界，把中国的女观音视为“正宗”。中国的观音自然要有中国的观音道场，唐天宝年间，朝廷曾两次请天竺僧来华选址，后因“安史之乱”，又加上宝应元年(762)袁晁起义在舟山建水师，翁山县（今舟山）被废治，把建观音道场的事搁下了。

三、社会舆论。舟山民间很早就有“观音菩萨在普陀山”的传说，据《神仙纲鉴略》载：安期生在桃花岛修道时，“欲求见大士，七上补陀，未得一面”。安期生是秦代人，这就是说，观音在秦代时就到普陀山了。又据元代盛熙明的《普陀洛迦山传》载：唐大中元年(847)“梵僧来山，谒潮洞，燔尽十指，亲睹观音，与说妙法，授以七色宝石。”这就是说，在“不肯去观音”到普陀山前十六年，天竺僧已知道观音在普陀山了。后来慧锇留下“不肯去观音”正应了传说。所以，人们认为观音与普陀山有缘，民间还有“观音跨海选道场”的传说，认为普陀山是观音菩萨亲自选定的道场，菩萨之意不可违。

四、普陀山形势与“补怛洛迦”相吻合，佛教《华严经》称：“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观自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载：“秣刺耶山东有布怛洛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欲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派出大河，周绕二十匝

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往来游舍”。这是指古天竺的补怛洛迦山。普陀山是莲花洋的一个悬水岛,是第四纪晚期形成的。经过一万年左右的地壳运动,造成岩体崩塌和地面升降,形势错节。有盘陀石、云扶石那样的峭壁悬石,是谓“山径危险、岩谷欲倾”;又有“潮音洞、梵音洞那样的岩洞石室,自然是“石天宫”了。因此说,普陀山是天造地设的观音道场。

普陀山在国外的扬名,“南海普陀山”之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普陀山在东海,为什么称“南海普陀山”?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的记载,认定普陀山在古代属南海;二是中国历代帝王大都在北方建都,习惯把南方的海域称为南海。并且认为,因为观音在南海普陀山,故称南海观音。

其实,观音在古天竺就称南海观音。唐代著名文学家王勃的《观音大士赞》曰:“南海海深幽绝处,碧绀嵯峨连水府;号名七宝洛迦山,自在观音于彼住。”王勃卒于公元676年,就算此《赞》作于公元

676年,亦比不肯去观音到普陀山早187年。可见,这“南海观音”是在古天竺的称谓。据说,南海观音之称有两个出典:一是因为观音出在天竺,而天竺属南亚,故称南海观音;二是“南海”二字是对观音的尊称,是形象高大、受人尊敬的意思。普陀山既然是观音道场,自然要以菩萨的名号,称南海普陀山,否则,外国人就不知普陀山同观音是个什么关系。

南海普陀山之称,是佛门对外交往的需要,南海普陀山之称始于元初,是由普陀山和尚如智和一山提出的。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元初,由于几次东征,中断了中日邦交。后来,根据刑部尚书崔

彧之疏,决定通好日本。当时,朝廷考虑到日本信佛教,普陀山有日本和尚留下“不肯去观音”的这层关系,先后两次派普陀山和尚出使日本。至元二十一年(1284),朝廷派王积翁出使日本,“帝以日本俗尚佛,命普陀僧如智同往。”当时,如智提出改普陀山为“南海普陀山”。后因“积翁强取任甲所有四舶使行,……任佯诺,将至日本,醉从者以酒,遂杀积翁”。出使未成。

大德三年(1299)三月,元成宗下诏曰:“向者世祖皇帝尝遣补陀禅僧如智及王积翁等两奉玺书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还。自朕临御以来,绥怀诸国,薄海内外,靡有遐遣。日本之好,宜复通问,今如智已老,补陀僧一山,高行素高,可令往谕,附商舶以行,庶可必达,盖欲成先帝遗意。”当时,一山有两个头衔:一是“江浙释教总统”;二是敕封为“妙慈弘济大师”。但是,一山提出,虽然慧锷和尚留“不肯去观音”处成了观音道场,日本人会高兴的,但普陀山的山名与菩萨名号贴得不紧,日本人不容易理解,他主张用古天竺的习惯称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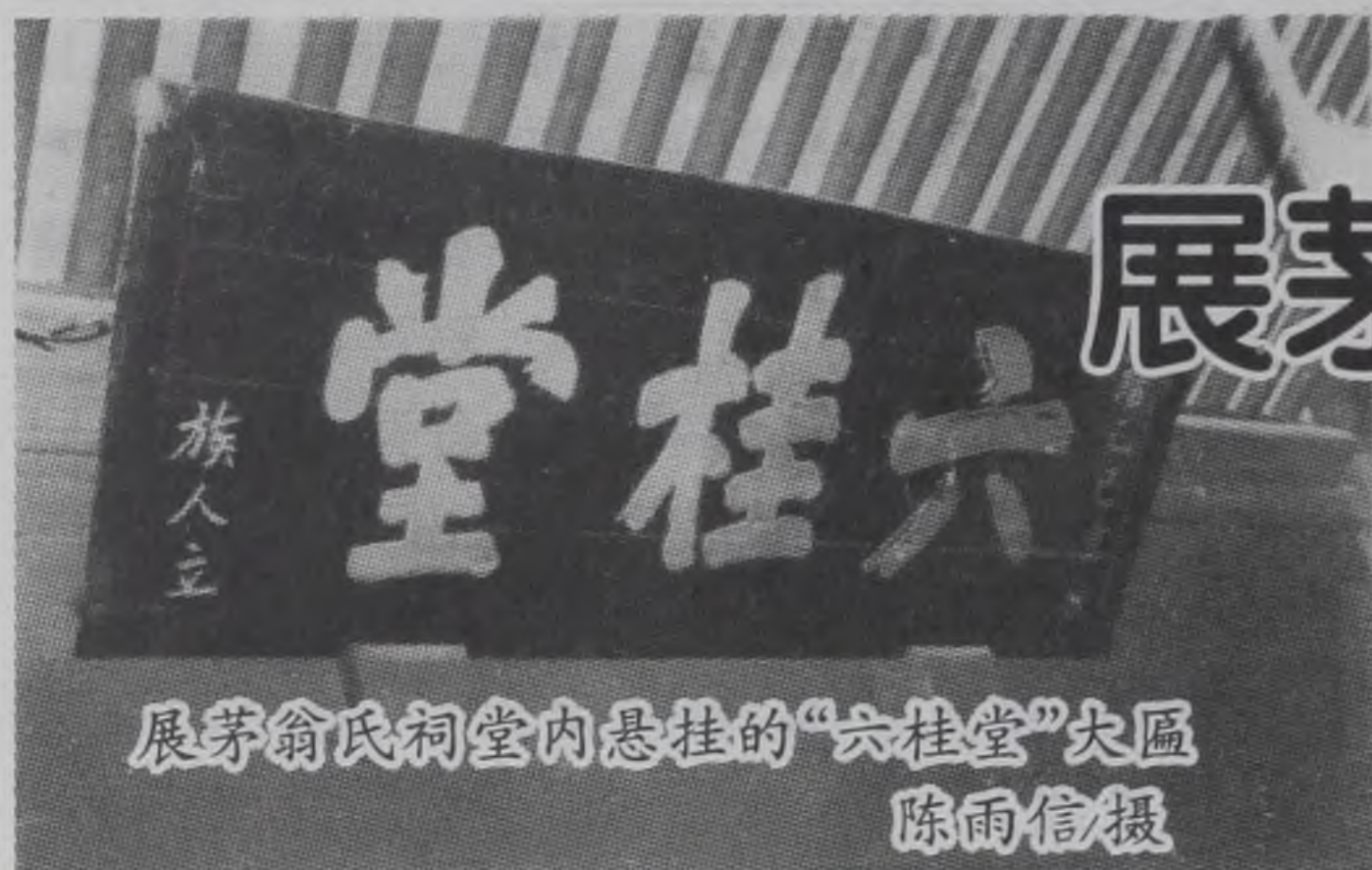
同南海观音相呼应,称南海普陀山。

一山以南海普陀山住持的身份到日本后,通过宣传观音道场的来历,受到日本政府和佛教界的敬重。日本天皇后宇多把他请到京都南禅寺传

经说法。一山留日本十九年,创建了“一山派”禅学。一山病故后,日本天皇亲题其像,赞曰:“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并在南禅寺为一山建塔、祠。一山的这次出使,不仅为恢复元初中断的中日邦交立了大功,而且把南海普陀山之名传遍了日本,为普陀山在国外扬名立了第一功。○

责任编辑:邬永昌





展茅“六桂堂”

的由来

巨匾《六桂堂》悬于翁氏宗祠内，同堂又嵌《解元》匾。堂前立一石碑，标以“普陀县文物保护单位”。据悉，祠内曾树有三道旗杆，立十多道匾碑，惜毁于文革。

据考，“六桂”源出宋时闽地。五代北宋名人翁乾度，家居洛阳，其夫人陈氏生六子。六子同朝登科，誉声四起，名噪一时，世人誉之：“六桂联芳”。“六桂”后裔以“六桂”为堂号亦由此而来。世人何以称六人为“桂”？桂，植于净土，其花萼清香异于俗。桂有牡桂、茵桂、岩桂、银桂、金桂、丹桂，其数合六。又，东晋王嘉（字子年）所著《拾遗记》一书记载：“宣帝起桂台以望气东引太液之水。有一连理桂，树上枝跨于渠水，下枝隔岸而南生。此虽南北异处，而其根自同也。翁氏六兄弟于北宋年间，曾有五人易姓洪、江、汪、方、龚。六人虽异姓，然同根同源，同朝登科，故世人谓之“六桂”。

乾度六子高中，俱得益于宋太祖赵匡胤的“重儒臣，以达文治”的治国方略。赵匡胤登基后，召学士陶谷、窦仪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建隆元年（公元 960 年），遂诏起科取士。开宝六年（公元 973 年），宋太祖以权知贡举李昉取舍不公，新选进士材质陋、应对失次，亲临讲武殿复以阅试，新得进士二十六人。由此殿试为常式。雍熙二年（公元 985 年），宋太宗赵匡义实行“严科举”制度，规定：“自今诸科并令量定人数，相参引试，分科隔坐，命官巡察监门，谨视出入，以防作弊”，并“始令试官亲戚别试”。是年得进士一百七十九人。翁乾度名门出身，颇重读书，教子甚严，故此，六子俱有长进，相继入仕，为国效力。长子处厚，建隆元年（公元 960 年）进士，官礼部员外郎，兼殿中上柱国，赐绯鱼袋；次子处恭，雍熙二年（公元 985 年）进士，官泉州法曹；三子处

易，建隆元年（公元 960 年）与长兄同榜进士，任南剑少尉；四子处朴，开宝六年（公元 973 年）进士，泉州法曹；五子处廉，开宝六年（公元 973 年）与四兄同榜进士，官大理寺司直、监察御史；六子处休，雍熙二年（公元 985 年），与次兄同榜进士，官朝散郎、韶州通判。

翁氏“六桂”入仕后，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北宋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辽）、西夏统治者，为谋取中原，不时进犯、侵扰。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 986 年）至宋景宗景德元年（公元 1004 年）的 18 年间，契丹举兵南侵竟 8 次之多。为保大宋江山，宋廷对契丹、西夏曾一度实行怀柔政策。据闽、台、港和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等地翁氏六桂谱记载，翁氏六桂谱记载，翁处厚等兄弟曾“受命以‘六桂’节驻胡邦”。宋、辽平和不久，战事又频频而起。继雍熙三年（公元 986 年）杨业战死陈家沟，李基隆、杨延昭等率师纵横南北，抗辽十余载。至景德元年（公元 1004 年）“澶渊之盟”，战事方息。其间，翁氏“六桂”先后随军或率部辗转济阳、淮阳、洛阳、方城、武陵、敦煌等地抗击契丹兵。其中，翁处易战于洛阳东部盐官村，终因四面受困，兵尽矢穷，壮烈殉职。十余载的战乱和内廷朋党的互相倾轧之祸，使“六桂”流徙甘肃、山东、河南、湖北、江南而居，“六桂”中有“五桂”先后易为洪、江、方、龚、汪姓，唯处易仍沿以翁姓。“五桂”易姓，《中国 100 个大姓》（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和翁氏六桂谱有载。析《翁氏源流分派系记》，易姓的“五桂”后裔，后有复以翁氏者，有沿袭翁姓者。今国内外翁、洪、江、方、龚、汪姓以“六桂”为其堂号者，俱尊乾度六子为其祖。海外六姓至今仍悬挂“六桂”遗像（着宋代官服），分列“处厚公、处恭（下转第 49 页）

定海县奉宪清交鱼鳞图册

□凌金祚 陈雨信/文

今年 1 月上旬, 我市数家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了舟山首次发现《定海县奉宪清交鱼鳞图册》一事, 引起档案、文史、土管等部门的关注。据报道, 舟山“昔被夷奴侵犯”时, “定海县署被焚, 全县鱼鳞清册均付之一炬, 查无一本遗存。”今“定邑鱼鳞图册”复昭面世, 对我们了解清代舟山耕地状况和研究宋、明、清三朝地籍制度变化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鱼鳞图册的由来、作用

鱼鳞图册, 简称鱼鳞册, 又称土地丈量册。它是我国古代由政府编造的土地簿册, 作为明确地权、征派赋役的依据。

据史籍记载, 宋代“设保甲保伍之法, 绘为鱼鳞图册。以比户计之。凡居向背, 山川远近, 如指诸掌, 备载每户之长幼姓名、年龄、生业。”时婺州、漳州曾编造, 但未推广。

元末明初, 由于兵革连年, 全国在籍民户“亡绝过半, 田多荒芜”。各地“版籍多亡, 田赋无准”, 大地主和旧贵族乘机采用隐瞒土地面积、荫庇漏籍人口等手段逃避赋役。据《明史》载: “两浙富民畏避徭役, 大率以田产寄他户, 谓之铁脚诡寄。”久之, 相习成风, 乡里、州县、府各级官员上下相瞒, 相互欺骗, 奸弊百出, 谓之“通天诡寄”。而广大农民漂流无定, 渴望得到土地, 期盼新王朝废除暴政、减轻赋税, 安定社会秩序, 以求安居乐业。为使被豪强地主和旧贵族隐占的劳动力归由国家管理, 把背井离乡的“流民”吸引到农业生产上来, 稳定社会秩序, 实现“田野辟, 户口增”, 朱元璋在实行严刑重法消灭“奸顽豪富之家”的同时, 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着力调整了户籍和地

籍管理政策及办法。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 年)正月, 朱元璋“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 核浙西田亩, 定其赋税。”随后又“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 并“诏天下编赋役黄册”。黄册, “以户为主, 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册籍以黄纸为册面, 故名“黄册”。洪武二十年, 又“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 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 量度四亩方圆, 次以字号, 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 编类为册, 状如鱼鳞, 号曰鱼鳞图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 土地田亩的各种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的区别, 全部加以记载。鱼鳞图册是确定地权(所有权)的依据, 赋役黄册则是征收赋役的根据。若以鱼鳞册为经, 则土地产权的争执诉讼便有据可依, 而以黄册为纬, 则国家对赋役的征收便有法可循。

洪武年间, 明朝政府通过对土地和户口的全国性普查, 建立黄册、鱼鳞图册两种簿籍, 颁布租税和徭役制度, 打击了“富民豪族”, 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明朝初期出现了“百姓充实, 府藏衍溢”的繁荣局面。但是, 随着明政权日益腐败, 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日趋严重, 赋役制度弊端丛生, 造册工作混乱, “两册”作用也逐渐走向了反面。

清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朝, 以田赋和丁役作为清王朝的主要收入。清顺治朝后期, 清政府曾对赋役制度进行整顿, 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标准, 编制《赋役全书》, 另立鱼鳞册、黄册“与《赋役全书》相表里”, 继续沿用“一条鞭法”, 并颁发诸多单、票和增设其他册



籍作为辅助手段。康熙亲政后,针对时弊,对赋役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坚持“两册”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催科四法”,较好地解决了赋役征收中的一些问题。清代中、后期,各朝遵循“祖训”,基本上承袭了上述制度,但其作用大不如初。

二、《定海县奉宪清交鱼鳞图册》制成时间考辨

如前所言,鱼鳞图册萌自宋时,盛于明朝,延之清代,历史久长。但由于种种原因,鱼鳞图册今已不多见。虽然明朝南京玄武湖“后湖黄册库”中包括鱼鳞图册在内,多达150多万本,然幸存至今的却为数寥寥。尤其是舟山,历史上数次“海禁”,居民迁徙,外患内乱不断,明清古籍大多焚毁、散失。今《定海县奉宪清交鱼鳞图册》复现面世,甚为难得。

经初步查证,新近发现的《定海县奉宪清交鱼鳞图册》为清代样本和民国抄本。

据史志记载,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舟山称昌国县;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升昌国县为昌国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复降为县,二十年县废;清康熙二十六年,诏改舟山为“定海山”,建县后赐名“定海县”,原定海县改名镇海县。该鱼鳞图册若是洪武年间编造,则应署以“昌国县清交鱼鳞图册”(虽然明时今镇海区称定海县,明洪武二十年昌国县并入,属宁波府,但该鱼鳞图册所载内容却与此段历史并无关系)。

该鱼鳞图册所列山川及土地片划地名均属今舟山展茅、螺门、芦花、临城等乡镇和沈家门镇塘头管理处所辖范围,反映的是清代

该区域民户土地划分情况。根据图册所列户主姓名,我们查阅了普陀区展茅镇翁家岙“六桂堂”翁氏谱简历和白泉镇翁家村翁氏简谱(见《白泉镇志》),并对翁、柴、史姓户主进行了抽样调查。翁氏自五十代至六十代排行为永、锡、贵、微、庸、日、富、文、君、元、恺。翁家岙翁氏谱记:“祖先于明末清初迁来,距今约三百余年。”翁家村翁氏谱载:“文”字辈于清康熙年间从慈溪三弱迁入。鱼鳞图册所载户主翁恺能、柴德华均系展茅人,清康熙四年出生;史鸿逵是清康熙三十年建筑展茅缪公塘硿闸的当手人;翁元亨,展茅人,据当地几位八旬老人说,翁元亨是当年建造大展庙的当手人,在当地颇有名气,大展庙距今已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

据此,我们认为,《定海县奉宪清交鱼鳞图册》的印制和编造当在清康熙、雍正年间。

《定海县奉宪清交鱼鳞图册》今存两本。册本系筒子卷,规格大小为26.9×27.1厘米,封面黄色,内芯宣纸,每页通栏,中缝标题“定海县奉宪清交鱼鳞图册”及四方块项目(与明鱼鳞图项目大致相同)均木刻板印,以墨书填写,内容为:户主、字号土名、土地面积、东西南北接壤号等。两本图册内芯、色泽、印刷、书写字体微异。据展茅镇志办庄智秀调查,柴福清所保存的其中一本图册,系其父于民国二十四年与庄民打官司时,借村民孙相源所存原本抄成,原本已归还原主,据说原件已毁。根据我们查考、分析,两本中芯黄虫蛀者系清代抄本,尚未抄完芯白者为民国抄本。《明通鉴》载,“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清沿明制,清时对黄册、鱼鳞图册等文书的处理大致相同,所以民间所存之册似为抄本。尽管原本与抄本一时难辨,但有一点是可信的,即册本的印制及所载内容与史书所述的“题本”(或称“样本”。册本必须按中央颁发的样本格式编造)要求相符。两本鱼鳞图册的发现,为我们查考和研究清代地籍制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献依据,因而具有重要的收藏和利用价值。○

责任编辑:邬永昌

二三十年前,舟山有一句俗话:“舟山人扯淡,番薯干当饭。”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历史上番薯在舟山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确实,时至今日,每一个上了三十岁的舟山人还记得当年早晚二餐番薯稀饭和番薯干掺饭的滋味。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番薯不仅曾是舟山人的主食,而且,舟山也是我国最早引种番薯的地方之一。

一、舟山的番薯种植简史

舟山引种番薯的记载,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陈桥驿教授的考证,最早见于周应宾所纂,1607 年刊行的明万历《普陀山志》。陈教授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评〈普陀县志〉》一文转引了该志卷四记载:“番薯,如山药而紫,味甘,种自日本来。”可见,当时番薯已是一种被当地人接受了作物,引入时间在此之前。陈教授说:“这就是番薯引入我国的第一次记录”。此后,清康熙《定海县志》中没有记录,光绪《定海厅志》说:“甘薯(番薯)今有紫皮、白皮二种。紫皮者,肉也带紫”。到民国间,舟山已是全省主要的番薯产地之一。当时的种植情况,新编《定海县志》转引《中国实业志》(1933 年)文:“番薯,浙江以平阳种植面积为最大,绍兴次之,定海又次之,产量却以定海最多。”另据《舟山市志》载,1933 年,番薯产量 9514 吨,居全省第三位。50 年代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品种不断增加,“胜利百号”、“舟农白皮”、“丽群六号”、“舟薯 1 号”和“舟薯 5 号”等品种陆续引进、培育、推广。到 1972 年,达到历史最高产量,年产薯干(5 斤鲜薯折 1 斤薯干)52375 吨,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 31%,1978 年以后,面积和产量逐年缩小,到 1997 年,种植面积 38400 亩,产薯干 14318 吨。

二、几种引种番薯渠道的比较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的记载,番薯起源于热带美洲,由航海家哥伦布从新大陆带回,献给西班牙女王。16 世纪初,西班牙

已普遍种植,并由航海的水手携带至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再传到亚洲各地。

我国引种番薯大约在 16 世纪末叶。陈教授在他的巨作《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

山林破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 年第 4 期)中说:关于这种作物的传入经过,各方说法不一……其实,一种作物有时也可能从几处不同的地方分别传来。番薯来源,众说不一或许就反映了这种事实。综合各种说法,其中最早的有三条:

1.《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在“甘薯”的“起源和传播”条目中说:“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饶确之地遍行栽播。’《浙江农业志源》96 年第 2 期载:‘在明朝中叶,甘薯由旅居吕宋的华侨陈振龙为家乡救饥度荒而引入福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把它带到厦门……’。”

2.《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在“农业大事年表”中载:“1582 年,甘薯从越南引入中国广东东莞。”

3.从浙江舟山引入。即前文的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的《普陀山志》记载:“……种从日本来。”

在前二种渠道中,第二种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引种时间在 1582 年。第一种虽然没有指出哪一年,但也肯定地记载了在明万历年间。而且,根据相关记载,全国南北各地的番薯品种大多从福建引种。《中国大百科全书》说:“以上史实证明甘薯系在 16 世纪末叶从南洋引入中国福建、广东,而后向长江、黄河流域及台湾传播。”然而,第三种渠道虽没有带来全国性或大区域性的影响,但仔细分析史料,可以推测其种植时间却未必晚于

舟山,最早引种番薯的地方

□王建富/文

前二种渠道,至少也可以称为最早引种的渠道之一。原因如下:

1.前二种渠道的引入时间系后人考证的结论。若论最早将番薯作为一种粮食作物载入地方志的,还是万历《普陀山志》,这个记载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该志的刊行时间为1607年,与第一种渠道同处万历年,与《浙江农业志源》所说的1593年相距13年,较第二种渠道也只晚了25年。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那时的舟山尚处于“海禁”之中,当地的昌国县治已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撤销。番薯引种后,没有官方的推介,仅凭居民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很少量的市场商贸活动来传播,从引种到入编志书,至少也得一二十年时间,甚至更久。

舟山引种番薯的品种来源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可能是来自于倭寇的骚扰和平倭战争。因为在十六世纪中叶是倭寇(包括海商)在江、浙、闽一带海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舟山作为倭寇骚扰中国沿海的必经之地,自然也深受其害。今普陀区的六横岛、普陀山、朱家尖,定海区的金塘岛、大猫岛,岱山县的大、小长涂山,嵊泗县的枸杞岛、嵊山以及舟山本岛等各岛屿都曾受倭寇的侵害、盘踞。因此,番薯很有可能由倭寇作为口粮或贸易物带入舟山,被当地人偶然获得,或在战争中被军民缴获后,流传开来。由于倭寇在舟山的主要骚扰时期是嘉靖十九年到万历二十九年,番薯若由这个原因引入,则最大的可能时间是1540~1601年。

第二种可能,番薯品种得于双屿港的互市交易。据《普陀县志》第十九篇及附录一的记载,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葡萄牙人玛斯卡伦阿斯率船队抵达双屿港(今六横岛附近)停留。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与细川氏的贡使在宁波发生冲突,乘机大肆焚掠。朝廷以“倭患起于市舶”,停止了宁波等地的对外贸易活动,地处海域的双屿港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走私贸易的市场。嘉靖十九年以后,奸商许松四兄弟和李光头、王(一作汪)直等引大批葡萄牙海商和日本海商(包括倭寇)在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并组织武装加以保护,使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葡萄牙人品笃(Pinto)记载,葡萄牙人在双屿港建有馆舍上千座,建有市政设施和宗教设施,成为“国际

走私贸易港”。由于普陀山与双屿港相距仅40公里,番薯从双屿港传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通过这条道传入的时间应在1540~1548年之间。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舟山引种的番薯的品种来源也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如万历《普陀山志》所言,由日本沿海带来。即番薯由菲律宾传入日本后不久,就由倭寇和海商带入舟山。但是,由于当时尚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一般百姓对国外的了解不多,也存在将日本海商和倭寇带来的物品都指认为“日本产”的可能。而日本海商或倭寇带来的物品中很可能一部分是直接来自东南亚一带贩运过来的。《普陀县志》附录一载:“徽州王直……亦从马六甲引大批葡萄牙和日本海商到双屿港。”就说明了来舟山的一部分日本海商曾涉足东南亚一带。

三、舟山引种番薯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

舟山引种番薯的独特历史条件,前文已述其详。舟山引种番薯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也是非常有利的。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番薯这种作物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年时间里,由美洲传入欧洲再传入亚洲,传到舟山,首先在于它本身是一种适宜性非常强的作物。番薯是多年生草本旋花科作物,喜温暖多光,耐旱、耐碱、耐贫瘠。以舟山话讲,是很“贱”的物种,“虽陡绝高崖,皆可栽种,止宜去草,不必用肥”(见光绪《宣平县志》卷十七)。番薯最适宜的种植环境是肥沃而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舟山的海岛丘陵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水资源比较贫乏。历史上,水利设施差,旱地多于水田。在广大的低丘、缓坡地带,土壤以红壤土类黄红壤亚类黄泥土土属的土种分布最广。这属的土种有黄泥土、黄泥砂土、黄泥砾土三种,透气透水性能良好,肥力中等偏上,土层深厚,加上海岛光照、热量条件好,是番薯的最佳生长环境。

其次,番薯是一种单产高,营养丰富的作物。海岛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舟山历史上粮食不能自给。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说:“田之近山者多旱干,近海者多斥卤,粳与糯咸不宜焉。则平土能有几何?故岁得上熟仅可供州民数月之食,全籍浙右客艘之米济焉。”缺粮使得舟山人更迫切地需要耐旱、高产的旱地粮食作物品种。偶得番薯,即予引种。

其三,1386年舟山实行“海禁”,次年昌国县废。县属的安期、金塘、蓬莱3乡撤销,仅留有富都乡(俗称昌国乡)。在此后的200年中,“海禁”渐有松弛,才有大陆各地的各种灾民逃难至舟山,在一些岛屿上定居下来。但是由于新定居者不仅也是非法居民,而且多为逃荒而来,生产、生活资料都比较缺乏,加上交通不便,获得上述物资的能力弱、渠道少。俗话说:穷则思变,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舟山的居民较其他地方的人更敢于接受外来物种,私下种植。

四、舟山引种番薯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舟山是全国引种番薯的最早地区之一。但是,番薯为什么没有从舟山流向全国,甚至没有产生区域性的引种呢?这也是由舟山的独特自然和社会环境决定的。

1. 舟山地处海岛,在小农经济时代,对外交往不便,不利于货物的流动。特别是倭寇的骚扰和朝廷的“海禁”政策,使舟山处于一种近乎封闭的状态,除抗倭军队外,舟山与大陆的交往一般是进多出少或只进不出,以免倭寇和为倭寇服务的汉奸窜入大陆。

2. 当时的居民生活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番薯引种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和推广,仅凭亲缘和地缘关系流传。前文已述其详。

3. 番薯自在舟山落户之日,就是一个非

法的“私生子”。因为番薯“种自日本来”或由日本海商(倭寇)从其他地方带来,番薯的引种与日本人是脱不了干系的。从当时朝廷的政策来看,这种引种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另一方面,在明代倭寇是沿海军民的最大敌人,人们对从日本来的东西在感情上也有一种抵触,更不敢大模大样地传播。因此,番薯的流传,大都在私下里进行。

相反,番薯由国人陈振龙带入福建以后,由福建巡抚金学曾下令推广,使之在省内迅速繁衍,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自然,传入者陈振龙家族也名声大振,成为受人尊敬的望族。这个条件使福建番薯此后通过各种官方、半官方和民间途径向浙江、山东、河南等地传播时畅通无阻,带来全国范围的种植。

五、结束语

在我国农业史上,番薯的引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许多山区、丘陵和干旱地区人民的裹腹问题带来了福音,使这些地区第一次有了比较充裕的粮食。然而,能否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发和引种口味好、色泽好、薯形好的番薯品种,开发番薯精加工食品,挖掘番薯文化和薯品新吃好,让番薯为改善舟山人生活,培育舟山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发挥一点作用呢?○ 责任编辑:邬永昌

(上接第44页)处恭公、处易公、处朴公、处廉公、处休公”兄弟六人端庄而坐。另有“盐官堂”一室,专供处易公像,两旁对联曰:“周食翁山延至德,宋开六桂永联芳”。

宋、元、明、清四朝,“六桂”后裔多散居闽、越、吴三地,其间有至东南亚发展者,然其源却在闽。今翁氏后裔新加坡书家江学珠书曰:“翁山之麓浙水之东,远及星马世衍宗风。”入闽翁氏之祖,名轩,仕唐,官朝请大夫,后徙闽莆田而居。乾度系轩六世孙,五代时为郎中,定居洛阳。北宋战事平息后,翁乾度偕第六子处休居莆田,寿终于此,葬于县之西南黄峰山,钦赐祭葬,勒石为碑,敕封《六桂坊》共四十八个。碑上刻一诗曰:“落地三朝语不通,生枝是姓公羽翁。诸子传流分六姓,兄南弟北各西东。枝分南北东西省,六姓原来是一

宗。但愿儿孙知同族,婚姻嫁娶无乱纲。”

展茅翁家岙翁氏系闽“六桂”后裔,故堂号称之“六桂堂”。清代名臣常熟翁氏翁叔元、翁心存、翁同和、翁同书、翁同爵和翁方纲为“六桂”后裔,与展茅翁氏同祖。展茅翁氏先居闽莆田,其先祖南宋时入仕浙江,居余姚,明时至慈溪,清初徙舟山普陀展茅而居。《解元》匾,系为清乾隆甲午科浙江乡试第一名翁元圻所立。翁元圻,浙江余姚人,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二甲十六名进士出身。乡试第一称解元,殿试中式三甲以上为进士,进士一甲一名为状元。翁元圻初为解元,后中进士,选官太常寺少卿。按展茅素有“教授之家”之称的“鲁园”《翁惠仁房谱》所附“翁氏宗族排行”,翁元圻当为入闽翁莆田支派五十九代孙。○ 责任编辑:邬永昌

编者按：沈家门水寨的遗址到底在哪里？今无定论，近有留正铨先生提出半升洞说，引起了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现将留先生发表在 1998 年 7 月 25 日《舟山乡音报》的《沈家门水寨考证》（略有删节）一文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沈 家 门

水 寨 考 证

□留正铨/文

沈家门港口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时期。从明朝初迄至清初，在长达 276 年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年代中，沈家门港处于海防最前线。据明《国朝典汇》载，自洪武十六年（公元 1383 年）倭寇犯浙东，明建文三年七月倭寇又犯浙东，明永历四年正月倭寇大掠居民，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 年）颁旨建立沈家门水寨，驻水师防守。据明《日本犯华录》载：“倭寇东北多至沈家门乌沙门分船，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国、犯台州。”沈家门水寨成为扼制倭寇进犯的前哨基地。

关于沈家门水寨的地理形势，据明《方輿记要》卷九二记载：“沈家门水寨在舟山所东八十里，系水操之地，番船去来皆泊于此。”水寨南临乌沙门水道，东控莲花洋、洛迦门水道，西接旗头洋，形势险要。据清《重修马鸣隍庙功德碑》称为“半升洞水寨”，又考证 1900 年版英国海图，半升洞在沈家门东端，有美女礁屏障，中间有一宽 20 余米水道，舟船可出入潜泊。据上述资料可确定沈家门水寨在黄沙湾、半升洞、小潭里坑一带，即现在东港刺棚山至荷外一带长约两公里的水域内。

至于沈家门水寨的规模和军事设施，可查证的有明弘治九年（1496 年）浙江省副使曹时中二首《临沈家门水寨》七律诗。

（一）

才微身老一书生，水寨春深坐训兵。
山到极边看有色，潮回大海听无声。
分屯里堡三军肃，斗槛云旗五色轻。
击楫中流思共济，敢于生死负皇明。

（二）

扬旗秉钺上滕艘，帆挂鲸波破晓风。
山势极临昌国迥，潮声犹带石门雄。
三军鼓锐唯闻令，诸将同心拟奏功。
幸遇远人宾服久，不烦天子愿留东。

诗中两处提到“三军”，据《明史》记载有水师、陆师和巡检司。明朝兵部定制：“浙东水师三大枝，沈家门水寨水师先隶属浙直总兵府水兵中游左哨设把总一员。”又据清光绪《定海厅志》载：“三十三年分二哨，观临沈家门（观临把总），后隶宁绍道参将水兵正游左哨，设把总一员。”据《明令典》记载：“浙江总兵驻定海（现镇海）参将驻舟山、宁绍参将驾兵船直出沈家门外洋。”引证明代《倭变事略》记载：“嘉靖三十一年二月把总张四维兵船出哨遇贼、张力战，吹贼数十，舟山之役，张功居首。”查确沈家门水寨建制水兵中游左哨，把总一员，兵船设哨官。至于沈家门水寨陆师，即岸上驻兵，据《浙江古今地名词典》1991 年版称：“沈家门寨倭寇自海道犯此，官兵击退之，移宝陀巡检司驻此，有汛兵防守。”

例照《明史·兵三》巡检司陆师汛兵千员。据考证汛兵驻邻陀山南麓，大校场地名沿用至今。

水寨的岸炮坐于刺棚山，据《定海县志》记载：“舟山旧设炮台三所，东沈家门、西岑港、南道头，各建营房十三间，安设红毛炮八座，配兵各五十员。”据查沈家门炮位面对乌沙门、洛迦门、黄大洋，控制倭寇进犯主要水道，炮座遗迹在解放初期福建水产公司驻浙分公司拆除半升洞半山石砌照墙，即为炮位掩体，原解放军半山养猪房即为炮兵营房，1951 年该处曾挖出大炮三尊。

关于水寨兵船舰只,据《明史兵四》记载:“水师海舟以舟山乌槽船为首,该船耐风涛,且御火。浙之十装标号、软风、苍山船亦利追逐。”据考证乌槽船本地人叫“绿眉毛明楼船”。三帆,载重百余吨,可容兵员百人,苍山船亦叶扮商船,二帆,轻快如箭。

明代兵部定制,左中右三哨,各置兵船12艘,设哨官一员率船出哨作战。

关于战船的遗迹,据说1956年荷外里坑建造荷外水池工程,开挖土方至6米深处发现有尖头木质古船一艘,长约15米,局部已腐朽,中舱有铁弹一堆,当地人说是古代兵船云云。

二

以沈家门水寨为基地,参与抗倭战斗可资查证的有大小战役37次,其中最激烈的是明嘉靖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两次莲花洋战役,我方出动水寨及宁绍参将出哨兵船百余艘,陆师两个镇军力,倭方来犯兵船两百余艘,我方死伤七百余人,斩获倭寇三百余级,史书形容:“硝烟弥漫,海水为赤。”

这两次战役据《明史》记载:“参将俞大猷督兵剿普陀山倭寇,我军半登,贼突乘之,杀武举人火斌等三百余人。”又据清光绪《定海厅志》载:“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长涂沈家门设伏抗击,至是贼果南遁,官兵与遇于普陀洛迦山之莲花洋,连战皆捷。”第二次战役据清《定海厅志》记载:“嘉靖三十三年贼据普陀山,参将攻之不克。”据明《倭变事略》记载:“普陀山莲花洋一役,调宁绍参将汤克宽驰与参战,哨官黄猛奋勇杀散,戮六贼而死。”又据《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嘉靖三十三年三月,王抒督兵破寇于普陀诸山,乃遣参将俞大猷师锐兵出发,而汤克宽以巨舰继之,径趋倭砦,纵火焚其舍庐,斩首五十余级,生擒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无算。”

在这次战役中,沈家门水寨哨官马鸣英勇殉国。

在沈家门水寨指挥过战斗的抗倭名将总兵戚继光(据《定海厅志》记载,沈家门宫墩原有合祀戚继光的祠庙,后改为天后宫),御史胡宗宪,浙江都督侯继高,都督卢镗。坐寨训兵有浙

江副使曹时中,实际参战的将领有参将俞大猷,参将汤克宽,参将张四维等,为国捐躯有据可查的有武举人火斌,宁绍哨官黄猛,水寨哨官马鸣,以及清初水寨邱兰二哨官,后人均立祠纪念。

三

舟山市政府已决策在本届建设海岛旅游基地,积极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提供大旅游配套和服务,这是市委经过十年探索和实践,对海岛经济发展最符合市情的对策。目前海岛旅游事业已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按照构筑“旅游金三角”的思路,1984年最初提出旅游金三角的组合,是把舟山本岛东端的沈家门为一角,普陀山岛为一角,朱家尖为一角而构成“海岛旅游金三角”。但十余年来,人们在组合“旅游金三角”布局时,也许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山之一,朱家尖有自然景观之美,此二角均被批准为国家级名胜风景区,而沈家门却只放在配角地位,沈家门被冷落了,并在逐渐失去配角地位。

据此,建议利用沈家门“水寨”的人文景观旅游资源,营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快形成沈家门、朱家尖、桃花新的“旅游金三角”。通过沈家门水寨的开发,推动全社会办旅游,拓宽筹资渠道。

家住沈家门的市民说:“定海区竹山公园改成鸦片战争纪念公园、列为市政府实事项目,今年又把定海区海山公园列为市政府实事项目,资金有保障。沈家门青龙山公园也在市区,其东麓即抗倭战争古战场,也应该列为市政府实事项目。”○ 责任编辑:邬永昌



张苍水归隐处考



□何雷书/文

张苍水,名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宁波市区)人。他于弘光元年(1645)五月组织义军抗清。清康熙三年(1664)六月归隐,七月被俘,九月在杭州就义。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赐谥忠烈。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

关于张苍水归隐和被俘的地点,人们一直沿用了“南田悬岙”,并注明在象山县境内。其实张苍水被押送宁波时,作七律一首,标题是《甲辰七月十七日被执过定海关》,这定海关就是今之镇海。众所周知,象山至宁波有水陆通道,乘船过象山港就是宁波,是不可能绕道几十里去定海关的,因为象山在宁波西南,镇海是在宁波东北,这两地相距甚远。张苍水的这首诗,从根本上否定了象山“南田悬岙”一说。

张苍水归隐在那里呢?在舟山。因为浙东沿海只有舟山至宁波是必经定海关的,如果张苍水不是在舟山被俘,就不会有“被执过定海关”。而且,张苍水的《奇零草》也表明,他归隐于舟山。据康熙《定海县志》的记载:舟山在明洪武二十年废县治以后“置昌国乡,归定海(今镇海)县,为定海县的奇零籍。”张苍水的这集诗所以称《奇零草》是因为他归隐于舟山后所作。再从感情因素考虑,张苍水在舟山抗清十余年,正如他给赵廷臣的答书中所说:“十余年来,海上刍荛糗糒之供,楼橹舟航之费,敲骨吸髓,言之惨然。”更有一万八

编者按:300 余年来,史学家对民族英雄张苍水蒙难之地说法不一,有“南田说”,有“元山说“有”,有“朱家尖(乌沙悬山)说”,有“普陀洛迦山说”,也有“杭州西湖说”等等,向为一大疑案,至今难以定论。近几年来,何雷书先生对张苍水“散军”后归隐地点作了比较系统的考证。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张苍水研究,现将何先生发表在1998年1月10日《舟山乡音报》的《张苍水归隐处考》一文转载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千余军民在抗清中丧生。这些刻骨铭心的事,使他不忍离开舟山。

舟山有 1300 多个岛屿,哪是张苍水的隐居处呢?今年八月,某考察团经过实地考察,认定是舟山的悬山岛,说:“该岛大平岗系张苍水结茅隐居之地”,岗下有一口三百多年的古井,是当年张苍水隐居留下的遗迹。应该说,这古井的年龄,同张苍水归隐的时间是相当的。但是,在三百多年前,尤其是在 1649 年鲁王朱以海移驻舟山以后,舟山成了南明抗清的大本营,在舟山打了十余年的“拉锯战”。其后,清政府又以舟山“不可守”为由,两次强行内迁,在兵荒马乱之中,居民逃到偏远岛上去避难者不计其数。逃难者在栖身之地掘口井也是常有的,就说悬山岛本身的居民,在这三百多年中,其住地亦可能有变化。因此,这口古井很难断定是张苍水隐居的遗

迹。可见,从悬岙到悬山岛,悬来悬去,张苍水归隐处的问题还是“悬”着。

《奇零草》“序”和浙东的一些地方志记载着,张苍水的归隐处是舟山的洛迦山。

姜宸英为《奇零草》作序中,明白无误地写道:“此集是其甲辰以后,将解散部伍,归隐于洛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师,未尝受强藩节制。及九江遁还。渐有掣肘,始邑邑不乐。而其归隐于南海也,自制一棹,置寺中,实粮其中,俟粮且尽死。门有两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躍哀鸣。而间之至也,从后门入”。姜宸英是慈溪人,比苍水小八岁,七十岁中进士,做了二年官,就“以事下狱死”。根据他1699年4月作诗称:“后寺吾曾到,前踪未可期”。说明他写《奇零草》“序”是到实地作过调查的。调查的时间是在1671年以前,因为据《普陀山志》记载,1671年普陀山僧人全迁,寺院全毁,直至1699年后寺才重建竣工。这就是说:姜宸英的“后寺吾曾到”是指1671年前,他的调查是在张苍水就义后六七年内进行的。他的“序”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归隐于洛迦山”一说是比较可信的。

又据《明季南略》记载:“煌言后势孤力竭,与心腹十余人将至普陀洛迦祝发为僧,内一人欲降大清,遂私见浙江赵部院。”《仁和县志》又载:“赵公侦知之,先伏兵于普陀(山)。一日,煌言遣小舟买米,游击某即登舟叱缚二人,不肯言,随杀之。舟子惧,告其处,引兵夜至悬岙。煌言坐处置一剑,有警即欲自裁。是夜,闻芦苇飒飒有声,急呼从者起时,我兵已入室,不及避,遂就缚。”《鄞县志》载:“赵廷臣遣骑将徐元等诈为僧人服率健丁潜伏普陀山、朱家尖、芦花岙三路伺之,值煌言采者至,急击之……”,《定海厅志》亦有类似的记载,显然,清兵是根据侦查到的行踪,才伏兵于普陀山的,而且是在普陀山抓到买米的舟子才到悬岙去抓苍水的。如果张苍水隐民居在象山境内,清兵不可能伏兵于普陀山一带守伺,张苍水也绝对不会派人到百里之遥的普陀山买米。如果隐居在悬山岛,去

普陀山要经过虾峙、桃花、朱家尖等岛,航程达三十公里,而去象山只有十来公里,不可能舍近就远到普陀山买米。而洛迦离普陀山只有4.9公里,往来是比较方便的。

关于“悬岙”和洛迦山的问题。《仁和县志》载:“悬岙,海中小岛,在普陀(山)之东极,荒僻无民居”。照此说法,这悬岙是洛迦山,不是悬山岛。因为:第一,洛迦山在普陀山东南,与“普陀山之东极”相吻合,而悬山岛在普陀山之西南;第二,洛迦山面积只有0.36平方千米,确是“海中小岛”,而悬山岛面积是7.51平方千米,这在舟山还不算是小岛;第三,悬山岛从唐宋以来一直有人居住而洛迦山除几个僧人外,确实是“无民居”的。

洛迦山称“悬岙”,同普陀山有关。普陀山原名梅岑山,在唐代成了佛教道场之后,人们根据梵文“补怛洛迦”一说,把梅岑山改为“普陀洛迦”把洛迦山排除在“普陀洛迦”之外,没了名,加上舟山在明洪武以后废县治二百年,地名不规范,对洛迦山这样的小岛,其名更乱,“悬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明崇祯年间,张岱的《海志》载:“小洛迦,莲花洋南,有僧人守山五十余年,粮尽举火,常住令船送之”。但未能引起人们注意。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建定海县以后,才逐渐把普陀山与洛迦山分开称呼,悬岙的称谓也随之消失。

张苍水归隐于洛迦山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他在1664年3月,曾与阮春雷联手,集海船百余艘。在浙东沿海与清军抗争,后被清将吴万福击败至大洋山,阮春雷去泉州。苍水既不忍离开舟山,又要避开清军的追击,洛迦山是顺道,又比较安全。再说,舟山经过两次大内迁,已是人烟稀少,唯独普陀山因为是佛教道场,香火依旧,居洛迦山有普陀山为依托,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加上张苍水以前数次到普陀山,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一切自然是他归隐的有利条件。○

责任编辑:邬永昌

明代多国贸易港



——葡占双屿港考略

□毛德传/文

双屿在历史上曾驰名世界。明嘉靖五年——二十七年(1526—1548),它是我国沿海的国际贸易转口码头,交通航运亚、欧、非若干国家事实上的自由港。外国文献也有称它为 LIAMPO(宁波)的。葡萄牙人平托称双屿是“葡萄牙在东方最富庶最繁华的殖民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则誉双屿为“十六世纪的上海”。

(一)

据明朝曾出使日本的郑舜功著《日本一鉴》及葡萄牙人信件记述,开始是福建人邓獠于嘉靖五年(1526)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到嘉靖十九年(1540),有海商许栋四兄弟“勾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嘉靖二十四年(1545),有许氏集团的合伙人安徽人王直往日本考察洽谈贸易,吸引日本人来市双屿。经此三波,双屿多国贸易迅速兴旺。

葡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公然占踞双屿,建立了“双屿港市政厅”,驻屯大批殖民军。短短五、六年里,“佛郎机诸番夷”在双屿建起了馆舍一千余所,还有耶稣教堂、医院及其他永久性设施。已有三千外国人常住,其中葡萄牙人一千二百名。中国人从各地涌来“泊客万余人”。无数的船舰靠泊装卸吞吐,使昔日荒凉的悬海双屿入夜灯火通明,人群鼎沸。中外交易的商货品种很多,中国及各国商贩获利润可观。这使浙海双屿成了十六世纪

中期远东一大航海外贸中心,不愧是“十六世纪的上海”。

双屿海上贸易促进了中外交流,使当时中国国内市场局部与世界接轨,有助于活跃我城乡经济。这是主要的基本的。但同时,外国人中也有一小伙野心家肆行侵掠作海盗抢劫烧杀,使我沿海百姓受难。当明中枢禁海派权要人物一度得势时,浙江巡抚兼提督福建海防军务大臣朱纨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指挥明军突然攻打双屿,“大胜之”。明朝军队“入(双屿)港,毁贼所建天妃宫(按指耶稣教堂)及营房、战舰”。为防止葡萄牙、日本诸番夷卷土重来,再屯双屿,五月,朱纨还亲督官兵筑塞双屿出入航道。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国际贸易码头,毁于一旦(对双屿历史不是本文重点,简要介绍,不再展开)。葡萄牙退出双屿。九年后,于嘉靖三十六年(1553)始占我珠江口外香山半岛几小村——即今澳门。

(二)

那末,明时葡萄牙所屯占的“双屿港市”,它系今何处?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近二十年间,见中外学术界对“双屿”地理位置,有三种判断:

一、世界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标定,是在象山港口、紧贴象山半岛东北端钱仓陆岸的两个岛屿(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图 76、77 明浙江幅,中国地图学社出版)。

我曾几次航经谭教授所标处,经观测有

疑,又商请象山县领导部门查明:它是东屿岛(面积 0.0011 平方公里,海拔最高点 26.8 米)和西屿岛(面积 0.40 平方公里,海拔最高点 116.2 米),属宁波市象山县大徐区东湾乡辖。

二、东北师大教授、明清史学者李洵认为,它在福建。(见《明清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李洵《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浙江(包括舟山)、上海、北京若干研究港口及经济战略的同志认定,是在浙东舟山群岛西南部今普陀区境内。又有两种看法:

甲:是大佛渡岛和小(野)佛渡岛;

乙:是今六横岛西北部龙山一带,包括东西浪咀,蟑螂山几点内。

本人研判认为,“十六世纪的海上”就是今天的六横岛;我在《航海》、《中国港口》及台湾《宁波同乡》月刊发表介绍双屿文中,都肯定此点。

六横岛位北纬 29°39'—29°55'、东经 122°02'—122°12'之间,今面积 92.92 平方公里(香港本岛为 75.60 平方公里)为舟山群岛第三大岛(仅次于舟山本岛及岱山岛)。它西锁象山港、东濒国境、南连闽台、北屏沪杭甬,位置冲要。港湾水深、不冻、少淤,避风安全,六横岛与佛渡岛间航道就叫双屿港。附近的虾峙门航道今为万国巨轮出入舟山、宁波北仑港必经。在明代,它是上庄(上六横)、下庄(下六横)两岛屿。

(三)

本人 1949 年随野战军渡海作战解放六虾桃,曾接管六横组建下庄乡人民政府,作首任乡长止 1951 年 8 月。此前,就听舟山坚持干部讲起舟山民谚有:“金塘山包田、六横田包山”、“穷桃花、富六横,讨饭虾峙隔中央”,反映了六横人民世代与大自然斗争,筑堤围淤抵御涨潮侵蚀,并不断向外扩延,变沧海为桑田。几代艰辛开发富有成果,所产粮食,自给有余,可外运。

再,全国不少岛屿可建塘拦海相连。如朱家尖与顺母涂岛(今舟山(普陀山)机场就建在五十年代的大海上)、马目与舟山本岛、两头洞与岱山岛……,现都相连。厦门、玉环,在解放后筑堤,今都与闽、浙大陆相连。

研判“双屿”即今六横岛,有以下论据:

一、中外史籍有载。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称“舟山双屿港”是“南洋之表,

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明永乐朝郑和(三宝太监)下西洋,其舰队曾通过双屿港驶东南亚。日本藤田丰八在其《葡萄牙占据澳门考》中写着,双屿“在宁波府郭巨的对面,六横山下的佛能岛和皮克岛(译音)”。

二、双屿之战明军统帅朱纨于攻克双屿后曾率海道副使魏一恭等人亲临双屿视察形势部署海防,他上奏朝廷的《双屿填港工完事疏》(明经世文编 205 卷)写道:“臣自郭巨所亲渡大海,入双屿港,登陆洪山,督同魏一恭等达观形势”、“访其形势,东西两山对峙,南北俱有水口相连,并有小山如门障屏,中间开阔约二十余里,藏风聚气,巢穴颇宽”。奏中又写到“双屿既破,臣五月十七日渡海达观,入港登山,凡蹬三岭,直见东洋中有宽平古路四十余里,寸草不生,贼徒占据之久,人货往来之多,不言可见。”

我认为,朱纨率诸将登上六横山(即陆洪山,陆奥山);两山(岛)对峙,是上庄和下庄两岛;寸草不生,因葡、日诸番夷搞码头、仓库、房产、不种庄稼。

三、六横岛地形,颇似朝鲜半岛,中间亦有蜂腰状部位;不信,可看六横地图。这有助于探索六横历史变迁沧桑轨迹。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知县朱绪曾奉檄办理英军撤离收回舟山善后事务,曾纵览山川形胜。他写道:“今六横山周围百里,生聚数千家,分上、下两庄,中隔一港”(见朱绪曾《昌国典咏》),朱并赋《七律·黄公山(即六横山,有传晋代有侠士黄公毙白虎于该岛)》:

海闸门开海贩多,
礁潭石柱望嵯峨;
黄公酒熟扶桑晓,
谁补图经细索摩。

这反映了道光末期六横上、下庄两屿渔农业已有相当规模。礁潭解放初是下庄乡二十一保、石柱是上庄乡第五保。

双屿(上、下庄)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筑堤后才联成一岛。在此前后,又向外伸展建海塘,捍卤畜淡围淤,使上庄的蟑螂山岛、积峙岛,下庄的大夹屯岛、沙头岛和六横岛联为一岛,使六横陆域面积增大。

今六横张家蛟、岑山,即道光末期两岛汇合处,也即明朱纨的“有水口相通”,清朱绪曾的“中隔一港”的那条(我戏称为)“巴拿马运河”。

乌石塘小志

□ 王建富文

舟山群岛有四处乌石砾滩,有二处在朱家尖,一处桃花岛,一处舟山下塘头,其中最著名的数朱家尖樟州湾内的乌石塘。

乌石塘位于朱家尖岛东岸香莲村,由乌黑发亮的鹅卵石堆积成一条长 500 米,宽 60 米,高 5 米天然海堤。堤上石子大者如鹅卵,小者如珠玑,乌黑发亮,光洁可爱。在潮水一进一退的推动下,乌石子相互撞击,发出清灵悦耳的响声,雅称“乌塘潮音”。据说,有经验的老渔民可从潮声的细微差别中判断出海上风浪的大小,以及天气的变化趋势。乌石塘前,樟州湾碧湾荡漾,帆影点点,海鸥轻轻盘旋在浪尖,海娃跳跃拾贝在礁间,风光旖旎,韵味独特,已成为普陀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朱家尖景区的主景之一。

乌石塘本是樟州湾南侧海岸出露的辉长岩和安山岩被海浪侵蚀下的砾石,经风暴潮搬运到海湾内堆积而成。但民间相传,乌石塘是北海龙王三太子的化身。据说,三太子自幼一身乌黑,生相难看,因闯祸逃到东海避难,被观音菩萨收留后派往朱家尖守护香莲岙。乌龙感谢菩萨的知遇之恩,化为海塘长卧岙口,片片龙鳞也变成了乌石子,永生永世捍海御卤。清末

文人朱绪曾诗曰:

塔飞僧化岂荒唐,
风雨俄惊涌石塘。
无数乌龙飞不去,
免教此地变沧桑。



责任编辑:成定国

有个大误区。即国内外不少研究者以为朱纨督军筑塞的是双屿港。双屿港长 7.6 公里,宽 1.4-2 公里,水深 40-50 米,这即在今天耗上亿美元,多国技术,也不一定能填塞。其实,朱纨当年填塞的是上庄、下庄双屿间那“巴拿马运河”。只要在浅、窄处打些排桩,沉几艘载石旧船(朱纨奏本称“聚椿采石填塞”),就封死了该港道。

四、有古图二幅。茅元仪《武备志》卷 240 郑和航海图第 6 图关于双屿门明确标出,它与郭巨所隔海相望。明兵部侍郎、南直隶总督胡宗宪编审的《筹海图编》卷一浙江十一——32 图所绘颇详。郭巨千户所、梅山对面海峡水道是“双屿港”、岛是“陆奥山”(六横山)。

综上所述可见。

一、谭其骧先生所认定双屿显然错的。如此小岛怎可容千艘船舰,万余中外人士;淡水、烧柴无法供给;更不利于防范来自大陆敌军攻击。前,我曾去函谭先生求教,旋接“中国

历史地理研究所”复信称:“你给谭其骧先生的信已经收到。你对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浙江幅“双屿”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将根据你的意见予以改正。”

二、东北师大李洵教授的判断更是搞错了。

三、大佛渡岛(今面积为 7.08 平方公里),小佛渡或称野佛渡岛(面积 0.23 平方公里)。龙山仅为解放初上庄的四分之一,土地改革后(本人亲历参加六横土改运动)划分原上庄乡为龙山、洋山等四个乡。况且,今龙山大片平原在明代尚是怒海汪洋(清道光朝后,樟螂山岛才与六横建塘相连),显然不是葡萄牙殖民地“双屿港市”。

四百多年前远东一大航海外贸码头——十六世纪的上海——明朝的“双屿”,就是今浙江省舟山市的六横岛,已可无疑。以上浅见,请批评教正。○ 责任编辑:邬永昌

安期生醉墨洒桃花

王建富/文



桃花岛座落在我市普陀区南部，从地图上看，就像一个巨大的海蜃自茫茫东海游入舟山群岛。该岛自然景色独特，以面积仅 41 平方公里的小岛，拥有海拔 539.7 米的群

岛第一高峰。岛上山势陡峻，林木青翠，山顶白云缭绕，飘渺若虚幻之境；沿岸碧海金沙，滩美礁奇，树木花卉繁多，被誉为“海上仙山”和“海岛植物园”，列入省重点风景名胜区行列。

桃花岛山美、海美，更有将自然现象与人物典故结合得很完美的传说。桃花岛名的来历传说就是其中之一。相传，桃花岛在古代叫白云山，因为它终年白云绕山的景象给周围渔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以景名岛。后来，一个故事悄悄传开：秦代有一个方士叫安期生，他几经寻觅才来到白云山，在一个石洞中修道炼丹，乐不思返。不料，至春夏之交，岛周围墨鱼旺发，人在岸边也伸手可得，吸引了各地渔民齐集捕捞。一时人声鼎沸，干扰了安期生的修炼，他不得已，只能择地迁居。当安期生行至海边埠头之时，因留恋美景和旧居，饮酒而醉，并取出笔砚香墨欲咏诗抒

怀。正要挥毫，船老大却来催行，安期生不得不将满砚浓墨泼于岩石之上。浓墨遇石竟成朵朵桃花，经久不褪。此事一传十，十传百，迅速流传，于是将白云山改称为桃花山。这段传说在宋代地方志中被记录了下来，以后各代沿袭不变。渐渐地，当年安期生炼丹之处被称作“炼丹洞”，洞上建立了圣岩寺。从科学的角度看，桃花岛山石中的桃花纹是一种地质现象。桃花岛的主体由多节理、多裂隙的花岗岩构成，地表水从岩石裂缝中下渗，日久，铁锰等黑色矿物质沉淀在以钾长石为主要成分的浅红色花岗岩上，就形成了花朵或树枝状的图案。其实，桃花、普陀山、朱家尖的花岗岩的产状大体相同，只不过由于人文环境不同，在各地被赋予不同的想像。在普陀山这种岩石被称作“紫竹石”。

八十年代，香港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在他的作品《射雕英雄传》中杜撰了一个虚幻的桃花岛。巧合的是，该岛竟与真实的桃花岛在位置和自然风光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以至金庸先生本人也对此惊叹不已，慨然题词：碧海金沙——桃花岛。○ 责任编辑：谢永根

八十年代，香港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在他的作品《射雕英雄传》中杜撰了一个虚幻的桃花岛。巧合的是，该岛竟与真实的桃花岛在位置和自然风光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以至金庸先生本人也对此惊叹不已，慨然题词：碧海金沙——桃花岛。○ 责任编辑：谢永根

在登步岛烈士陵园上

郑 朝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我们八名老兵重新踏上登步岛。

1949 年 11 月,为了使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瓯无缺,这里发生了一场鏖战。在三天的战斗中,敌我力量发生对我不利的变化,我军果断主动撤离该岛。据说,在世界战史上,登了陆,战而不利,又能成功地撤出来的,登步岛之战是一个孤例!

年轻的登步乡乡长,领我们到烈士陵园。陵园在一个小山坡上,拾级而上,两旁是新植的松柏,杜鹃花和别的闲花点缀在绿色之中。园陵是按照民间工匠的审美观新造的,带有浓浓的乡土气,使人感到亲切!

我们献上花圈,静静地默哀!

那次战斗双方伤亡很大,在这仅仅十五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歼敌四千人,我军伤亡也逾千。这里是我军英魂的栖息地。我们噙着眼泪轻轻地对亡灵说:我们是来迟了!但老战友终于来看望你们了,安息吧!

当我们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这里的风景很美,青山绿水,视野开阔,但是墓道两边的一副楹联却惊心动魄:

流血流水岩色染全岛;

炮打炮台山声惊后人。

我的心头为之一震,赞道:“好楹联!好楹联!”

乡长告诉我们,这副楹联是乡里的一位民政干部撰的,他没有进过学校。他又指着附近的两座山峰说:这就是流水岩!那就是炮台山!”

啊,流水岩、炮台山,这两座熟悉的山名,立即打开了我们的记忆之闸……

战史中这样记载道:“我部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攻占了制高点,将敌主力打乱,俘敌 600 余人,控制了该岛四分之三的地区。但由于兵力薄弱……敌援军在鸡冠礁登陆后,即在空中、海上火力支援下,向流水岩等我军阵

地发动猛烈进攻。至此,空前激烈、残酷的争夺战开始。我在岛部队,在无水喝、无饭吃、无工事依托、无援军的情况下不断打退敌人的轮番攻击,每一座山头都反复争夺,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枪托、洋锹、石头,在我 183 团 1 营的阵地前,敌人就遗尸 800 多具,可三营也只剩下 30 多人了。”“守卫在炮台山的 182 团 7 连,在连续打退敌一个团五次进攻后,遭到较大伤亡,撤出了制高点炮台山”。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对我十分不利,最后我部指挥员果断地决定撤离该岛。

我们八名老兵,抚今思昔,触景生情,怎能不肠回气荡呢?!我想那位民政干部也一定熟悉登步岛之战,否则何以能用十八个字概括惊天动地的战斗!

但现在流水岩、炮台山是这样优美宁静地屹立在眼前,白云在上空飘动,山上一片葱郁,两山脚下有几间草房,旁边修竹成林。一座大水库,波光粼粼,映照着两座山的倒映。俨然是一幅蓝铁笔下的“仿古山水”。只是水库旁边还站着青年在垂钓,其中还有一对情侣,衣着艳丽,透露出几分现代情调。……这里一片和平、安谧的景象,仿佛战争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也许这里根本没有发生过战争!

然而,乡长告诉我们,岛民没有忘记那次战斗。许多战斗故事在民间流传,流水岩脚有一层暗红色的淤泥,岛民说那是我们战士的血染成的。烈士陵园造成后,这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他们还准备在这里建立陈列室。乡长还说:多年以来我们就期盼着 61 师的老战友来凭吊战友的英灵,今天你们八位战友来了,我们非常非常高兴!我们真心地欢迎你们老战友年年来登步岛扫墓!乡长的话是很烫人的,我们要把这些话告诉 61 师在登步岛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战友们!

为国捐躯的英灵是不应被忘却的!○

责任编辑 邬永昌

漫
步

半边街

□ 缪友忠/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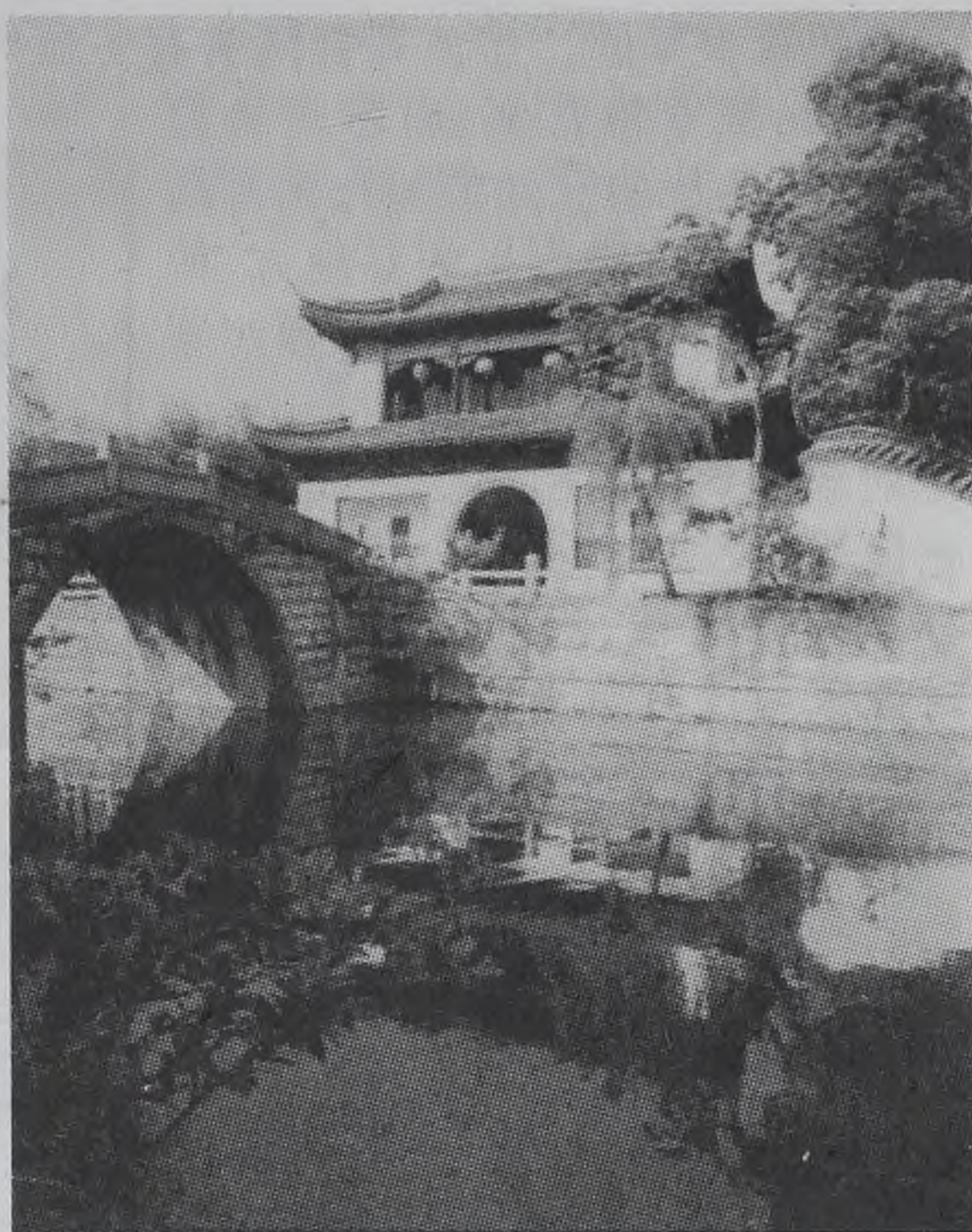
提起半边街,年近 50 岁以上的老沈家门人都知道,原泗湾庙右首大井潭旁有一排十余间低矮的木结构旧房,低屋的前面是一条宽五六米的街路,这就称半边街。

听老一辈说,半边街的低屋是泗湾村一位叫王和尚的秀才把西横塘茶坊拆过来建造的。据说,旧社会凡住半边街的都是些社会低层的成员。有脚板、小贩、挑豆腐担、卖烧饼、开羊肉粥店的,甚至有设赌摊的,形形色色。

今年 82 岁的何大娘对我讲,在她六、七岁时,半边街住着一位姓姚的男人,小孩子喊他为“阿姚伯”。该男人专做介绍“对象”的生意,有的女人不堪忍受夫家经济的拮据,企图另找男人的,就通过阿姚伯再“找”对象。阿姚伯就象出嫁女儿一样把该女人“嫁”出去,赚一笔“介绍费”。

据我的祖辈讲,120 多年前,泗湾村来了三位俞姓兄弟,二位住在泗湾,另一位住在半边街后面戚家湾。当时住在戚家湾的俞氏兄弟到泗湾里去,走的是泗湾庙后面的山路,日子一久,人们称该路为“俞家路”。据说,俞氏兄弟住到戚家湾时,半边街还没有房子,但街名已经有了。为什么呢?原来泗湾庙赶“市日”时,有些渔民把捕上来的鱼货挑到泗湾庙附近来设摊,也有些渔民,为讨吉利,挑着猪、羊等来供泗湾庙菩萨,所以形成了半边街。

另据徐小毛老人讲述,半边街屋后面山腰是他老家宅基。他家是一幢畚斗屋,地基是乱石筑起来的,这屋是他爷爷手里造的。造屋时,当时半边街的房屋还没有,他家造房用的所有建筑材料都是他爷爷用小船驳过来的。综合上述几位老人的讲述,得出了一个结论:



也就说,大约 120 年前,半边街还没有房子,但已有街名。至于为何有此街名,只能作如下推断:半边街东首是浅滩,西首是徐姓的畚斗屋住宅,石堪下渔民或小贩们摆摊叫卖。久而久之有了街名。

至于在半边街建造街屋,也已经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据我祖母在世时讲:她 18 岁嫁到半边街,此时已有房屋。我的祖母属牛今年 98 岁。据此推算,在半边街建造房屋至少有 80 年以上,但在 120 年以下。

1995 年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戚家湾路段建造商品住宅楼。半边街的旧房也被列入拆迁范围。经过二年的建造,商品住宅楼已经竣工。底层的几间仍是营业网点。而网点的对面是一堵海中洲饭店的围墙,没有店面屋。按照商业营销习惯,一般街面,两边都有店家,而现在原半边街旧址的几间营业网点对面没有店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半边街。随着商业中心的外移,半边街已成了“冷街”,不能形成规模。所以该住宅楼底层的营业网点很难卖出。

我不但生在半边街,长在半边街,而且在半边街开店也有 18 年了,对半边街情有独钟。旧屋拆迁安置在新屋后,我老店新开。为了不致于使世人遗忘半边街,我特意把小店起名为“半边街烟酒店”。○

责任编辑:向联谊

清朝咸丰年间，宁波鄞县湾头有一位姓刘的农民，因家境贫寒，时刻想外出谋生。一天他从朋友处得知舟山海岛物产富饶，是落脚谋生的好地方，便毅然挑起二只箩筐，从宁波来到沈家门。

刘老汉到沈家门后，日夜劳作，省吃俭用，没几年积了一些钱财，自己办了一家鱼栈，起名“顺昌鱼行”。那时沈家门没有自来水，居民饮用全是河水和井水，到旱天，饮用水困难，于是刘老汉便萌发了造一只大井潭来解决沈家门居民饮水困难的愿望。但因种种原因，直到刘老汉去世时还没有实现造井的愿望。

到了他儿子时代，家境也有好转。其儿刘云茂想到其父生前曾有造水井的心愿，他想，造井一可了却先父的心愿，二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为此刘云茂向社会募捐了一些资金，刘家自己也出了一部分钱，把井建在泗湾庙旁边。造井的时间为 1924 年。

挖井时，动员了几百民工挑泥块。据我的一个邻居介绍，他的曾祖父当时是挖井挑泥块的包头。掘出来的有船板，还有碗、缸等生活用具。挑上来的泥块顺便筑了一条路，即原大井潭到新街去的那段老路。据现年 82 岁的何老大介绍，那时泗湾人、戚家湾人到街里去要过宫下或转陈家塘，自从挖井后，筑了路，到街里去方便多了。

为了纪念挖井民工的勤劳，云茂先生将

大井潭起名为《神功池》。

大井潭经历了 75 年的风风雨雨，它像一位历史老人，目睹过日本鬼子对沈家门老百姓的践踏。

1939 年 6 月 23 日，日本侵略军进驻沈家门。为了保证供水，在泗湾庙设立了岗亭，并派兵霸占大井潭，不让沈家门居民挑水。那年有一对父女，因不知道鬼子已霸占大井潭，来到井旁洗衣服。鬼子见那姑娘漂亮，竟将姑娘的衣裤剥光，用刺刀拨弄姑娘。但鬼子还不满足……

这件事激怒了一位老太。该老太已有 50 多岁。老人家也挑了一担水桶，装着到大井潭去挑水的样子上前去解围。日军欺她年迈，动手就打老太，料不到老太是早年展茅大闹乾高“石匠三”的女儿。“石匠三”是舟山有名的武师，老太从小跟父习武，练得一身本领，几下就把鬼子制服，附近一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神功池一度时间曾给沈家门的居民带来过便利，解决了当时居民的饮水困难。现在居民的饮水条件好了，都用上了自来水。但碰到大旱时，神功池仍为居民提供用水，如洗涤衣物等。

由于近年来戚家湾建筑物增多，下水道不科学，使神功池水源破坏。我相信，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神功池的水质也会得到改变。○

责任编辑：秦永禄

漫话沈家门神功池

□ 缪友忠一文

书 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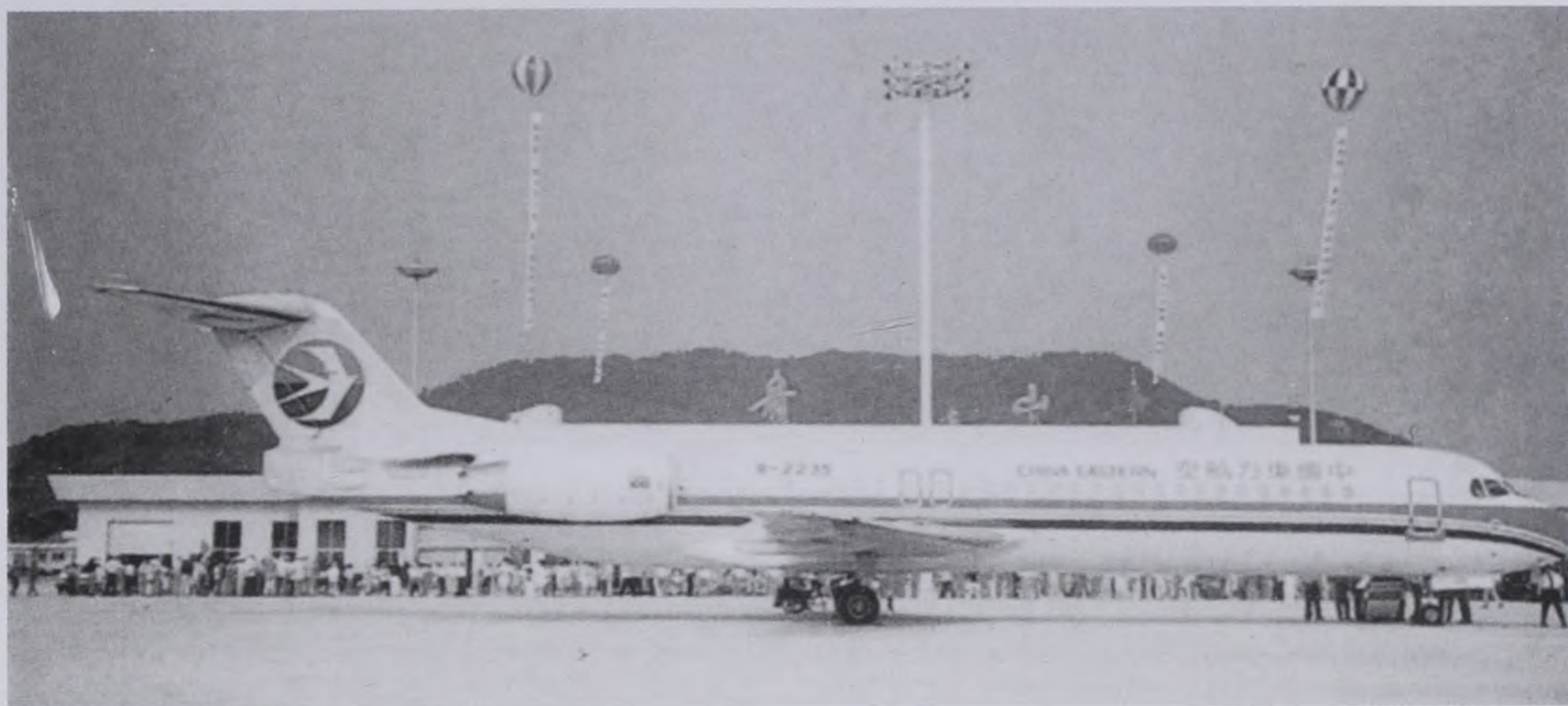
《普陀大事记》出版

列入浙江省大事记丛书之十四的《普陀大事记》一书最近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普陀区史志办公室负责编写。曹德兴同志任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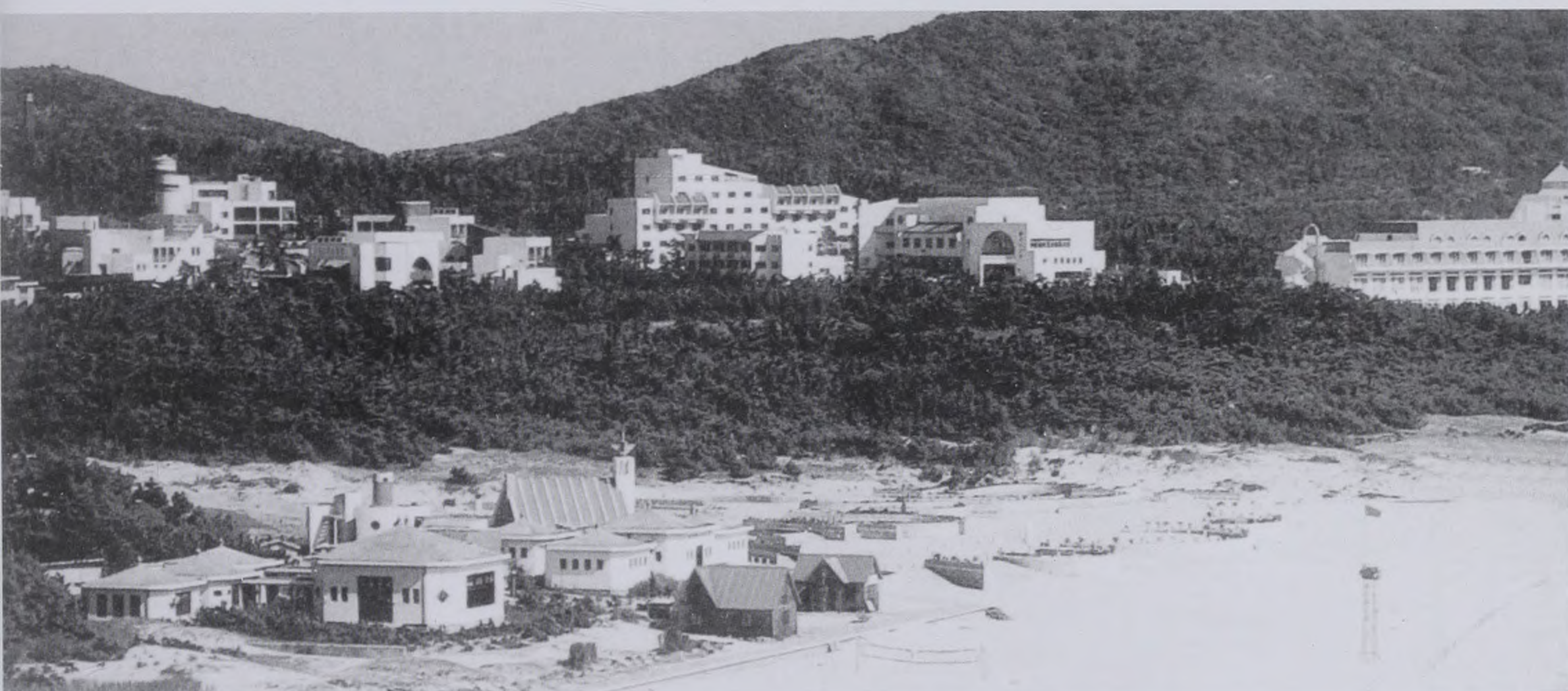
本书以普陀区(县)委、区(县)政府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主线，约略地记述自 1950 年 5 月至 1995 年 12 月近 46 年中，党领导全区(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和发生在普陀境内的大事、要事，不失为一本集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史书。该书对我区党政、渔农、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研究和展望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普陀大事记》全书 19.5 万字，定价 15.00 元。○

海上桃源

情的理想去处。
是休闲度假、放飞心



△舟山(普陀山)机场



△朱家尖南沙度假区

▽桃花岛弹子峰



△桃花岛圣岩寺



中国电信
CHINA TELECOM

舟山网上方志馆



方志馆
FANGZHIGUAN
MUSEUM

主办:舟山市普陀区史志办

电话:3012607

编辑:《普陀史志》编辑部

印刷:同润图文印刷中心